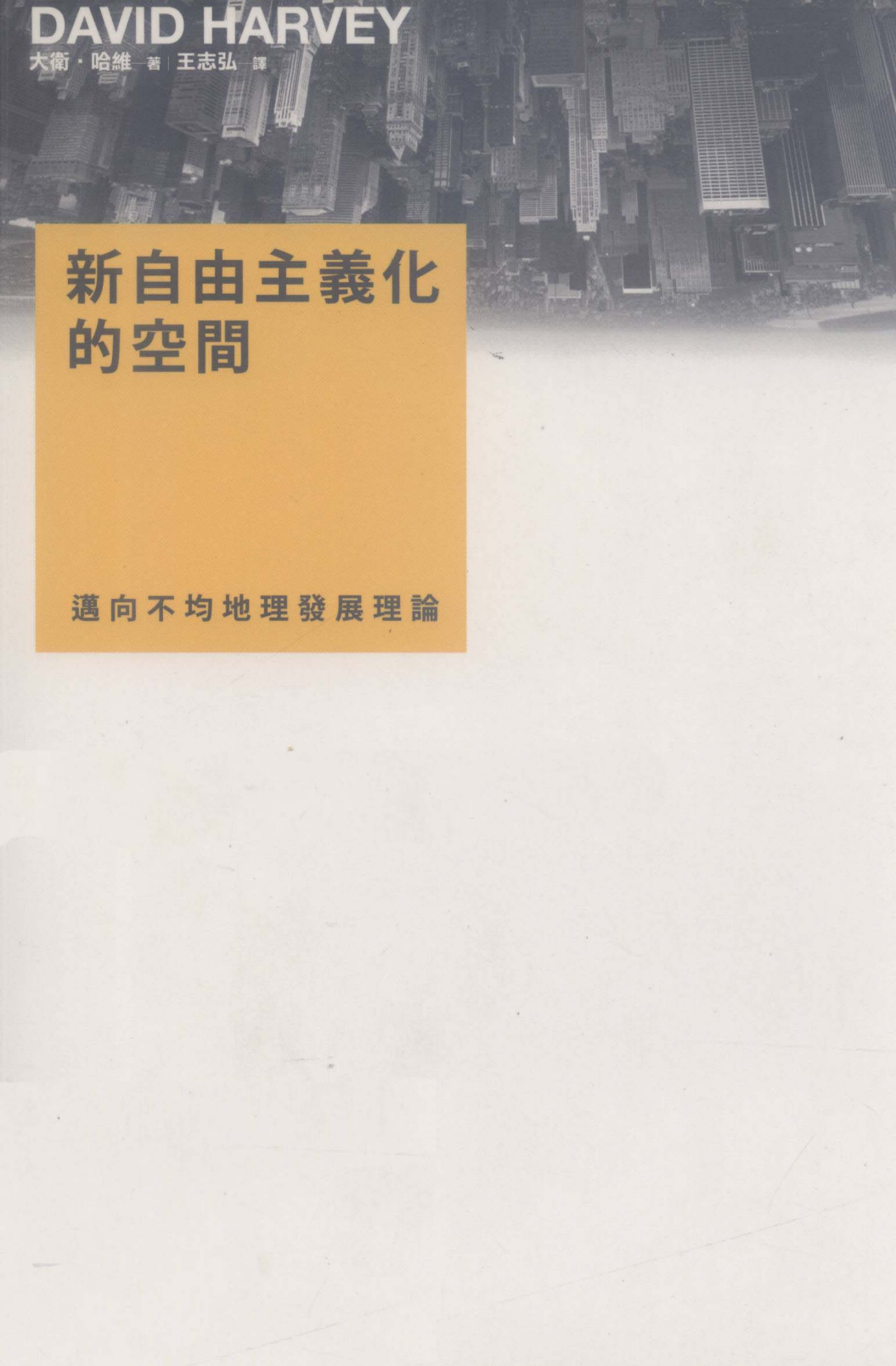




DAVID HARVEY

大衛·哈維 著 | 王志弘 譯

新自由主義化 的空間

邁向不均地理發展理論

球無一寸土能夠倖免。新自由主義幾乎等於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化所帶來的災難，因此幾乎等於災難的全球化。高度發達資本主義已經自掘墳墓了嗎？影響所及，馬克思主義經典遂而在西方再度熱銷。馬克思主義是否是救贖仍未知，但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已是事實。不管如何，站立在自己腳上的反思是必要的，台灣不能再人家消費我們買單了。

大衛·哈維是當今最重要的地理學家，也是當前時代領袖群倫的社會理論家，針對當代資本主義提出了全面性的批判。在這本十分迷人的書裡，他指引了邁向理解世界經濟驅動力量的道路，擴大了他近期著述的關鍵主題：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蔓延全球的不平等，以及「空間」是個關鍵性的理論概念。

這本書既是新研究綱領的重大宣告，也是大衛·哈維核心關懷的簡明導論，將成為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及學生的必讀之作。

ISBN 978-986-6525-02-5



9789866525025 00200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總店 台北市中正區(100)重慶南路一段61號7樓712室
電話 (02) 2370-2123 傳真 (02) 2370-2232
網站 www.socio.com.tw



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港台書

DAVID HARVEY

大衛·哈維 著 | 王志弘 譯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

邁向不均地理發展理論



This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publication:
David Harvey "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 2005 by 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 (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8 Socio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2008年12月出版

本中譯書的翻譯所依據之原文書版本, 等同於2006年Verso出版的版本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邁向不均地理發展理論
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著；王志弘 譯。
一版。— 台北市：群學，2008 (民97)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譯自：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ISBN 978-986-6525-02-5 (平裝)
1. 文化地理學 2. 新自由主義 3. 區域研究
541.39 97017312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邁向不均地理發展理論

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原 著 — 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譯 者 — 王志弘

總編輯 — 劉鈺佑

編 輯 — 呂環延

發行人 — 劉鈺佑

封 面 — 井十二設計研究室 電 話 — 02-2952-0672

印 刷 — 權森印刷事業社 電 話 — 02-8221-2628

出 版 —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7樓712室

電 話 — 02-2370-2123

傳 真 — 02-2370-2232

網 址 — <http://socio.com.tw>

電 郵 — socialsp@seed.net.tw

信 箱 — 台北郵政 39-1195 號信箱

郵 撥 — 19269524 ·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ISBN — 978-986-6525-02-5

NT\$ 200

一版一印 — 2008.12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現代地理思想

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

出版日期：2005 年 4 月

作者：Richard Peet

主譯：國立編譯館

譯者：王志弘、張華蓀
宋郁玲、陳毅峰

定價：600 元



Richard Peet 過去三十年來深入研究人文地理思想的主要趨勢，並將之連結到哲學和社會理論上更廣泛的主題。從存在現象學與人文主義地理學開始，本書涵蓋了基進地理學與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結構化理論、實在論、地域研究、後結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各種流派，以及女性主義。

各章精研若干理論，專注在這些理論裡的重要著作及其貢獻。即使許多思想稠密而複雜，但概念卻淺顯易懂，連學生都可以明白，讀者往往不自覺被吸引住而沉浸其中，不知東方之既白。精讀此書，現代地理思想任何哲學主題，幾乎就納在讀者的指掌之間了。

本書為地理思想與地理思想史課程的核心讀物，也是本來就內涵哲學與理論的人文地理學，所有課程的一環。



地方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出版日期：2006 年 2 月

作 者：Tim Creswell

譯 者：徐苔玲、王志弘

定 價：250 元

什麼是地方？地方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基本概念，甚至可以說人文地理學就是地方的研究。但地方同時也是一個包裹於常識裡面的字眼，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兩者的交纏使得這個名詞充滿了魅力。你搬進宿舍裡，貼上海報，在桌上放一些書，等等。然後，這個空間就變成了你的「地方」。北緯 40.46 度、西經 73.58 度，對你可能沒什麼意義，但如果我們知道那指的是什麼「地方」，感受可能就大不相同。以「地方」來說，那是：美國 911 事件，紐約曼哈頓被炸掉的雙子星大樓的所在地。

本書使用新聞、流行文化和日常生活實例解釋抽象概念，追溯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地方」概念的發展，思考人與地方如何產生情感聯繫，我們如何認同、記憶、想像某個地方，又如何排斥某些元素進入「我們的」地方，並思索「地方特色」是否因為全球化的席捲而消失殆盡。

性別、認同與地方

GENDER, IDENTITY & PL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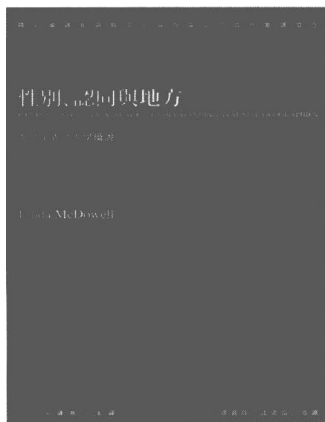
出版日期：2006年5月

作者：Linda McDowell

主譯：國立編譯館

譯者：徐苔玲・王志弘

定價：45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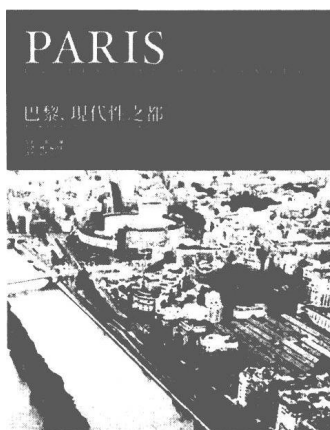


法國女人創造沙龍，英國男人發明俱樂部。沙龍裡有男人，俱樂部中卻沒有女人？地理學怎麼會和性別扯上關係？難不成男人和女人生活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如果性別屬性是社會建構的，那麼，女性氣質與男性氣概隨著時空不同又有什麼變化？女男社會關係能有多大的變異範圍？地理學家對這些議題有什麼意見？

這些是作者在本書中處理的核心議題。作者由各種地方開始，接著將視野擴大至全球的流動與遷徙，討論在其中性別關係的變化，如何影響和反映了這些空間的性質，以及人們對女男言行舉止的共同期待。

本書結合各種日常生活經驗與理論，除了質疑二元對立的性別框架外，也更積極探討性別的多樣性及其與空間的各種關係，巧妙結合了理論與個案研究，並於每一章文末，大量羅列相關著作，提供讀者參考。對於空間與性別的關係，無論是初探式的了解，或者希望更深入的研究，這本書都是一本不可或缺的精彩讀物。

SCS. 04



巴黎，現代性之都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出版日期：2007年5月

作者：David Harvey

主譯：國立編譯館

譯者：黃煜文

定價：500元

巴黎為何成為巴黎？巴黎一直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城市，迄今魅力不減反增，但它卻是在「第二帝國」時期，才翻身成為我們今日所知的現代性樣板。在一八四八到一八七一年兩次失敗的革命之間，巴黎經歷了一場驚人的轉變，俗稱「巴黎大改造」。奧斯曼男爵，傳奇的巴黎首長，一手打造巴黎的外觀，以今日巴黎四處可見的林蔭大道，取代了昔日的中世紀地圖，巴黎才變成今日如夢如幻的巴黎。這段期間也興起了以高級金融為主體的新資本主義形式，以及現代的大眾消費文化。城市外貌及社會景觀的遽變，帶來嶄新的現代主義文化，同時也脅迫巴黎沿著階級的界線斷裂，結果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興起，以及隨後的血腥鎮壓。

巴黎為何成為巴黎？哈維的全景式觀照與戲劇式的敘述，使得閱讀本書一直充滿著張力。本書與卡爾·休斯克《世紀末的維也納》，允為研究現代都市興起的兩大歷史傑作。

遇見都市：理論與經驗

URBAN THEORY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ENCOUNTERING THE CITY

出版日期：2007 年 11 月

作者：Simon Parker

主譯：國立編譯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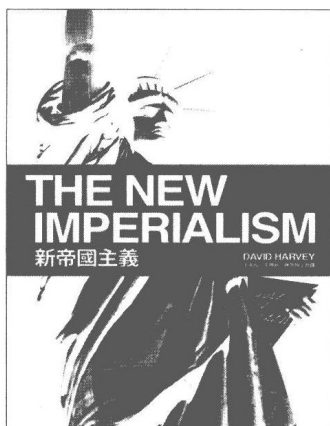
譯者：徐苔玲、王志弘

定價：360 元



本書結合古典與當代都市研究取向，揭露都市研究的知識根源，以及通常未受承認的事實，即有關城市的經驗性與理論性觀點，其實彼此互蒙其惠。追溯一個多世紀以來，城市概念的重要發展，包括韋伯、齊美爾、班雅明與列斐伏爾著作中，現代都市理論的基礎，以及諸如哈維和柯司特等當代都市理論家，乃至於洛杉磯都市理論學派的著述。個別章節探討大都市的調查研究，包括布斯（Charles Booth）與威爾遜（William J. Wilson）的當代都市研究，以及其他工業城市研究取向，涵蓋花園城市運動到「新都市主義」，並考察新興資訊和通訊科技的衝擊，以及日趨分散化的都市網絡，這一切都引發有關傳統城鎮景觀在可行性，以及實質和社會認同上的重要問題。該書的結論呼籲，如果我們要實現城市的豐饒潛能，就必須針對都市問題，在理論與實踐上採取更為全面而整合的研究取向。

SCS. 06



新帝國主義

THE NEW IMPERIALISM

出版日期：2008 年 8 月

作 者：David Harvey

譯 者：王志弘

定 價：250 元

小布希、脾氣躁。

偷油吃、下不來。

美國會不會唏哩呼嚕滾下來？

世人都感到困惑與憂慮，在世界舞台上，美國已突然轉變成具脅迫性的政體，這是強盛還是衰弱的跡象？伊拉克戰爭中真正難以預料的是什麼？這全是為石油嗎？如果 不是，又包含了什麼理由？經濟衰退在美國對外冒險主義上扮演什麼角色？美國對外的軍事主義和國內政治間真正的關係是什麼？這些問題，將在這本扣人心弦又見 解獨到的作品中一一解答。

目錄

導言：二〇〇四年海德堡的赫特納講座 Peter Meusburger 與 Hans Gebhardt	1
新自由主義與階級力量的復辟 大衛·哈維	5
不均地理發展理論筆記 大衛·哈維	65
空間是個關鍵詞 大衛·哈維	113
克勞斯奇拉基金會	145
註釋	149
附錄：歷屆赫特納講座	159
索引	161

導言：二〇〇四年海德堡的赫特納講座

海德堡大學（University of Heidelberg）地理系於 2004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2 日，舉辦了第八屆「赫特納講座」（Hettner-Lecture）。這個年度系列演講，是以 1899 年至 1928 年間，於海德堡擔任地理系教授，也是當時德國最富聲望的地理學家阿弗列德·赫特納（Alfred Hettner）為名，致力於地理學、經濟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的跨領域新理論發展。

受邀的客座講者，於停留期間將發表兩場公開演講，其中一場透過網路電訊教學傳送。此外，也舉辦幾場討論會，讓研究生和年輕學者有機會跟國際知名學者見面交談。在學術生涯的初期有這種經驗，能夠開啓新的研究視角，並鼓勵針對當前理論爭辯與地理實踐的批判反思。

第八屆赫特納講座由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的人類學

特聘教授大衛·哈維擔任。大衛·哈維是眾所推崇，過去四十年來最富創意和影響力的地理學家之一。他的《地理學中的解釋》（*Explanation in Geography*, 1969）替 1960 年代地理學家為之著迷的地理學作為一門空間科學的方法論爭辯，做出了重大貢獻。哈維隨後由英國——他於布里斯托大學授課——轉任巴爾的摩（Baltimore）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正逢他研究的知識基礎產生了深刻轉變。隨著《社會正義與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1973）的出版，哈維產出了批判都市研究的先驅文本，探討馬克思主義思考方式的相關性，以此解說和挑戰西方城市裡的貧窮與種族歧視。他的《資本的限制》（*The Limits to Capital*, 1982）是馬克思資本主義理論的地理學延伸，讓哈維站穩了首席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的地位，他的名聲遠播，超越地理學的邊界。哈維在《資本的都市化》（*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1985）和《意識與都市經驗》（*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1985）回到了都市議題，之後著手他迄今最成功的一本書，《後現代性狀況》（*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989），這是針對後現代主義的唯物論批判，寫作當時，他在牛津大學擔任哈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地理學講座教授。晚近，哈維重訪社會正義的議題與烏托邦觀念，在《正義、自然與差異地理》（*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1996）與《希望的空間》（*Spaces of Hope*, 2000）中，有進一步探索。他最新的書是《巴黎，現代性之都》（*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2003）及《新帝國主義》（*The New Imperialism*, 2003）。

在 2004 年的赫特納講座期間，哈維發表了兩場公開演說，題目分別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與階級力量的復辟」和

「邁向不均地理發展的一般理論」，¹ 兩者都經過修訂，在這裡出版，加上一篇討論「空間是個關鍵詞」的論文，以及一個簡短攝影記錄。三場與來自海德堡及十九所其他歐洲和美國大學的研究生暨年輕研究人員的討論會，探討了演講提到的議題。討論會的主題是「新帝國主義」、「地理知識 / 政治權力」，以及「空間是個關鍵詞」。

我們要表達對於克勞斯奇拉基金會（Klaus Tschira Foundation）慷慨支持赫特納講座的感謝之意。尤其要感謝克勞斯奇拉博士（Dr. h.c. Klaus Tschira），他是我們在基金會宏偉的波希別莊（Villa Bosch）工作室的親切東道主。我們要向海德堡大學副校長香尼奧提斯教授（Prof. Dr. Angelos Chaniotis），以及化學暨地球科學院院長霍夫曼教授（Prof. Dr. Peter Hofmann）致意，感謝他們在大學的老大禮堂（Alte Aula）開幕儀式上致歡迎詞。

2004 年赫特納講座如果沒有相關學生和教師的全心奉獻，就不可能完成。我們感謝弗瑞塔格（Tim Freytag）與瓊斯（Heike Jöns）有效的組織工作，並且規劃和主持了與研究生暨年輕研究人員的討論會。我們也要謝謝協助打理整個活動的學生。全體參與者的同心協力和熱情，再度確保了海德堡赫特納講座的圓滿成功。

新自由主義與階級力量的復辟

布希總統反覆宣稱，美國給予伊拉克人民「自由」這個珍貴禮物。他說，「自由是上帝送給世界每個人的禮物」，而且，「身為全球第一強權，我們有義務協助散播自由」，² 這項官方真言（由行政部門和軍方反覆提起）認為，先發制人入侵伊拉克的最大成就，就是讓這個國家獲得「自由」，這項真言在美國大部分媒體中徹底迴響，對許多人而言，顯然也是個有說服力的主張，讓他們繼續支持戰爭，即使官方的宣戰理由（像是薩達姆〔Saddam〕與蓋達組織〔al-Qaeda〕勾結、大規模毀滅武器的存在，以及對美國安全的直接威脅）已經不夠充分。然而，自由是個微妙的字眼。誠如阿諾德（Matthew Arnold）許多年前的觀察：「自由是一匹很好騎的馬，但必須騎到某個地方。」³ 那麼，伊拉克人民被期待騎這

匹慷慨捐贈給他們的馬到達何處呢？

美國對這個問題的解答，於 2003 年 9 月 19 日說出來了，當時聯合臨時政府首長布瑞默（Paul Bremer）發布了各項命令，包括「公營事業全面私有化、外國公司掌握伊拉克企業的完整所有權、外國利潤的全面匯回……開放伊拉克銀行供外國控制、外國公司享有本國待遇，以及……消除幾乎一切貿易障礙。」⁴ 這些命令適用於所有經濟領域，包括公共服務、媒體、製造業、服務業、運輸、金融和營造。只有石油例外（可能原因是它具有特殊地位和地緣政治重要性，是美國獨家控制的武器）。另一方面，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卻遭受嚴格限制。此外，還實行了一種高度累退的「平頭稅」（flat tax）（這是美國保守派長期懷抱的野心）。誠如克連（Naomi Klein）指出的，這些命令違反了日內瓦和海牙公約，因為占領勢力受託保護被占領國資產，而且沒有權利賣掉這些資產。⁵ 再者，針對這種強加於伊拉克的、倫敦《經濟學人》（*Economist*）所謂的「資本主義之夢」，有相當程度的抗拒。即使是伊拉克過渡期間的貿易部長，一名由美國指派的聯合臨時政府成員，都抨擊強行實施「自由貿易的基本教義論」，將其描述為「忽視歷史的有缺陷邏輯」。⁶ 克連也指出，幾乎可以確定的是，起初美國抗拒在伊拉克實行直接選舉，乃源於它希望與指派的代表共事，他們可以在（幾乎肯定會排拒他們的）直接民主體制掌權以前，盡可能順服地專注於這些自由市場改革。如果是由占領勢力執行的話，布瑞默的統治將被判定非法，但如果有一個「主權」（即使是非經選舉且過渡性的）政府確認，在國際法底下就可能認定為合法。2004 年 6 月底接手的過渡政府，空有「主權」稱號，卻

只擁有確認既存法律的權力。它不能修改既有法律或起草新法律（雖然從其人事組成來看，也不太可能會大幅偏離布瑞默的指令）。

新自由主義轉向

美國試圖在伊拉克大力推行的，顯然是一個羽翼豐滿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其基本使命是促進有利可圖的資本積累條件。布瑞默根據新自由主義理論而概述的那種措施，是創造財富、並藉此改善全體人民福祉的必要且充分條件。政治自由與市場及貿易自由的結合，向來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主要特色，而且多年來已經主導了美國對世界其他地區採取的立場。例如，9/11事件一週年時，布希總統在發表於《紐約時報》的署名專欄文章中宣布，「我們將運用無可匹敵的力量和影響力，建立一個國際秩序和開放氣氛，使得許多國家可以享有進步和自由榮景。一個漸趨自由的和平世界，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反映了恆久的美國理想，團結了美國的盟國……我們尋求符合正義的和平，讓壓迫、怨恨和貧窮，都由民主的希望、發展、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取代」，最後兩項已經「證明它們讓整個社會脫離貧窮的能力。」今日，他結論道，「人類掌握了機會，能夠以自由的勝利壓倒所有古老的敵人。美國欣然在這場偉大使命中擔負起領導責任。」相同的語彙出現在稍後發表的國防戰略文件（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Document）序言中。⁷正是這種被詮釋為市場和貿易自由的自由，要施加在伊拉克和世界身上。

9

這裡值得喚起記憶的是，第一場新自由主義國家形構的

大實驗，是皮諾契（Pinochet）於 1973 年「小型 9/11 事件」政變後的智利（幾乎是布瑞默宣布伊拉克政權成立之前三十年）。這場政變對抗的是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經過民主選舉的左派社會民主主義政府，並獲得美國中情局和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大力撐腰。它暴力壓制了一切社會運動和左翼政治組織，瓦解了任何形式的民眾組織（像是位於貧窮鄰里的社區健康中心）。勞動市場「解脫」了管制或制度限制（例如，工會力量）。但是，到了 1973 年，先前在拉丁美洲試圖振興經濟的主導性進口替代政策（1964 年巴西軍事政變後，曾經在某種程度上奏效），卻因失敗而壞了名聲。世界經濟正陷入嚴重蕭條，很顯然需要一些新東西。一群因追隨當時於芝加哥大學任教的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理論，而號稱「芝加哥男孩」的經濟學家，被召集去協助重建智利經濟。他們沿著自由市場路線，將公共資產私有化，開放自然資源供私人開採利用，並促進外國直接投資和自由貿易。外國公司將它們在智利賺取的利潤匯回本國的權利，獲得了保證。出口導向成長得到的重視，超過了進口替代。唯一保留給國家的部門，是關鍵性的銅礦資源（很像伊拉克的石油）。從經濟成長率、資本積累，以及外國投資的高額報酬來看，隨後智利經濟的短期復甦，替後續英國（柴契爾夫人〔Thatcher〕治下）和美國（雷根時期）朝向更開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轉型，提供了建立模型的證據。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在邊陲地帶進行的殘酷實驗，成為核心地區籌畫政策的模型（很像目前在伊拉克提議的平頭稅實驗）。⁸

不過，智利經驗證明了好處並非平均分配。國家和統治菁英，以及外國投資者都活得不錯，一般人民卻過得很糟。

這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長期效果，延續得夠久，都可以視為整個計畫的結構性環節了。杜曼尼與列維（Dumenil and Levy）甚至主張，打從一開始，新自由主義就是恢復人口中最富裕階層的階級力量的計畫。在評論美國頂端前百分之一所得賺取者（income earners）的生活時，他們寫道：

10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這些家戶獲得了大約 16% 總所得。這個比例在大戰期間快速下跌，在 1960 年代，比例降到了 8% 的水平，並維持了三十年。1980 年代中期，它突然高升，到了世紀末的時候，已經抵達 15%。以總財富的角度來看，趨勢大致相同……⁹

其他資料顯示，前 0.1% 所得賺取者占全國總所得的比例，從 1978 年的 2%，上升到 1999 年的超過 6%。幾乎可以確定的是，隨著布希政權的減稅發揮效果，財富集中於社會上層的情況會持續加速。杜曼尼與列維也指出，「1970 年代的結構性危機期間，由於利率幾乎沒有高過通貨膨脹率、公司的低股息分配，以及蕭條的股票市場，進一步侵蝕了最富裕者的收入和財富」。1970 年代的特徵，不僅是全球停滯型膨脹危機，也是上層階級勢力受到最嚴重威脅的時期。他們的論點是，新自由主義崛起，正是為了回應這個威脅。¹⁰

但是，若要證明這個階級力量復辟的論題，需要我們指出集結在新自由主義政策背後的特定階級勢力的構成，因為無論是英國或美國，都不可能訴諸智利那種暴力，而是必須建立共識。我們必須回到 1970 年代這個關鍵十年，看看這是如何達成的。

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國家，以及美國奠定了資本與勞動之社會契約的凱因斯派折衷方案，在 1950 年代與 1960 年代的高成長期間，運作得很順利。在大部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裡，重分配的政治、對資本自由移動能力的控制、公共開支和福利國家建設，與相對高的資本積累率和適當的利潤率攜手同行。但是，到了 1960 年代末期，在國際上和國內經濟中，這種組合都開始崩潰。到了 1973 年，甚至在以阿戰爭和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禁運之前，調節國際經濟關係的布萊頓森林（Bretton Woods）體系就瓦解了。資本積累產生嚴重危機的跡象，在各處顯現出來，預報了全球性的停滯型膨脹，好幾個國家的財政危機（英國於 1975-6 年間必須由國際貨幣基金援助脫困，紐約市同一年技術性破產，而國家支出幾乎在每個地方都明顯緊縮）。凱因斯的折衷方案很顯然已經崩潰，不再是控管資本積累，使其與社會民主主義政治協調一致的可行辦法。¹¹

左派的回答是加強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和調節（有必要的話，包括透過嚴格的手段，以及薪資和價格控制，來遏止勞動和群眾運動的熱望），卻沒有直接挑戰資本積累的勢力。這項回答是由歐洲結盟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黨提出來的（希望都聚焦於像「紅色波隆納」〔Red Bologna〕這類地方的資本積累治理與管理的創新實驗，或是義大利與西班牙朝向更開放的市場社會主義和「歐洲共產主義」的理想）。左派在這些方案背後匯聚了不少群眾力量，在義大利接近掌權，在法國、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國，實際上掌握了國家權力，在斯堪地納維亞〔Scandinavia，即北歐〕維持了權力。即使在美國，1970 年代早期，民主黨控制的國會也推動了管制改革

的立法浪潮（由共和黨總統尼克森簽署為法律），來治理環境、勞動、消費者與公民權利議題。¹² 但是，左派大體上未能大幅超越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解答，到了 1970 年代中期，這些措施已然證實無法與資本積累的要求相容。結果是，社會民主勢力的一方（通常投身於遏止自身選民所期盼的實用主義政治），與所有關心要重建活躍的資本積累之開放條件的另一方，發生兩極化的辯論。

新自由主義做為一種對付資本主義社會秩序之威脅的潛在解藥，以及資本主義病症的解方，長久以來就埋伏在公共政策的側邊。但是，唯有在 1970 年代的紛擾期間，它才開始移向舞台中心，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滋養了各種智庫，像是倫敦的經濟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以及芝加哥大學。由於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兩名位居領導的支持者，1974 年的海耶克（von Hayek）和 1976 年的傅利曼，新自由主義也獲得了尊敬。於是，它逐漸開始發揮實際影響力。例如，在卡特任職總統期間，經濟的解除管制成為整個 1970 年代橫行美國的長期停滯型膨脹狀態的解答之一。但是，新自由主義戲劇性的鞏固成為一種新經濟教條，調節著先進資本主義世界的公共政策，則發生於 1979 年的美國和英國。

12

當年 5 月，柴契爾夫人在英國當選，秉持強大民意要改革經濟。在約瑟夫（Keith Joseph）和經濟事務研究所思想的影響下，她接受了必須拋棄凱因斯主義，以及貨幣學派的「供應面」解答，才是治療 1970 年代英國經濟特有之停滯型通貨膨脹的良方。她認識到，這意味在財政和社會政策方面，形同要有一場革命，遂立即表露強烈的決心，要與 1945

年以來在英國鞏固了地位的社會民主主義國家制度與政治作風決裂。這意味了對抗工會勢力、攻擊一切形式的社會團結（像是透過社會主義城市治理表現出來的那種）、打破或撤回福利國家的承諾、公營事業私有化（包括公共住宅）、減稅、鼓勵企業主義的倡議，以及創造一個有利於企業的環境，以吸引大量外國投資流入（尤其是來自日本的資金）。

皮諾契沒能透過強制性國家暴力達成的，柴契爾透過民主同意的組織辦到了。在這一點上，葛蘭西（Gramsci）的觀察就有深刻關聯了，他指出，同意和霸權必須先於革命性的行動而組織起來，而柴契爾確實是個自我宣稱的革命分子。1970年代經濟停滯、淒涼無望時期的英國，相對於工會勢力和國家這方令人窒息的笨拙官僚，有關個人主義、自由、自主的強烈思想潮流非常盛行，透過越來越順從於大資本利益的媒體而大力傳播。資本主義的危機被解釋為治理危機。而且，卡拉罕（Callaghan）治下的工黨政府，同意實施1976年國際貨幣基金要求的緊縮方案，以便交換貸款來償付長期負債，這便遵循了企業路線，卻違反傳統支持者的利益，這件事實有助於替以下想法鋪路，即柴契爾所說的，除了新自由主義的解答，「沒有其他出路」。據此，柴契爾的革命有了某種程度的政治同意（尤其是挺她贏得選舉的中產階級的同意）為基礎。她有計畫地秉持選民託付，擊退工會勢力。納入在某些領域，像教育、健康照護、法律和市政治理等方面，握有大權的專業協會，則又是另一回事。就這一點，她的內閣（及她的支持者）有著惡名昭彰的分裂，而且在她自己的政黨和媒體裡，費了好幾年傷痕累累的對抗，才勉強讓新自由主義路線歸位。她後來的著名宣告指出，「沒有社會這種東

西，只有個人，以及」，她接著說，「他們的家庭」。所有形式的社會團結，都必須解散，以利於個人主義、私有財產、個人責任和家庭價值。沿著源於柴契爾修辭的路線而展開的意識形態攻擊，堅持不懈，最終獲得廣泛成功。¹³「經濟學是方法」，她說，「但目標是要改造靈魂」。她也確實改造了，雖然她的方式絕對無法避免付出政治代價，引發矛盾衝撞，我們稍後就會看到。

1979 年 10 月，美國聯邦準備銀行（the US Federal Reserve Bank）主席沃爾克（Paul Volcker），策畫了美國貨幣政策的一項巨大轉變。¹⁴ 美國對新政原則的長期承諾，意味了大體上採取凱因斯式財政與貨幣政策，以完全就業為關鍵目標，但這項承諾遭到拋棄，而偏向於設計政策來平息通貨膨脹，不論這對就業有何影響，或者，不考慮這對於高度仰賴經濟條件，而且對美國利率改變很敏感的國家（像墨西哥與巴西）經濟體有何後果。實質利率在 1970 年代兩位數字的通貨膨脹浪潮中，經常是個負數，但由於聯邦儲備局的命令而變成正數。名義利率一夜之間提升到接近 20%（這項措施後來稱為「周末夜特餐」），故意讓美國及世界大部分其餘地區陷入衰退和失業。當時主張，這項改變是脫離停滯型膨脹危機的唯一出路，這個危機是美國和大部分全球經濟體在整個 1970 年代的特徵。

沃爾克的措施後來被稱為一場震撼，但若無其他所有領域政府政策的類似改變，就無法鞏固成形。雷根擊敗卡特的勝利，證實是至關緊要。雷根的顧問相信，沃爾克針對生病且停滯的經濟開出的「藥方」，正中目標。沃爾克獲得支持，重新指派為聯邦儲備局主席。雷根政權的任務是提供需要的

政治支撐，進一步解除管制、減稅、刪減預算，並抨擊工會和專業力量。雷根在一場漫長而艱苦的罷工中，正面壓制了飛航交通管制員工會 PATCO。這透露了每當沃爾克誘發的衰退產生高失業率（10% 或更高）時，就全面發動對組織化勞動勢力的攻擊。但是，PATCO 不是個普通工會：它是白領階級工會，具有技術專業協會的特質，因而是中產階級而非勞工階級工會主義的象徵。這對於勞動條件的全面影響非常劇烈——也許最能夠描繪狀況的事實是，1980 年與貧窮水準大約相當的聯邦最低工資，到了 1990 年已經降到該水準以下 30%。雷根指派擔任各項議題，如環境管制、職業安全暨健康等權責職位的官員，將對抗大政府的運動拉抬到更高水平。從航空和電訊到金融的每樣事物的解除管制，為強大的企業利益打開了無拘無束的市場自由新地帶。市場在意識形態上被描繪為促進競爭與創新的偉大手段，實際上是鞏固壟斷企業與多國公司勢力，成為階級統治核心的主要載體。富人減稅同時啟動了朝向更嚴重社會不平等，以及上層階級力量復辟的重大轉移。

艾德索爾（Thomas Edsall）（一位長期報導華盛頓事務的記者）於 1984 年針對這一切背後的階級勢力，發表了具有先見之明的報導：

1970 年代，企業界重新界定了身為一個階級而行動的能力，在立法場域裡，抑制競爭的本能，代之以聯合、合作的行動。不再是個別公司尋求特殊恩惠……企業界政治策略的主題，變成是在擊敗諸如消費者保護和勞動法改革等法案，以及在有利的稅制、管制和反托辣斯立法的實施方面，具有共同利益。¹⁵

爲了實現這個目標，企業界需要一個政治階級工具和群眾基礎。他們因此積極嘗試掌握共和黨，做爲他們自己的工具。組成強大的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PAC），以便獲取像古老諺語所說的，「能夠用錢收買的最好政府」，正是重大的一步。1974 年假定爲「進步的」選舉財務法，實際上是合法化了政治的財務貪腐。政治行動委員會此後可以確保，兩個政黨都由企業、金融及專業協會的利益在財務上主導。企業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在 1974 年有 89 個，到了 1982 年遽增爲 1,467 個。雖然這些委員會很願意資助有權有勢的兩黨在職者，只要能符合它們的利益，它們也有系統地偏向支持右翼挑戰者。每個 PAC 捐給任何個人的五千元上限，迫使來自不同企業和產業的 PAC 聯合運作：而這意味了基於階級利益而建立聯盟。¹⁵ 這個時期裡，共和黨擔任「其主導階級選民」之代表的意願，和民主黨人「意識形態上矛盾」的態度形成了對比，這種態度源於「一項事實，即民主黨與社會中各種群體的紐結很分散，這些群體——婦女、黑人、勞動、老人、西班牙裔、都市政治組織——沒有任何一個明顯大過其他群體。」再者，民主黨人對於「大錢」捐贈者的依賴，使得他們有許多人很容易受到企業利益的直接影響。¹⁶ 國內製造業、礦業、林業和農業利益，在當時展開的階級戰爭中，於這方面占有領導地位。

15

然而，共和黨如果要有效拓展權力，就需要堅實的選民基礎。大約在這個時期，共和黨人試圖和基督教右派結盟。法威爾（Jerry Falwell）於 1978 年建立了「道德多數」（moral majority）運動，作爲右翼且非常保守的基督教的政治手臂。它訴諸白人勞工階級的文化國族主義，以及他們遭受圍困的

道德正直感（遭受圍困是因為這個階級生活在長期經濟不穩定狀況下，而且覺得遭排除在透過優惠待遇及其他國家方案來分配的眾多好處之外）。這種「道德多數」可以透過編了碼（如果不是公然露骨）的種族主義、恐同症和反女性主義來動員。這不是歷史上第一次，恐怕也不是最後一次，某個社會群體願意為了文化、國族和宗教的理由，投票反對自己的物質、經濟和階級利益。此後，大企業和保守基督徒的神聖聯盟穩步鞏固，最後消除了共和黨（於 1960 年代很明顯且影響深遠）的一切自由主義成分，將它轉變為當前相對均質的右翼選舉勢力。

雷根的當選展開了鞏固政治移轉的長期過程，這對於支持先前邁向新自由主義的貨幣主義移轉，是必要的支持。艾德索爾當時指出，雷根的政策環繞著：

一股全面性的驅動力，要降低聯邦對於產業、環境、工作場所、健康照護，以及買賣雙方關係的管制範圍和內容。雷根政權朝向解除管制的動力，其達成是透過大幅刪減預算，降低執行能力；指派反對管制、企業導向的機構人員；以及最後是賦予管理暨預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前所未有的權威，來擱置主要管制，迫使管制提案大幅修正，還有拖長的成本效益分析，來有效扼殺各式各樣的管制倡議。¹⁷

然而，另一項與此相伴的轉移，也推動了朝向新自由主義解答的移動，但這回是 1970 年代，於全球層次發生的事情。隨著 1973 年石油禁運來臨的 OPEC 石油價格攀升，令大量金融力量任由產油國（像是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和阿布

達比〔Abu Dhabi〕處置。我們現在從英國的情報報告得知，美國曾於 1973 年積極準備入侵這些國家，以便恢復原油運輸，降低石油價格。我們也知道，沙烏地在這個時候，可以推測是在美國軍事壓力（如果不是公開威脅的話）下，同意透過紐約的投資銀行來流通它們的全部油元。¹⁸ 這些銀行突然發現自己支配了龐大的資金，它們必須找到有利可圖的出口。有鑒於 1970 年代中期的蕭條經濟情勢和低報酬率，美國國內的投資選項並不佳。更有利可圖的機會，必須到海外尋找。但這必須要有開放的入口，讓美國控制的金融得以橫越外國疆域而在其中操作，還要有適當的安全條件。紐約投資銀行寄望美國帝國主義傳統，來撬開新投資機會，並保護它們的外國操作。

16

美國帝國主義傳統已經形構良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對於英國、法國、荷蘭和其他歐洲強權的帝國傳統來自我界定的。¹⁹ 雖然美國在 19 世紀末並未認真對待殖民征服，卻在 20 世紀演變為一個沒有殖民地的開放式帝國主義系統。經典範例展現於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的尼加拉瓜，當時美國部署海軍陸戰隊來保護美國利益，卻發覺自己捲入了由桑定諾（Sandino）領導的長期而艱困的游擊暴動。答案是找出一個地方強人——這個例子裡是蘇慕薩（Somoza）——提供他和他的家族及親信經濟與軍事援助，讓他們可以鎮壓或收買反對勢力，並替自己積累可觀的財富和權力。為了回饋，他們總是會報以支持，或在必要的時候推動美國在該國和整個區域（這裡是指中美洲）的利益。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堅持施加於歐洲強權的全球解殖（decolonization）階段中，所部署的模型。例如，中央情報局於 1953 年籌畫政變，

推翻了伊朗經民主選出的莫薩德克（Mossadeq）政府，扶植伊朗國王（Shah of Iran），後者將石油契約給了美國公司（而且沒有將莫薩德克收歸國有的資產，還給英國公司）。伊朗國王也成為美國在中東產油區域利益的重要捍衛者。在戰後時期，大部分非共產主義世界都透過這種戰術而淪於美國支配。但是，這經常導向美國這方面的反民主（以及更為明顯的反民粹主義和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戰略。其矛盾效果是，驅使美國越來越與開發中世界的壓制性軍事獨裁及威權政體（當然，最驚人的是整個拉丁美洲）結盟。因此，美國利益在對抗國際共產主義的鬥爭中，變得更容易蒙受損害。支持更多壓迫性的政權，總是證明會有反生產的危險。雖然統治菁英的同意可以輕易收買，但必須運用強制力量來對抗民粹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使美國捲入了一段以大致上是隱藏性的暴力來對抗群眾運動的長期歷史。

在這個脈絡下，透過紐約的投資銀行而再度流通的剩餘資金，散播到了全世界。迄今為止，大部分於戰後時期流往開發中世界的美國投資，都是直接投資，其主要關切是利用原料資源（石油、礦產、農業產品等），或是耕耘特殊的市場（電子通訊等）。紐約投資銀行總是在國際上很活躍，但是1973年後，它們變得更為活躍，但比較不關注直接投資了。²⁰這需要有國際信用與金融市場的自由化，而美國幾乎是在沃爾克震撼後，就開始積極推動和支持這種策略。投資銀行最初鎖定直接借款給外國政府。對貸款需求孔急的開發中國家，實際上是受到引誘而落入了債務／信貸陷阱，而得到美國帝國勢力撐腰的投資銀行，則占據了能夠要求比在國內還高的報酬率的位置。²¹由於貸款是以美元撥付，任何美國利

率的微幅攀升，更別說是劇烈上揚，都可以輕易令脆弱的國家違約拖欠。紐約投資銀行因而極可能蒙受損失。第一次主要的測試案例，伴隨著沃爾克震撼而來，驅使墨西哥於 1982-4 年間陷入拖欠狀態。雷根政權曾經在第一年任期認真考慮撤回對國際貨幣基金的支持，這時卻找到一個辦法，把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的力量統合起來，以結構性改革交換展延債務來解決難題。當然，這需要國際貨幣基金從凱因斯式的理論參照架構，轉移到貨幣主義架構（而這迅即完成了，並使得 IMF 成為經濟理論之新貨幣主義信條的全球影響核心）。為了回報債務展延，墨西哥被要求實施制度改革，像是刪減福利開支、鬆綁勞動法令和私有化，這個程序後來稱為「結構調整」（structural adjustment）。墨西哥因此局部被推入了一個逐漸擴大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行列，在那之後，IMF 成為在全世界推動，以及在許多狀況下是強制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關鍵工具。²²

18

墨西哥案例呈現的是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一項關鍵差異：在前一種狀況，債權人承擔源於不良投資決策的損失，在後面一種情況下，債務人被國家和國際勢力強迫接受償付債務的成本，而不論這對當地民生計和福祉有何後果。如果這要求將資產以超低價格（fire-sale price）轉讓給外國公司，那就這麼辦。隨著全球層次上金融市場的這些創新，新自由主義的系統形式，基本上就完成了。誠如杜曼尼和列維的說明，其作用是讓尤其是美國的上層階級，可以從世界其餘地區汲取超高報酬率。²³

美國階級力量的復辟，也仰賴有關階級力量本身如何構成的某種重新配置。所有權和管理的區分（或是賺取股息和

利息的貨幣資本，與尋求透過生產組織來獲取企業利潤的生產／製造業資本之間的區分），在很多時候都造成資本家階級裡，金融家和製造商之間的衝突。例如，在英國，政府政策長期主要是照顧倫敦西堤區（City of London）的需求，經常損害了製造業的利益，而且在 1960 年代，美國金融家和製造商之間的衝突也常浮上檯面。1970 年代期間，這類衝突大多消失了。大企業變得越來越偏金融導向，即使它們從事生產，例如汽車部門。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利益，藉由支付後者股票選擇權而融合在一起。股票價值而非生產，成為經濟活動的引路明燈，而且，後來隨著安隆（Enron）這樣的公司倒閉而變得明顯的是，這所導致的投機誘惑，可能變得難以抵擋。這造成的一般效果是，金融利益（會計師而非工程師的力量）在統治階級和統治菁英裡占了上風。簡言之，新自由主義意味了每件事物的金融化，以及資本積累的權力中樞，重新回到了所有者及其金融機構手中，卻犧牲了其他資本集團。出於這個理由，金融機構的支持，以及金融系統的健全，成了逐漸支配全球政治的新自由主義國家集體（像是所謂的七大工業國）的核心關切。

新自由主義國家

新自由主義國家的基本使命，是要創造「優良的企業環境」，因此要替資本積累塑造最佳條件，而不論這對就業或社會福利造成的後果。這與社會民主主義國家形成對比，後者在維持適當且穩定的資本積累率條件下，承諾完全就業和全體公民福利的最佳化。

新自由主義國家試圖延伸所有企業利益的動機，並予以促進和刺激（藉由稅收減免和其他特許權，以及在必要時候，以國家經費提供基礎設施），主張這將會增進成長和創新，而且是消除貧窮，以及長期而言，讓全體人民享有更高生活水準的唯一途徑。新自由主義國家特別勤於嘗試以資產私有化，做為打開新資本積累場域的手段。原本由國家經營或管制的部門（運輸、電訊、石油和其他自然資源、公用設施、公共住宅、教育），都轉讓給私領域，或是解除管制。資本在部門和區域之間的自由移動，被視為重振利潤率的關鍵，而一切阻撓自由移動的障礙（例如規畫控制）都必須排除，除非是在「國家利益」（無論這可以如何隨意界定）的關鍵領域。因此，新自由主義國家的口號就是「彈性」（呈現於勞動市場和投資資本的部署方面）。它大力宣傳競爭的好處，實際上卻打開市場，供集中化的資本和壟斷勢力馳騁。

在內部，新自由主義國家敵視（在某些情況下則公然壓制）任何約束資本積累的社會團結形式（像是在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獲得相當力量的工會或其他社會運動）。它撤回了福利供應，而且在健康照護、公共教育和社會服務等領域，盡可能縮減角色，而這些領域卻是社會民主主義國家運作的核心。社會安全網減少到幾乎是底線。這並不意味消除了一切形式的管制活動或政府干預。確保無法私有化的公部門「責任」和「成本效益」的官僚統治，大為興盛（例如，柴契爾夫人尋求且達致了對英國大學的強勢管制）。公私合夥受到歡迎，但公部門承擔一切風險，企業部門卻收割所有利潤。企業利益能夠以有利於自身的方式，來立法和決定公共政策。如果有必要，國家就會訴諸強制性立法和警政（policing）措

施（例如，反糾察法），來驅散或壓制集體的反抗形式。監視和警政形式會不斷繁殖（在美國，監獄成為處理被拋棄勞工和邊緣化人口的主要國家策略）。

就外部而論，新自由主義國家試圖減少資本跨越邊界移動的障礙，並且嘗試打開（商品和貨幣資本的）市場，供資本積累的全球力量運行，有時候是競爭性的，但更常是壟斷性的（雖然總是有拒絕任何「違反國家利益」事物的不參與條款）。國際競爭勢力和全球化的意識形態，被利用來規訓內部反抗，在此同時，有厚利可圖的新領域，以及某些情況下甚至是新殖民資本主義活動，都在海外展開。在這個領域中，大企業的資本主義利益，通常也會與政府力量在政策制定，以及創造新的國際制度安排（像是世界貿易組織〔WTO〕或 IMF，以及國際清算銀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方面合作。

新自由主義國家特別在意金融機構。它不僅試圖促進它們擴展中的影響力，還要不計代價，保證金融系統的健全和償付能力。國家權力被用於保釋或避免金融失敗（例如，1987-8 年間的美國儲蓄和貸款危機，以及 1997-8 年間長期資本管理〔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避險基金高達三兆美元的崩盤）。在國際上，它透過像是 IMF 等機構，來保護投資銀行免於債務拖欠的威脅，並且實際上盡其最大能力來掩護金融利益，避免暴露於國際市場的風險和不確定。新自由主義國家與金融利益保護的這種連結，同時促進和反映了資產階級力量圍繞著金融化過程的鞏固。在金融系統的健全和人民福祉之間的衝突裡，新自由主義國家將會選擇前者。

新自由主義國家深刻地反對民主，即使它經常試圖遮掩

這個事實。受到支持的是菁英治理，而且對於透過行政命令和司法決策來統治，有強烈的偏袒，犧牲了先前民主和議會決策的核心地位。代議制民主體制的殘餘，若非像美國那樣徹底但合法地因貨幣力量而腐敗，也被擊潰了。創立的是強大的機構，在國內像是中央銀行（像美國的聯邦儲備局）和準政府機構，國際舞台上則是 IMF 和 WTO，完全脫離了民主的影響、監督、責任和控制。在新自由主義的觀點中，大眾民主等同於「暴民統治」，而這典型上會造成資本積累的阻礙，並於 1970 年代威脅了上層階級的勢力。受到偏愛的治理形式是「公私合夥」，國家和重大企業利益緊密合作，圍繞著提升資本積累的目標來協調它們的活動。結果是，受到管制者卻得以起草管制法令，而「公共決策」變得越來越不透明。

21

新自由主義國家強調的是私人和個人自由、自主與責任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市場裡。因此，社會成功或失敗，是以個人創業長處或過失的角度來解釋，而不是歸諸任何系統性的特質（像是資本主義典型的階級排斥）。新自由主義國家統治底下的反對，典型上侷限於個別的人權問題，因此，大約自 1980 年以來，各種「權利論述」大為盛行，成為「激進」和對抗性政治的首要位址。問題的解答和補救，必須由個人（以及，要記得，企業在法律上也界定為個體）透過法庭來尋找。訴諸法院，在名義上是平等主義的，但實際上極為昂貴（不論是個人控告疏忽行為，或是某個國家控告美國違反 WTO 規定——這個程序的代價可能高達一百萬美元，等同於某些貧窮小國的年度預算），其結果也強烈偏袒擁有金錢權力者。無論如何，司法界決策的階級偏見，即使不是確切無疑，也算很普遍了。我們不該驚訝，新自由主義下行動的主

要集體手段，是透過非民選（很多狀況下是菁英領導）的、爭取各種權利的倡導團體而界定和接合的。在新自由主義底下，非政府組織滋長繁生，引發了一種幻象，以為在國家機器外頭，以及在稱為「市民社會」的某種分離實體中動員起來的反抗，就是對抗性政治與社會轉型的動力來源。

經由這段解釋，我們很清楚看到了，新自由主義並未令國家或國家的特定機構（例如法院）變得無關緊要，像近幾年右翼和左派許多評論者所主張的那樣。然而，國家機構及其作為，有了徹底的重新構造（尤其是強制和同意的均衡、資本力量和群眾運動的均衡，以及行政及司法權力和議會民主權力這兩方面的均衡）。

新自由主義國家內化了某些基本結構矛盾。權威化（鑲嵌於主導性的階級關係中，而這種關係的再生產是社會秩序的根本）與個人自由的理想，尷尬不安地比肩並存。雖然保持金融系統的健全非常關鍵，但金融系統內部操作者的不負責任，以及自我吹捧的個人主義，造成了投機性的反覆無常和長期不穩定。雖然競爭的優點被置於前列，但現實卻是少數集中化的多國公司，其壟斷勢力漸趨鞏固。在民眾的層次，邁向個人自由的驅力太容易變得狂亂，造成社會混亂。因此，延續主導性權力關係的需要，必然會造就出壓迫性的關係，阻撓邁向個人化自由的驅力。在國際競技場中，新自由主義競爭性的反覆多變，威脅了霸權勢力的穩定和地位。霸權勢力，像是美國，可能會被激怒而採取鎮壓措施和行動，藉以保護維繫霸權所需的不對稱經濟關係。在這一切矛盾之外，我們還必須加上一項：新自由主義宣告的公共目標——全體人民的福祉——與其真實後果——階級力量的復辟，

兩者差距迅速增長的潛能。

我們稍後會討論這些矛盾元素。但是，很顯然的，新自由主義是個不穩定且持續變化的積累體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而不是固定且和諧運作的政治經濟權力構造。這就打開了一條路，讓我們將新保守主義視為對新自由主義之內蘊矛盾的潛在反應。

移植、擴散與演化

那麼，試想一下，1970年代中期之後，新自由主義政治和政策實際上鑲嵌於全球資本主義歷史地理的方式。很顯然的，英國和美國是先行者。但是，不論是英國或美國，這個轉向都不是毫無問題。在英國，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改革在長達十年的階級對抗與鬥爭中拼搏，1984-5年間漫長艱苦的礦工罷工是其核心主題。雖然柴契爾成功地私有化了公共住宅和公用設施，但是核心公共服務，像是全國健康照護系統和公共教育，除了邊緣的修修補補外，沒有什麼變動。而且，由於她自己黨內有許多人起初並不信服她選擇的方向，在實現她的目標的路途上，遇到了各種阻礙。她於1983年之所以能夠再度勝選，相較於新自由主義道路上的任何真正成就，更要歸功於她環繞著福克蘭群島（Falklands）／馬文納斯群島（Malvinas）戰爭而培植起來的國族主義浪潮。在美國，雷根統治期間的轉變衝突較少，而且力道更強勁。1960年代的「凱因斯式折衷方案」，從來沒能接近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的成就，對於新自由主義的反抗，也沒那麼頑強。雷根也極度關切冷戰，並且發動了一場軍備競賽，導向某種赤字預算

的軍事凱因斯主義，這有利於他在美國南部和西部贏得多數選票。聯邦赤字高漲，則提供了刪減社會方案的方便藉口。²⁴

23

縱使有治療病態經濟的那一整套修辭，英國和美國在 1980 年代都沒有達致很高的經濟表現水平，這透露了新自由主義很可能不是回應資本家禱告的解答。當然，通貨膨脹降了下來，而利率可能降低，但這都付出了高失業率的代價（例如，在雷根主政期間，平均是 7.5%）。另一方面，法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企圖加強國家控制（藉由銀行國有化），以及透過占有內部市場來促進成長，這些嘗試卻瓦解了，這意味了 1980 年代中期以後，任何左派出路都消失了。所以，合適的替代出路在哪裡呢？

1980 年代其實屬於日本、東亞「小龍」經濟體及西德，它們是全球經濟的動力來源。這些國家即使有極度不同的制度安排，卻都表現成功，令人很難主張，在世界舞台上單純轉向（更別說是強行實施）新自由主義，會是明顯的經濟舒緩劑。當然，在日本和西德，中央銀行通常遵循貨幣主義路線（西德聯邦銀行〔Bundesbank〕特別勤於與通貨膨脹戰鬥）。但是，西德的工會依然強勢，而且薪資水準相對很高。其效果之一是激發出高比率的技術創新，而這使得西德在國際競爭場域中遙遙領先。出口導向的成長，可以推動國家邁向全球領先地位。在日本，獨立的工會很虛弱或不存在，但是國家投資於技術和組織變革，加以企業和金融機構的緊密關係（這項安排在西德也很合宜），產生了亮麗的出口導向經濟表現，還讓其他資本主義經濟體像英國和美國，付出了高昂代價。²⁵ 因此，1980 年代的這種成長（世界總體經濟成長率甚至還低於紛擾不斷的 1970 年代），並非仰賴新自由主

義。到了這十年的末尾，採取鮮明的新自由主義道路的國家，顯然依舊陷於經濟困境。很難不得到結論，認為西德和日本的積累「體制」值得效法。因此，許多歐洲國家抗拒新自由主義改革，而且逐漸找到保留大部分它們的社會民主主義遺產的方法，同時轉向了西德模型，有些案例還相當成功。²⁶ 在亞洲，日本模型於威權治理系統（這是一般新自由主義潛藏的特色之一）下移植到南韓、臺灣和新加坡，也證明相當可行，而且能與合理的分配品質搭配。但是，西德和日本模型在某個方面，也就是從復辟階級力量的立場來看，並不成功。1980年代的英國，以及特別是在美國，社會不平等的迅速惡化，在其他地方受到了遏止。如果計畫是要復辟頂層菁英的階級力量，那麼新自由主義顯然才是答案。因此，問題出現了：如果新自由主義無法刺激實質成長，那麼要如何在世界舞台上達成這項任務。

24

在這方面，杜曼尼與列維（Dumenil and Levy）的說明，加上布瑞納（Brenner）、戈溫（Gowan）和波林（Pollin）的補充，提供了大部分需要的證據。²⁷ 我從這些材料提煉出三個不同成分。首先，已經在1970年代開始的金融化轉向，於1990年代加速。外國直接投資和資產組合投資（portfolio investment），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迅速攀升。金融市場經歷了強大的創新浪潮，成為更重要的協調工具。這就破壞了1980年代對於西德和日本大有裨益的，企業與銀行之間排他性的緊密紐結。日本經濟進入了盤旋困局（由土地和房地產市場崩盤帶頭），銀行部門則陷入危險狀態。德國過於倉卒的統一產生了壓力，德國先前掌握的技術優勢消失了，使得有必要更深刻質疑當地的社會民主主義傳統。德國的抗拒依然強

大，直到 2004 年，在消除社會民主主義成就方面，還有殘餘的幾場戰役開打，涉及了像是國家退休金和免費高等教育等領域。其次，在柯林頓主政期間主導經濟政策的華爾街 / IMF / 財政部複合體，不僅是能夠說服、誘騙和（感謝結構調整方案）強迫開發中國家，邁向新自由主義道路。美國也利用進入龐大美國消費者市場的優惠待遇的胡蘿蔔，來勸服許多國家沿著新自由主義路線來改革它們的經濟體，尤其是要開放它們的資本市場，讓美國金融資本滲透。這些政策於 1990 年代在美國造成了快速的經濟擴張。美國看起來像是掌握了解答，而且值得仿效它的政策，即使完全就業的達成乃奠基於相對很低的薪資率（誠如波林的解說，這些年間，大部分人口的福祉如果不是淨損失的話，實際上也沒有得到什麼改善）。²⁸ 勞動市場的彈性開始在美國奏效，並使得在歐洲和日本盛行的較僵化系統，承受了競爭壓力。然而，美國成功的真正祕密，在於它現在可以藉由它在世界其餘地區的操作（透過直接和資產組合投資），汲取高額報酬率回國。這是從世界其餘部分流入的貢金，主要是支持了 1990 年代所達致的富裕。第三，新貨幣主義經濟信條在全球的擴散，也發揮了強大的意識形態角色。早在 1982 年，凱因斯經濟學就從 IMF 和世界銀行的走廊抹除了，到了這個十年結束時，美國研究型大學的大多數經濟系——它們協助訓練世界大部分經濟學家——都抱持了廣泛的貨幣主義論點。

這些線索全都在 1990 年代中期，一場猛烈的意識形態攻勢裡匯聚在一起，產出所謂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²⁹ 其效果是將美國和英國的新自由主義模型，界定為全球問題的答案，以及藉此對甚至是日本和歐洲（更

別提世界其他地區了)，施加相當的壓力，迫其採取新自由主義道路。反諷的是，來自中間左派的柯林頓，以及稍後的布萊爾（Blair），出了最多力來鞏固新自由主義在國內和國際上的角色。WTO 的形成，是世界舞台上制度改革的高點。依照其綱領，WTO 替全球經濟互動設定了新自由主義的標準和規則。然而，它的首要目標是盡可能多地打開世界，供不受拘束的資本流動進入（雖然總是有保護關鍵「國家利益」的警告條款），因為這是美國（以及歐洲和日本）的金融力量，從世界其餘地區抽取貢金的能力根基。

這套新自由主義的不均地理發展的概略敘事，指出了它的移植是國家、區域，以及有時候甚至是都市治理暨經濟發展模型之間，多樣化、創新和競爭（有時候是壟斷式的）的產物，而不是由某個霸權勢力像是美國，強行實施了某種模型的教條。我們可以藉由概略檢視中國的特例，替這種情況提出最佳闡述。

中國的特例

1978 年 12 月，面對 1976 年毛澤東過世後的政治不安，以及好幾年經濟停滯的雙重困局，鄧小平以降的中國領導班子，宣布了一項經濟改革方案。這正好跟英國和美國轉向新自由主義解答同時發生，很難不把它想成是具有世界史意義的時勢機遇。其結果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新自由主義，交雜了威權式的集中控制。但是，對於大部分東亞和東南亞地區而言，以南韓、臺灣和新加坡最為明顯，專制統治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連結，已經穩固建立了。就像成形期的智利案例早

已顯示的，獨裁和新自由主義兩者，一點也不會無法共存。

雖然平等主義做為中國的長期目標，並沒有被拋棄，鄧小平主張必須釋放個人和地方的創制力，以便提高生產力和激發經濟成長。某種程度的不平等必然會出現，但這種後果已然被視為必須忍受的事物。在小康——為全體公民提供豐衣足食的理想社會概念——的口號下，鄧小平集中於「四個現代化」（農業、工業、教育，以及科學與國防）。改革致力於將市場力量帶入中國經濟內部運作。這裡的想法是要刺激國有企業之間的競爭，並希望藉此激發創新和成長。雖然引進了市場價格，但這比起政治經濟勢力快速下放給區域和地方，可能就没那麼重要了。為了補充這項努力，中國也向對外貿易和外國投資開放，雖然極為有限，而且接受嚴格的國家監督，因而結束了中國與世界市場的隔絕。向外界開放的一項目標，是要獲得技術轉移。另一項目標是取得足夠外匯儲備，以便購買必要的生產資料，來支持更強勁的內部經濟成長動態。³⁰

中國隨後非比尋常的經濟演變，若非由於世界舞台上的新自由主義轉向，開啓了讓中國大舉進入且納入世界市場的空間，就不會走上這條路，也不會有目前的這般成就了。因此，中國崛起成為全球經濟勢力，有部分必須視為先進資本主義世界的新自由主義轉向所造成的非意圖後果。

這麼說，絕對沒有貶損中國本身改革運動的迂迴道路的重要性。中國人必須學習的許多事情之一，就是如果沒有階級關係、私有財產，以及所有在繁榮的資本主義經濟中，通常能見到的一切其他制度安排的同時變革，那麼，市場在改變經濟方面能做到的很少。沿著這條道路的演變，既緩慢又

經常產生壓力與危機。例如，很明顯的，在 1980 年代，中國傑出成長率的大部分動力，來自集中化的國家部門之外，而不是像中國人希望的那樣，由因為市場改革，以及更具彈性地運用市場價格機制，而變得更有生產力和競爭力的官僚組織化國家部門來推動。即使相較於許多通過地方創制而崛起的地方鄉鎮企業，以及本地私人資本，國有企業得到了更多扶持（部分藉由管制和政治控制，但也透過使用受國家管控的信用的差別機會），情況依然如此。但是，如果成長的發電機位於地方或私人，而非中央政府部門，那麼，維持成長就需要、且最終會要求進一步分散化和私有化。與此相應的，對於自由化的政治要求，於 1989 年對天安門學生運動的驚人鎮壓中達到頂點，顯現了與邁向更大經濟自由化平行的，政治領域中的巨大張力。

對於 1989 年事件的反應，就是發起另一波經濟改革，其中某些改革將中國推得更靠近新自由主義信條。汪暉就此做了以下概述：

貨幣政策成了一項主要控制手段；外匯匯率有了大幅重新調整，朝向統一匯率；出口和對外貿易由競爭機制和自負盈虧的預設來管理；「雙軌」定價系統縮減了範圍；上海浦東開發區完全開放，各種區域性開發地段，也全都上了軌道。³¹

然而，進入中國的第一波外國直接投資，結果千差萬別。起初，這些外資注入了南方沿海區域（鄰近香港被視為有所助益）的四個經濟特區。這些特區的「最初目標，是生

產出口貨品以賺取外匯。它們還擔任社會和經濟的實驗室，以便觀察外國技術和管理技巧。它們對外國投資者提供各種誘因，包括免稅假期、利潤快速匯寄及較佳的基礎設施。」隨後，中國政府指定若干「沿海開放城市」，它們像「經濟特區」那樣，對任何形式的外資開放。但是，外國公司在像汽車與工業製品這些領域裡，開拓中國國內市場的最初嘗試，進展得並不順利。福特的合資企業勉強求生，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公司則於 1990 年代初期失敗。早期明顯成功的唯一部門，是出口高勞動量產品的產業。1990 年代早期，超過三分之二（在存活下來的企業中，比例更高）的外國直接投資，是由海外華人（尤其是來自香港，也有來自臺灣）組織起來的。對資本主義企業的微弱法律保護，使得非正式的地方關係和信任網路有極高價值，海外華人則身處善加利用的有利位置。³²

1997-8 年間，製造業部門裡鄉鎮企業的大規模破產，蔓延到主要都市中心的許多國營企業，這已證明是個轉捩點。價格機制和競爭因而取代了中央政府對區域、出口區及地方的權力下放，成為推動經濟再結構的核心過程。其結果是對許多由國家組織的部門造成嚴重損害（如果不是徹底摧毀的話），並創造出龐大的失業潮。大規模勞工騷動的報導此起彼落，中國政府如果還要繼續存在，就必須面對吸收龐大勞動剩餘的問題。³³ 1998 年以來，中國嘗試通過舉債投資於改造基礎設施的超大型工程計畫，來應付這個問題。他們正在籌畫一項比已然龐大的三峽大壩野心更遠大的工程（耗資至少 600 億美元），將長江水引入黃河。驚人的都市化比率（1992

年以來，已有超過 42 座城市突破百萬人口標準），使得固定資本的巨額投資成為必要。主要城市正在興建新地鐵系統和公路，整合內陸與經濟活躍的沿海地區的 8500 英哩新鐵路正在籌畫，包括連結上海與北京的高速鐵路，以及一條通往西藏的鐵路。在北京，奧運會正推動大量投資（以及大規模人口拆遷）。總體而言，這些建設遠遠超越美國 1950 年代及 1960 年代興建州際高速公路系統時的工程量，有潛力吸收未來好幾年的剩餘資本。然而，這些建設採取了赤字融資（遵循古典凱因斯的方式），如果這些投資無法按適當時程替積累過程帶來價值回饋的話，就會導致高風險，一場國家財政危機就會迅速吞噬中國，嚴重危害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³⁴

29

但是，1997-8 年危機也開了一條路，讓私人資本（尤其是外資）在不承擔其社會義務的狀況下（例如退休金和福利權），接管破產的國有企業。在大量剩餘勞動（1990 年代國家部門的下崗職工接近 5000 萬人，有待吸收的失業農村勞工高達 1.5 億，還在不斷增加），以及方便取得政府支持的信用的條件下，任意重組大多數中國製造業部門的大門，已對外資廣開，尤其是對東亞和東南亞其餘國家的資本，但也向美國和歐洲資本開放。到了 2002 年，超過四成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自外國直接投資（FDI）。從那時候起，中國就成為開發中世界的最大外資接受國（早在 2004 年，即廣泛預期它會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 FDI 接受國）。³⁵ 對中國市場感興趣的多國公司，現在能夠在拓展中獲利了。例如，1990 年代初期於失敗投資中蒙受損失的通用汽車，於 1990 年代末重新進入中國市場，至 2003 年，據報導，它在中國獲得的利潤，遠比美國國內業務來得高。³⁶ 雖然跟這時

候已經不具競爭力的國營企業相比，外國投資者在技術上仍居於劣勢，但根據許多報導，它們相較於本地私人部門，實際上處於優勢，這些私人部門仍然苦於某些重大禁制，以及國家及國家掌控的銀行系統裡的隱藏性貪腐成本。這些都對製造業中，外國（包括海外華人）投資相對於本地資本的主導角色有所裨益。

30 但是，這場龐大運動的法律制度基礎，依然靠不住。非正式的土地和房地產市場已經興起，尤其是在都市周邊地區。與此相隨的是強大的原始積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浪潮。例如，村社領導經常擔任共同土地和資產的實際產權代表，跟外國投資者協商，而這些產權後來就被確認為他們的個人私產了，這實際上是侵吞公有資產，只有少數人獲益，大多數人民卻蒙受損害。在這場轉型的混亂中，汪暉寫道，「龐大國家資產以『合法』或非法方式轉移，滿足了一小群人的私人經濟利益。」³⁷ 即使在缺乏私有財產權或產權不明的狀況下，土地與房地產市場的投機依然風行，尤其是在都市地區。然而，2004年，私有財產權正式納入中國憲法，顯示了往承認本地企業家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方向邁進，這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典型。允許企業家加入共產黨的做法，造就了某種「公私合夥」治理系統的可能性，如我們已經說明過的，這是新自由主義國家的特徵。

簡言之，中國經歷了劇烈的資產階級和資本家階級形成的過程（而不是像美國那樣，是既有階級力量的復辟）。³⁸ 當然，共產主義從來沒有消除過中國經濟中的結構性不平等。城鄉差異甚至被寫入法律。但是，在改革的條件下，汪暉寫道，「這種結構性不平等很快轉變為不同階級、社會階層和

區域之間的收入差異，迅速導致社會兩極化。」³⁹ 中國也已經（很像美國雷根時代）演變為一個非常獨特（而且幾乎肯定是很不穩定）的混合體，包括國家指導下的凱因斯式基礎設施計畫赤字融資，更放任的私有化新自由主義，以及威權統治下階級力量的鞏固。中國對外國貿易、外資流入和外國影響開放，伴隨而來的壓力和機會，無疑也扮演重大角色。歷經一段轉型期後，中國於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原則上也將約束中國於世界市場上遵守新自由主義法則。但是，國家和共產黨的權力（以及他們任意訴諸獨裁作為的能力），以及轉型過程的特殊條件，也構成中國案例某些非常不同的特色。中國的這種配置構造，能否僅憑它在世界舞台上的競爭力，反過來對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道路發揮強烈影響力，還有待觀察。相較於內蘊在新自由主義中的，較為隱密的反民主傾向，中國公然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就格外麻煩。這意味了，不僅在美國，而且在某些歐洲國家（尤其是義大利），朝著新保守主義轉變，可能是新自由主義內部反民主傾向的深化，而不是徹底背離。中國的競爭分量，可能會替這種威權主義趨勢增添動力。

31

然而，中國不是全球舞臺上的唯一潛在競爭者，因為俄羅斯和印度（這裡僅舉兩例）的階級轉變，也可能帶來跨越自身邊界的影響。⁴⁰ 新的系統聯盟，像是於坎昆（Cancun）會議形成的巴西、印度、中國、南非和其他國家之間的結盟，可能標誌了全球政治中全然不同勢力的崛起，這種勢力將和 1955 年在萬隆（Bandung）形成的結盟（在冷戰兩極對抗中，創造一個不結盟國家集團）同等重要，如果就潛力而言沒有更重要的話。然而，所有這一切都顯示了，我們面對

的不是新自由主義從某個霸權核心的任何單純「輸出」。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必須視為一個去中心且不穩定的演變過程，其特徵是不均地理發展，以及各種政治經濟勢力的動態中心之間的競爭性壓力。

成就：奪取式積累的復現

在什麼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新自由主義轉向解決了資本積累欲振乏力的問題？它在刺激經濟成長上的實際成績，可說是令人沮喪。1960年代，總體經濟成長率在3.5%左右，既使在艱困的1970年代，也只降到2.4%。但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全球經濟成長率只有1.4%與1.1%（2000年之後，勉強接近1%），這指出了新自由主義基本上無法刺激全球成長。⁴¹那麼，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被說服相信，新自由主義是「唯一出路」，並且已經非常成功了呢？原因有二。首先，地理不均發展的日趨反覆無常，使得某些特定疆域以其他地方為代價，產生了驚人的進展（至少是暫時性的）。例如，如果1980年代大致上屬於日本、亞洲「小龍」和西德，而1990年代屬於美國和英國，那麼「成功」必定會在某處發生的這個事實，卻模糊了新自由主義普遍失敗的事實。其次，從上層階級的角度來看，新自由主義確實是大舉成功。它不是復辟了統治菁英的階級力量（在美國，以及某個程度上的英國），就是替資本家階級形構創造了條件（像是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其他地方）。在這兩種情況下，真正重要的都是不平等的加劇。⁴²透過由上層階級利益掌控的媒體，可以宣傳某些疆域之所以落敗，是因為競爭力不夠的神話（因而

替更多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搭設了舞台)。疆域內部漸增的社會不平等有其必要，以便鼓勵企業風險和創新，藉此帶來競爭力，並且刺激成長。如果底層階級生活條件惡化，那他們的落敗也要歸因於個人及文化局限，沒能提高自己的人力資本(辦法是致力於教育，獲得新教工作倫理，接受工作訓練及彈性等等)。簡言之，會出現特定問題，都是由於缺乏競爭力，或是怪罪個人、文化和政治上的缺點。這種論調還指出，在一個達爾文主義的世界裡，唯有適者才應該生存，也確實存活下來。系統性問題被意識形態宣告的暴風雪掩蓋，也掩埋於大量地方化的危機底下。

如果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成就，是重分配而不是生產，就必須找到轉移資產和重分配財富與收入的辦法，不管是從大眾手中轉移到上層階層，還是從貧弱國度轉移到富裕國家。我曾經在其他地方以「奪取式積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為題，解說過這些機制。⁴³ 我所謂的奪取式積累，是指馬克思視為資本主義萌芽期間的「原始」或「原初」積累作法的延續和滋長。這包括了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強制驅離農業人口(像最近印度和墨西哥發生的情形)；將各種形式的財產權(公共、集體、國有的等)，轉換為排他性的私人財產權；壓制使用公地的權利；勞動力的商品化，壓抑另類(本土)的生產與消費形式；殖民、新殖民與帝國主義對資產(包括天然資源)的占有過程；交易和稅收的貨幣化，尤其是土地方面；奴隸貿易(尤其是在性產業裡持續發生)；以及高利貸、國債，還有最具破壞性的，利用信貸系統做為原始積累的激烈手段。國家挾其對於暴力的壟斷和合法性的界定，在支持和促進這些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現在，在這個機制名單上，我們還可以增添許多額外伎倆，像是從專利權和智慧財產權中抽取租金，以及減少或抹除各種形式的、通過一代甚至好幾代的社會民主階級鬥爭才贏得共同財產權（諸如國家退休金、帶薪假期、接受教育和醫療的權利等）。例如，將全部國家退休金予以私有化的提議（智利在獨裁統治下率先推行），是美國新自由主義分子懷抱的目標之一。

在中國和俄羅斯的例子裡，以「原始」和「原初」的角度來談論近期事件，應該還算合理，至於在美國和其他地方，讓資本家菁英重獲階級力量的那些行徑，最好描述為奪取式積累的持續過程，它們在新自由主義底下迅速臻於顯著地位。就此，我分析出四個主要元素：

1. 私有化

對既有的公共資產的公司化（corporatization）、商品化和私有化，一直是新自由主義計畫的鮮明特徵。其首要目標是在迄今被視為牟利禁區的領域，替資本積累開闢新領地。各式各樣的公用事業（水、電訊、運輸）、社會福利（公共住宅、教育、健康照護、退休金）、公共機構（像是大學、研究實驗室、監獄），甚至是戰爭（在伊拉克武裝部隊旁邊工作的私人承包商「部隊」，就是一例），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裡，都有不同程度的私有化。通過世界貿易組織底下所謂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TRIPS）協定而建立的智慧財產權，將遺傳物質、種籽原生質（seed plasmas）及各種其他產品，都定

義為私有財產，於是可以藉此向使用者收取租金，但正是這些使用者的活動，在這些遺傳物質的發展上扮演了關鍵角色。生物剽竊（biopiracy）十分猖獗，對世界遺傳儲備物資的掠奪，正在替少數大型製藥廠創造利益。全球環境公共資產（土地、空氣、水）的耗損持續升高，以及不斷擴大的棲息地剝蝕，造成除了資本密集的農業生產模式外，什麼都不能做，這些都是各種形式的自然全面商品化的後果。文化形式、歷史與知性創意（通過觀光業）的商品化，也導向了大規模剝奪（在占用和奪取草根文化與創意上，音樂產業已是惡名昭彰）。像過去一樣，國家權力經常被用以強行推動這些過程，即使是違逆民眾意願。旨在保護勞動和環境免於惡化的管制架構，其撤除退縮必然會導致權利淪喪。以新自由主義信條之名來追求的最惡劣劫奪政策之一，就是將歷經多年艱苦階級鬥爭才贏得的公共財產權利（享有國家退休金、社會福利和國家健康照護）逆轉回到私人領域。所有這些過程，都形同將資產從公共和人民領域，轉移到私人及階級特權領域。洛伊（Arundhati Roy）提到印度的例子時，主張私有化導致「生產性的公共資產從國家轉移到私人公司。這些資產是由代表人民的國家，替人民代管的……竊走它們，將它們視同股票賣給私人公司，是史上前所未見的大規模野蠻劫奪過程。」⁴⁴

2. 金融化

1980 年以後展開的強大金融化浪潮，以其投機和掠奪風格著稱。國際市場上金融交易的每日成交總額，從 1983 年的 23 億美元，攀升到 2001 年的 1,300 億美元。2001 年的 40 兆美元年成交總額，與據估計支撐國際貿易和生產所需的大約 800 兆美元投資流量，形成了對比。⁴⁵ 解除管制使得金融體系成為透過投機、掠奪、詐欺和偷竊來進行重分配活動的主要中心。股票促銷 (stock promotions)、龐氏騙局 (ponzi schemes)、^{*1} 藉由通貨膨脹來實行的結構性資產破壞、藉由合併與買進來榨乾資產、負債 (debt incumbency) 程度提高 (使得甚至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民眾，都陷入以勞役償債的地步)，更別提公司詐騙、透過操縱信貸和股票來奪取財產 (因為股票和公司崩潰而劫奪或摧毀了退休基金) —— 這一切都成為資本主義金融系統的核心特點。對股票價值的重視 (此乃源於資本所有人和資本管理者的利益，透過給予管理者股票選擇權而結合在一起)，正如我們現在知道的，會導致對股票市場的操縱，替少數人帶來巨大財富，卻犧牲了大多數人。安隆 (Enron) 公司宛如奇觀的崩潰，象徵了剝奪許多人生計和退休權利的普遍過程。此外，我們還必須看到，由避險基金 (hedge funds) 和其他金融資本的主要機構造成的投機性突襲，因為這些構成了全球舞台上奪取式積累的真正前鋒，即使它們被假想為能替資本家階級帶來「分散風險」的正面好處。⁴⁶

*1 (譯註) 即臺灣俗稱的老鼠會，又稱金字塔騙局，以超出行情的高額報酬誘人投入資金，然後利用新加入者的錢來支付報酬給先行參加者。一旦新投入的資金不足以支付報酬，騙局就會被揭穿。

3. 危機的管理與操縱

35

除了大部分新自由主義金融操縱特有的投機性、且經常是欺騙性的泡沫外，還有一個更深刻的過程，導向以觸動「債務陷阱」做為奪取式積累的主要手段。⁴⁷ 全球舞台上危機的創造、管理和操縱，已經演變成爲一門刻意將財富從貧窮國家重分配到富裕國家的精緻藝術。1979年，沃爾克（Volcker）突然提升利率，抬高了借款國家必須支付債務利息的外匯收入比例。由於被迫破產，像墨西哥這樣的國家，只好同意實施結構調整。雖然美國宣稱它的角色是高貴的領導者，負責組織「保釋」（bail-outs）來維持全球資本積累穩定和上軌道，但美國也可以利用地方危機的情勢，部署其優勢金融力量，爲掠奪墨西哥經濟打開大門。這就是美國財政部／華爾街／IMF 複合體，在每個地方都很擅長的勾當。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葛林斯潘（Greenspan），曾於1990年代多次運用沃爾克的伎倆。個別國家的債務危機在1960年代並不普遍，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卻變得很頻繁。幾乎沒有任何開發中國家能夠倖免，在某些案例中，例如拉丁美洲，這種危機多到可以視爲風土病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這些債務危機得到協調、管理和控制，以便合理化整個系統，並且重分配資產。威德與凡納羅索（Wade and Veneroso）在提到1997-8年間的亞洲金融危機（最初是以美國爲根據地的避險資金操作所引發的）時，掌握了這一切過程的本質：

金融危機總是造成所有權和權力轉移到能保護自身資產無損，以及能創造信用的人手中，亞洲危機也不例外……

毫無疑問，西方和日本公司是最大贏家……。大規模貶值、IMF 推動的金融自由化，以及 IMF 促成的復甦，結合起來甚至可能造成了過去 50 年以來，全世界承平時期的最大規模的國內資產向海外所有者的轉移，使得 1980 年代拉丁美洲及 1994 年墨西哥從國內向美國所有者的資產轉移，相形見绌。這令人想起美隆（Andrew Mellon）的一句話：「在蕭條時期，資產會回歸當然的所有者手中。」⁴⁸

36

這種情形跟刻意造成失業，以便產生大量低薪剩餘勞動，方便進一步的積累，可說是如出一轍。就這樣，有價值的資產被廢棄無用，從而失去了價值。它們只能休耕和冬眠，直到掌握了流動性的資本家攫取它們，賦予它們新生命。然而，危險在於，危機可能會脫疆失控，變得普遍化，或者，可能會出現反叛，對抗製造危機的體系。國家干預和國際機構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協調危機和貶值，以便從事奪取式積累，而不致引發全面崩潰，或是激起民眾反叛。由華爾街／財政部／IMF 複合體執行的結構調整方案，要顧慮的是前者，同時，擔任中間人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得到帝國勢力的軍事援助撐腰），在遭掠奪的國家內部的工作，就是確保後者不會發生。但是，民眾反抗的跡象很快就開始出現，首先是 1994 年查巴達（Zapatista）於墨西哥起義，不久之後，隨著反全球化運動而浮現的普遍不滿，在西雅圖的暴動中獲得了經驗。

4. 國家重分配

國家一旦轉變為一套新自由主義的機構，就變成重分配政策的主要能動者，把社會民主主義霸權時期曾經發生的，從上層階級流向下層階級的重分配，逆轉過來。國家首先是推行私有化方案，然後刪減支持社會工資（social wage）的國家支出。即使私有化看起來好像會替下層階級帶來好處，它的長期效果可能是負面的。例如，乍看之下，柴契爾在英國推動的公共住宅私有化方案，是送給下層階級的禮物，他們現在可以付出相對較低的成本，從房客身分轉變為屋主，控制有價值的資產，增加他們的財富。但是，一旦移轉完成，尤其是在首要的核心區位，房地產投機就接手了，最後透過收買或強迫的手段，使低收入人口遷移到像倫敦等城市的周邊，將先前工人階級的住宅區，改裝為高度縉紳化（gentrification）的核心。失去了核心地區負擔得起的住宅，造成許多人無家可歸，而那些從事低薪服務業工作的人，也必須長途跋涉通勤。墨西哥合作農場（ejidos）的私有化，是1990年代制定的新自由主義方案的核心內容，對墨西哥農民的前景，也有類似效果，迫使大量鄉村居民離開土地，到城市找工作。中國政府也依循一連串嚴格步驟，將資產授予一小群菁英，卻損害了大多數人民利益。

新自由主義國家也嘗試通過各種其他手段來從事重分配，像是修訂稅法，以利於投資報酬而非收入和薪資；提升稅法中的累退成分（例如銷售稅）；將國家開支和全民免費近用，轉變為使用者付費（例如高等教育）；以及提供企業大量各式補貼和稅收減免。美國現有的聯邦、州及地方層級

的公司福利方案，等於將巨額公款用於替公司牟利（例如，對農企業的直接補貼，以及對軍事工業部門的間接補貼），情況很類似於美國實施的抵押貸款利率的稅賦減免，是對高所得家庭住宅擁有者及營造業的補貼。監視和警政措施（policing）的升高，以及在美國的情況裡，對人口中反抗分子的監禁，顯示了強硬社會控制的角色益加陰險了。在開發中國家，對於新自由主義和奪取式積累的反抗比較強烈，新自由主義國家很快就擔任了積極壓制反對運動，甚至是從事小規模戰鬥的角色（這些反對運動中，有許多現在可以方便地扣上「恐怖主義」的帽子，以獲得美國軍事援助和支持），像是墨西哥的查巴達，或是巴西的無土農民運動。⁴⁹

實際上，洛伊的報導指出，「養活七億人的印度農村經濟正遭到扼殺，收成太好的農民陷入困境，收成太差的農民也同樣貧困，由於大地主和農場解雇工人，沒有土地的農業勞動者失業了。他們全都湧入城市找工作。」⁵⁰ 在中國，據估計，如果希望避免農村動盪和反叛，就必須在未來十年裡，藉由都市化吸收約 5 億人口。不過，他們會在城市裡頭做什麼還不清楚，如我們所見，正進行中的龐大實質基礎建設計畫，可以吸收一部分由原始積累釋放出來的剩餘勞動力。

新自由主義的重分配策略既廣泛又複雜，還經常以意識形態優勢手段來掩飾，但毀傷了弱勢人民和疆域的尊嚴與福祉。全球正義運動已經做了許多努力，揭露加速中的奪取式積累過程的手段與後果。剩下來的問題是，針對這些過程的反抗，過去曾經如何組構，以及可以怎樣接合得更好。

新自由主義內部的矛盾與對立

新自由主義內部滋生了廣泛的反抗文化。然而，這些反抗傾向於接受新自由主義的許多基本論點，而且聚焦於內部矛盾。典型上，它們會嚴肅看待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問題，並且拿來對比於威權主義，以及政治、經濟和階級力量經常出現的專斷行徑。它採納了新自由主義有關改善全民福祉的修辭，但譴責新自由主義沒能實現這些說詞。例如，考察一下新自由主義方案的典範，即 WTO 協議的第一個實質段落。其目標是：

38

提高生活水準、完全就業、實質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大幅穩定成長，以及擴大財貨和服務的生產與貿易，同時按照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考慮對世界資源的最佳利用，嘗試既保護和維護環境，又以符合它們在不同經濟發展水準上的需要和關切的方式，來提升這麼做的手段。⁵¹

類似的虔誠願望，可見於世界銀行的宣言（「減少貧窮是我們的首要目標」）。這些宣示中，沒有哪個跟支持復辟和創造階級力量的實際行徑相處融洽的。

從違反人權角度發出的反對聲浪，大約自 1980 年以來，變得格外顯眼。在那之前，據錢德勒（Chandler）指稱，像《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這樣的著名刊物，卻沒有登過一篇有關人權的文章。⁵² 人權議題在 1980 年代以後，開始引人注目，1989 年天安門事件和冷戰結束後，更是迅速發展。這正好對應了新自由主義的軌跡，而且這兩種運動也深深糾結在一起。無疑的，新自由主義堅持個體是政治經濟生活之

基礎和本質性要素，確實替廣泛的個人權利行動主義打開了大門。但是，由於著眼於這些權利，而不是關注創造和再造實質且開放性的民主治理結構，反對派採取的辦法，就無法避免落入新自由主義的陷阱。新自由主義對個體的關注，被容許凌駕於任何社會民主主義對平等、民主及社會團結的關切。例如，經常訴諸法律行動，就是接受了從議會到司法暨行政權力的新自由主義轉移。但是，走法律程序既昂貴又費時，而法院無論如何還是嚴重偏袒統治階級利益，這既見於司法界的階級忠誠，也呈現於法律判決的整個歷史，在大部分資產階級民主制中，司法判決都會偏愛私有財產權和利潤率，勝過平等權利和社會正義。法律取代了政治，「成為在公開場合表述需要的載體。」錢德勒的結論是，「正是自由主義菁英對尋常百姓和政治過程的幻想破滅，引領他們更加關注享有權利的個體，把他們的事情交給法官來聆聽和決定。」⁵³

39

由於許多貧窮個人缺乏追求自身權利的財務資源，因此這項理想得以表述的唯一方式，就是形成辯護團體（advocacy groups）。辯護團體和非政府組織（NGO），跟一般性的權利論述一樣，伴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轉向而興起，大約 1980 年以後，有更加驚人的增長。在許多情況中，NGO 都踏入了由於國家撤離活動而遺留的社會供應真空。這形同一個由 NGO 進行的私有化過程。在某些情況中，這似乎有助於加速國家進一步退出社會供應領域。因此，NGO 的功能，就成了「全球新自由主義的特洛伊木馬」。⁵⁴再者，NGO 不是民主機構。它們傾向於菁英主義，不擔負責任，並且就定義上來說，也遠離那些他們要保護或幫助的人，而不論它們立意多麼良善。它們通常隱藏了議程，偏好與國家及階級勢力直接

協商或施加影響。它們通常會控制它們的委託人，而不是代表他們。他們宣稱且假定要替那些無法自行發聲的人說話，甚至界定了那些他們所代言者的利益（宛如人們自己辦不到這一點），但它們地位的正當性，總是令人懷疑。⁵⁵ 例如，當某些組織成功鼓吹了禁止於生產中使用童工，視之為普遍人權課題時，它們卻可能在童工是生存要件的地方，破壞了經濟。在沒有任何可行的經濟替代出路下，這些兒童可能會被販賣從娼（留給另一個致力消除童妓的辯護團體來解決）。「權利話語」所預設的普遍性，以及 NGO 和辯護團體對普遍原則的信奉，與地方特殊性及政治經濟生活中的日常實踐，無法和諧共存。⁵⁶

但是，這種特殊的反抗文化為何近年來如此受人重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奪取式積累所要求的一套實踐，非常不同於透過在工業和農業中擴大薪資勞動而進行的積累。後者曾在 1950 和 1960 年代，主導了資本積累過程，其所激起的對抗文化（像是鑲嵌於工會和勞工階級政黨中的文化），造就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折衷方案。另一方面，奪取卻是片斷而特殊的——這裡產生了私有化，那邊是環境惡化，另一處則是債務金融危機。如果不訴諸普遍原則，就很難去對抗這一切具體而特殊的現象。奪取造成權利喪失。因此，就會轉向有關人權、尊嚴、可持續的生態實踐、環境權等普遍性的修辭，做為統一的對抗政治的基礎。

40

這種對權利普遍主義的訴求，是一把雙刃劍。懷抱進步目標的人，可能且可以加以運用。以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無國界醫師組織（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和其他組織為其燦爛代表的傳統，不能當成只是新自由主義思

想的附屬品而拋棄。人文主義（或譯人道主義）（包括西方——古典自由主義——與各種非西方版本）的整個歷史，遠比這要複雜得多了。但是，許多權利論述的有限目標（例如，直至最近，國際特赦組織的焦點還是僅關注民權和政治權，而不及於經濟權利），使它們很容易被納入新自由主義的框架。普遍主義似乎與氣候變遷、臭氧層破洞、棲地破壞造成生態多樣性喪失等全球議題，特別能夠相處。但是，由於世界各地的政治經濟環境與文化實踐的多樣性，它在人權領域的結果就比較成問題。再者，將人權議題納編成為「帝國之劍」（借用巴索羅繆與布瑞克斯皮爾〔Bartholomew and Breakspear〕一針見血的說法），⁵⁷ 實在是太容易了。例如，美國所謂的「自由之鷹」（liberal hawks）曾經訴諸人權議題，來正當化它們對科索沃（Kosovo）、東帝汶（East Timor）、海地（Haiti），以及最重要的，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帝國主義干預。他們「以保護自由、人權和民主之名」，來替軍事人道主義（military humanism）的正當性辯護，「即使這是自封的帝國主義勢力（如美國）的單邊企圖。」⁵⁸ 更廣泛來看，很難不同意錢德勒的結論：「今日以人權為基礎的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根源，在於 1970 年代以來，支持了西方干涉開發中世界內部事務的漸增同意。」其關鍵論點「是，國際機構、國際和國內法庭、NGO 或倫理委員會，要比民選政府更能夠代表人民的需要政府和民選代表之所以令人懷疑，正因為他們必須為其選民負責，因而被認為有「特殊」利益，而不會按照倫理原則行事。」⁵⁹ 在國內，後果也一樣險惡。其結果是縮小了「公共政治辯論，辦法是正當化司法及非經選舉的任務編組與倫理委員會逐漸形成的決策角色。」

其政治後果可能是削弱了力量。「人權的管制全然沒能挑戰我們原子化社會的個人隔離與消極被動，只能將這些區分加以制度化。」更糟的是，「由人權的倫理論述提出來的，有關社會世界的墮落景象，就像任何菁英理論一樣，只是替維持統治階級的自我信念服務。」⁶⁰

41

秉持這種批判，我們很容易迴避一切對普遍事物的訴求，認為它們有致命缺陷，並拋棄一切有關權利的說詞，視為那是利用站不住腳的抽象倫理，來掩蓋階級力量的復辟。雖然這兩種主張都值得認真考慮，但我認為，放棄這個領域，讓給新自由主義霸權，是很不幸的。我們還要打一場硬仗，這不僅涉及了在特定情況下，要召喚哪一種普遍性和哪一種權利，也牽涉了該如何建構普遍原則和權利概念。在這方面，做為一組特殊政治經濟實踐演變產物的新自由主義，以及逐漸訴諸普遍事物、倫理原則和特定類型的權利，來構成道德和政治正當性的基礎，這兩方之間的關鍵連結，應該值得我們注意。布瑞默的命令給伊拉克強加了某種權利概念。同時，他們也違反了伊拉克的自決權利。「兩種權利之間」，馬克思在有關工作日長度之鬥爭的章節裡，有段著名的評論中說道，「由力量裁決。」如果階級復辟需要實施一套特殊權利，那麼對這種強制施行的抵抗，也就需要導向爭取完全不同權利的鬥爭。

例如，正義做為一種權利的正面意義，在政治運動中曾經是個強大的鼓動者：反抗不正義的鬥爭，曾經有力地鼓舞了邁向社會變革的運動。當然，問題在於，有無數種我們可以採用的正義概念。但是分析顯示，某種主導性的社會過程，會標舉且立足於某種正義和權利的概念。挑戰這些特殊

權利，也就是挑戰它們置身其中的特定社會過程。反之，已然證明，若不同時改變對某種主導性的權利和正義概念的信奉，而轉移到另一種，就不可能使社會擺脫某種主導過程（像是透過市場交換展開的資本積累），轉移到另一種過程（例如，政治民主和集體行動）。⁶¹一切有關權利和正義的唯心論解說，其困難正在於它們掩蓋了這種連結。唯有當它們牽涉了某個社會過程而落回到現實中，才能找到社會意義。

42

譬如，我們考察新自由主義的情況。權利圍繞著兩種主導性的權力邏輯——疆域國家（territorial state）的邏輯和資本的邏輯。⁶² 首先，考慮國家權力。無論我們多麼企盼權利是普遍性的，還是必須有國家機器的保護，才能實行這些權利。如果政治權力不願意，那麼權利觀念就是空話。在這種情況下，權利基本上是衍生自公民身分，並以其為條件。於是，管轄範圍的疆域性，就會是個議題。這會有兩方面的作用。由於有無國籍人士、無證件移民、非法移民等，困難隨之出現。在國族國家或地域國家疆域內，誰是或誰不是「公民」，就成了一個嚴肅議題，界定了包含（inclusion）與排除（exclusion）的原則。在權利方面，國家如何行使主權，本身就是個有爭議的議題，但是，根據鑲嵌於新自由主義資本積累中的法則，這種主權受到了限制（中國正在發現這件事）。即使如此，國族國家以其對正當暴力形式的壟斷，可以依照霍布斯（Hobbes）的方式，來界定自己的一套權利，以及對權利的解釋，而國際公約對此僅有鬆散的約束。舉一例來說，美國堅持認為，自身有權不對國際領域界定的反人道罪行（crime against humanity）負責，同時，它卻堅持，別處的戰犯應該被帶上法庭受審，而這個法庭正是它在涉及自己的

公民時，否定其權威的那同一個法庭。

生活在新自由主義底下，還意味接受或順從資本積累所需的那一套自由主義權利。因此，我們生活在個體（要記得，公司在法律中也被定義為個體）擁有的不可剝奪的私有財產和利潤率權利，凌駕於其他任何你能想像得到的不可剝奪權利概念的社會裡。這種權利體制的捍衛者，貌似合理地主張，它鼓舞了「資產階級美德」，沒了這種美德，世界上所有人的生活都會更糟糕。這些美德包括：個人責任和義務、獨立於國家干預（這經常造成這種權利體制與國家界定的權利體制之間的嚴重對立）、市場及法律面前的機會平等、對創見與企業家進取努力的報酬、關注自己和自己的事物，以及一個容許在契約和交換方面有廣泛選擇自由的開放市場。這種權利系統在延伸到有關自己身體的私有財產權（這支持了個人自由簽訂契約以出賣自身勞動力的權利、獲得尊嚴和尊重待遇的權利，以及免於像奴隸制那樣的身體強迫的權利），以及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時，看起來更具說服力。我們必須承認：這些衍生權利很動人。我們之間有很多人深深仰賴這些權利。但是，我們卻像是靠富人餐桌上的殘羹剩肴討生活的乞丐。讓我提出解釋。

我無法僅憑哲學論點，說服任何人新自由主義權利體制的不公正。但反對這種權利體制的理由卻很簡單：接受它，就等於接受了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夠生活在無論會造成什麼社會、生態或政治後果，都要持續無盡的資本積累和經濟成長的體制底下。相對的，無盡的資本積累意味著，新自由主義的權利體制必須在地理上擴展到全球，必要的話，就透過暴力（如智利和伊拉克）、帝國主義行徑（像世界貿易組織、

IMF 和世界銀行的行爲)，或原始積累（例如中國和俄羅斯）。私有財產和利潤率不可剝奪的權利，將不擇手段地普遍建立。這正是布希提到美國致力將自立和自由的領域推廣到全球時，真正的意思。

但這些並非我們能夠獲得的唯一一組權利。即使在像聯合國憲章所鋪陳的自由主義概念內部，也有諸如言論與表達自由、教育和經濟安全、組織工會等衍生性權利。堅持主張這些權利，將會對新自由主義霸權行徑構成嚴重挑戰。將這些衍生權利變成基本權利，把私有財產和利潤率等基本權利變成衍生權利，將會導致一場意味深遠的政治經濟實踐的革命。我們還可以訴求全然不同的其他權利概念——例如，對全球公共資源或基本糧食安全的近用權。「兩種對等權利，由力量裁決」的原則，以及有關正確合宜之權利概念的政治鬥爭，將可能性及替代出路要如何呈現、表述，以及最終形成轉變性的政治經濟實踐的問題，推向了舞台中央。如巴索羅繆和布瑞克斯皮爾所主張的，重點在於，「恢復人權政治，使其成為明白反抗帝國主義的批判性寰宇主義計畫的一環」，我還會加上，反對新自由主義本身。⁶³ 不過，我們在結論的地方，才回頭談這個課題。

新保守主義的回應

在反思中國最近的歷史時，汪暉指出：

在理論層次上，諸如「新威權主義」、「新保守主義」、「古典自由主義」、市場極端主義、國家現代化之類的論

述敘事……都與新自由主義的構成有某種密切關聯。這些術語的相繼替代（甚至是它們之間的矛盾），展現了權力結構在當代中國，以及更廣大的當代世界裡的轉變。⁶⁴

在政治權力的威權主義、軍國主義和階層意義上，新保守主義與菁英統治和不信任民主的新自由主義議程，可說是完全一致。從這個觀點來看，新保守主義似乎只是除掉了威權主義的面紗，而新自由主義卻試圖藏身其中。但是，新保守主義的確針對新自由主義的一個核心矛盾，提供了獨特的解答。如果「沒有社會這種東西，只有個人」，就像柴契爾最早所說的那樣，那麼，個人利益的混亂最終將輕易壓垮秩序。市場、競爭與放縱的個人主義的無政府狀態（個人的希望、欲望、焦慮和恐懼；生活風格、性癖和性傾向的選擇，自我表現的方式，以及面對他人的行為），將會造成越來越無法治理的情勢。它甚至可能導致所有團結紐帶的崩潰，瀕臨社會無政府狀態與虛無主義的處境。

44

面臨這種狀況，爲了恢復秩序，一定程度的強制勢不可避免。新保守主義分子偏好且強調軍事化，以此做爲矯治個人利益混亂的手段。因此，他們更可能強調對國族完整與穩定的威脅，無論是真實或想像的，是國內、還是國外的威脅。在美國，這就導致引發了霍夫施塔特（Hofstadter）所稱的「美國政治的偏執狂風格」，即國家被描述爲處於內外敵人圍攻和威脅的狀態。⁶⁵ 這種政治風格在美國的歷史很悠久，而且它仰賴培養出一種強烈的國族主義感受。在整個 20 世紀裡，反共曾是這種政治的核心焦點（雖然無政府主義，以及對中國和移民的恐懼，過去也曾扮演這種角色）。因此，新保

守主義其實並不新，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它就在強大的軍工複合體裡找到了家園，這種複合體在永久軍事化中有其既定利益。但是，冷戰終結提出了美國安全的威脅來自何方的問題。激進的伊斯蘭教和中國，成為外部威脅的兩大備選，而抱持異議的內部運動（在瓦科〔Waco〕被燒成灰燼的大衛教派〔Branch Dravidians〕、支援奧克拉荷馬州爆炸事件的民兵運動、洛杉磯金恩〔Rodney King〕被毆事件激起的暴動，以及最後是 1999 年在西雅圖爆發的騷亂），也必須運用更嚴密的監視和警政手法，鎖定為內部目標。1990 年代真實現身的，在 9/11 事件中達到頂峰的激進伊斯蘭教威脅，最後登上前台，成為宣布打一場永久「反恐戰爭」的核心焦點，要求在海內外都實施軍事化，以便保障國家安全。雖然，很清楚的是，針對紐約世界貿易中心的兩次攻擊所揭示的威脅，需要某種形式的警察／軍事反應，新保守主義分子的掌權，則在朝向海內外的普遍軍事化中，保證了一種壓倒性的，而且在許多人的判斷中是過度的反應。

45

雖然新保守主義者很願意實施強制力量，他們還是承認某種程度的同意是必要的。因此，新保守主義嘗試恢復一種道德目標感，某種可以形成政治統一體（body politic）之穩固中心的更高層價值。其目標在於藉此控制新自由主義精神內部，威權主義和個人自由之間的明顯矛盾，並反制新自由主義經常會產生的個人利益亂局造成的解體後果。它一點也沒有偏離建構或恢復主導性階級力量的新自由主義議程。但是，它藉由環繞核心道德價值來建構一種同意的氣氛，替這種權力找到正當性。這立即提出了哪些道德價值應該位居核心的問題。例如，完全有可能訴諸鑲嵌於美國權利法案中的

那種自由主義人權體系：畢竟，人權行動主義的目標，就像卡多爾（Mary Kaldor）說的，「不僅是干預以保護人權，還要創造一個道德共同體。」⁶⁶但這卻跟軍事化的轉向扞格不一。

在美國，成為新保守主義運動核心的道德價值，最好是理解為 1970 年代建立的特殊結盟的邏輯產物，其中一方是企圖恢復階級力量的菁英階級和商業利益，另一方是心有不甘的白人勞工階級「道德多數」選民基礎。這些道德價值的核心是，文化國族主義、道德正直、基督教（屬於某種福音教派）、家庭價值與生命權議題，以及敵視新社會運動（女性主義、同性戀權利、優惠待遇、環境主義等）。雷根主政期間，這種聯盟主要是戰術性的，到了柯林頓時期，國內混亂推動了這種道德價值論點，於小布希的共和主義中攀到議程頂端。現在，它已經成為新保守主義運動道德議程的核心。

這種意識形態的鞏固，在國內外都有其意涵。在國際舞台上，「美國價值」優越性的鼓吹，以及將它們呈現為適合全人類的「普遍價值」，是無可避免的。這種情形宛如美國要在世界舞臺上發動（認定由它來代表的）「文明化價值」的（貨真價實的）「十字軍聖戰」。美國在全球舞台上的行徑所牽涉的國族主義，變得非常明顯，這種道德聖戰感則會影響日常外交，尤其是涉及以巴衝突時，強烈信仰世界末日善惡決戰（Armageddon）的美國基督教右派，認為這場衝突是自身命運的關鍵。美國的道德優越感，在國內關閉了開啓對話和勸服協商可能性的同時，於世界各地激起了敵對。布希政府的新保守主義轉向，在世界地緣政治關係中創造出截然不同的氣氛，與柯林頓執政時期在多元文化新自由主義下的追求大相逕庭。

但是，如果把這種新保守主義轉向，看成是例外或專屬

美國的現象，那就錯了，即使美國確實有一些其他地方可能沒有的特殊元素在運作。在美國，這種道德價值的主張深刻仰賴對於國族、宗教、歷史、文化傳統等理想的訴求，但這些理想絕非僅限於美國。例如，日本和中國國族主義情緒的上揚，最近幾年裡十分明顯，在兩國的情況裡，這都可以視為一劑解藥，藉以對抗在新自由主義衝擊下，先前社會團結紐帶的崩潰。文化國族主義的強大潮流，在當今構成歐盟的舊國族國家（如法國）裡，也開始擾動激化。宗教和文化國族主義也在印度國族主義黨（Hindu Nationalist Party）近期新自由主義實踐的成功輸入背後，提供了道德力量。在伊朗革命及隨後的轉向威權主義中，對於道德價值的召喚，並未導致伊朗完全拋棄新自由主義實踐，即使這場革命鎖定的正是放任的市場個人主義的墮落。類似的衝力也位於新加坡和日本等國家盛行的長期道德優越感背後，這種優越感對比的是他們所認定的，美國「墮落」個人主義和面目模糊的多元文化主義。新加坡的例子特別有啟發性。它結合了市場裡的新自由主義與嚴格的強制性威權國家權力，同時，基於遭圍攻的島國（自從遭馬來西亞聯邦排擠後）、儒家價值，以及適合其位於國際貿易世界裡之當前地位的，一種特殊的寰宇主義倫理等理想，召喚了道德團結。

新保守主義運動的鞏固中，顯然有許多危險，每個新保守主義運動都準備訴諸嚴格的強制性作為，又都擁護自身特有而假設較為優越的道德價值。表面上看似新自由主義內部矛盾解答的東西，也非常容易變成問題。實際上，新保守主義勢力的擴散，雖然在不同社會形構中有非常不同的基礎，都突出了它們淪為競爭性，甚至戰爭性國族主義的危險，如

果不是墮入杭亭頓（Huntington）等人錯誤認為是世界舞台不可避免現象的文明徹底崩潰的話。如果這裡有什麼必然性，那也只是源於新保守主義轉向，而非出自涉及文明差異的永恆真理。因此，這種「必然性」可以很容易地制止，只要我們拋棄新保守主義的解答，轉而尋求其他替代出路，來解決新自由主義的矛盾（如果還談不上完全替換的話）。我們接下來就討論這個議題。

替代出路

47

馬克思很久以前就說過了，我們的任務是，既要理解世界，也要改變世界。但是，如果不是已經潛藏於現有條件中，社會秩序就無法改變，如果我們除非置身於傳承下來的歷史與地理條件中，就無法期待能創造我們自己的歷史和地理，那麼，深入地探討新自由主義的歷史地理，以及隨後的新保守主義轉向，這樣的任務就等於是在當下條件中尋找替代性的未來。

達到這個目標的主要路徑有二。我們可以檢視大量的反新自由主義運動，從中過濾出基礎廣闊的反抗綱領精粹。或者，我們可以訴諸對於我們現有條件的理論和實際分析（正是我在這裡從事的分析），來界定替代出路。選擇後面這條路，絕對不是假定既有的反對運動走錯了，或是認為它們的理解有缺陷。同樣的，反對運動也不能假定，分析性的發現跟它們的目標毫無瓜葛。這項任務是要開啓走這兩條路的人們的對話，並且藉此加深對各種可能性和可行出路的集體認識。

新自由主義曾在其地盤內外，醞釀出一大群反對運動。

許多這類反對運動，跟 1980 年代以前主導性的、以勞工為基礎的運動，大相逕庭。⁶⁷ 請注意，我說的是「許多」，而非「全部」。傳統以勞工為基礎的運動，即使是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也不能說是消失了，但在這裡它們的力量因為新自由主義的打擊而大幅削弱。在南韓和南非，活力充沛的勞工運動於 1980 年代崛起，在大部分拉丁美洲，勞工階級政黨若非已經掌權，就是生氣蓬勃。在印尼，一場有巨大潛在重要性的、傳說中的勞工運動，正在奮力讓人聽見。中國的勞工騷動潛能十分龐大，雖然相當難以預料。在美國，在過去一個世代裡，為了文化國族主義、宗教和反對各種社會運動，而持續投票違反自身物質利益的大量勞工階級，也很難說會因為共和黨和民主黨人的陰謀，而永遠封鎖在這種政治裡。鑒於人事反覆無常，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排除秉持強烈反新自由主義議程的、以勞工為基礎的政治，會在未來復甦的可能。

48 但是，反對奪取式積累的鬥爭，激起的是相當不同的社會與政治鬥爭路線。⁶⁸ 部分是因為引起這些運動的特殊條件，它們的政治取向和組織模式，跟典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治差異很大。例如，查巴達的反叛就不打算奪取政權，或完成一場政治革命，它反而是要追求一種更廣泛包容的政治，動員起整個公民社會，更開放而活潑地找尋替代出路，關照不同社會群體的特殊需要，使他們能夠改善自己的命運。在組織上，它有意避免先鋒主義（avant-gardism），拒絕採取政黨的形式。它偏向於保持位於國家內部的社會運動形式，嘗試形成一個政治權力集團，讓原住民文化位居核心而非邊緣。藉此，它試圖在國家權力的疆域邏輯中，達成某種類似消極革命的成果。

所有這些運動的影響，是將政治組織的形勢，從傳統政黨和勞工組織，轉移到橫跨整個公民社會光譜的，比較沒有那麼聚焦的社會行動的政治動態。但是，雖然喪失了明確焦點，卻擴大了相關性。它由於鑲嵌在日常生活與鬥爭的核心中而汲取了力量，但如此一來，它經常發覺自己很難抽離地方與特殊事物，以便掌握新自由主義奪取式積累的過去和現在到底是怎麼回事的宏觀政治。這種鬥爭在過去和現在都極為繁複多樣，令人震驚。甚至很難想像它們之間能有什麼關聯。它們過去和現在都是變化多端的抗議運動混合體的局部，這些抗議運動在 1980 年代期間及以後橫掃世界，越來越常躍居頭條新聞。這些運動和反叛有時候會遭遇殘酷暴力而破滅，這種暴力大多來自以「秩序和安定」之名行事的國家權力。在其他地方，它們造成了族群間的暴力和內戰，因為奪取式積累在一個由資本主義勢力採取的分而治之策略主導的世界裡，造成了劇烈的社會和政治敵對。得到軍事援助，或是在某些情況下，擁有由主要軍事機器（由美國領導，英法扮演副手）訓練的特種部隊支持的附庸國，在一個鎮壓清算的系統中帶頭，無情地遏止挑戰奪取式積累的行動主義運動。

這些運動本身產生了大量有關替代出路的想法。有些試圖全面脫離或部分切斷與新自由主義及新保守主義的壓倒性勢力之間的聯繫。另外一些則嘗試透過改革或解散像 IMF、WTO 和世界銀行之類的強大機構，尋求全球的社會與環境正義。還有一些運動強調「收回公共權利」（reclaiming the commons）的主題，從而顯示了當前的鬥爭與久遠以前的鬥爭，以及貫穿整個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痛苦歷史的鬥爭，有著深刻的連續性。有些人盼望著動員起來的諸眾

(multitude)，或是全球公民社會內部的運動，來對抗新自由主義秩序四散分離的勢力，其他人則比較溫和地期待新的生產與消費系統的地方實驗，由全然不同的社會關係與生態實踐來驅動。還有一些人則信賴比較傳統的政黨結構，目標在於掌握國家權力，做為邁向改造全球經濟秩序的第一步。有許多這類紛繁多樣的潮流，現在匯聚到了世界社會論壇 (World Social Forum)，嘗試界定出它們的共通之處，並建立一種組織性力量，來對付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各種變形。這裡有許多值得讚賞與激勵的東西。

但是，從這裡所建構的這種分析中，我們能得到什麼結論呢？首先，社會民主主義折衷方案，以及隨後轉向新自由主義的整段歷史，指出了階級鬥爭在遏止和復辟階級力量上，都扮演了關鍵角色。雖然經常被有效的遮掩起來，但我們確實經歷了社會上流階層一整個世代的複雜階級鬥爭，其目的在於復辟或建構（像在中國和俄羅斯那樣）一種壓倒性的階級勢力。朝向新保守主義的進一步轉向，說明了這個階級為了保持和提升自己的力量，會走得多麼遠，以及採取什麼策略。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許多進步人士在理論上被說服，階級是個沒有意義的範疇，以及代表工人階級從事階級鬥爭的那些機構遭受猛烈攻擊的幾十年裡。因此，我們必須學會的第一個教訓就是，如果某種現象看起來像階級鬥爭，行動方式也像階級鬥爭，我們就必須名副其實地稱它是階級鬥爭。大多數群眾要不是順從了壓倒性的階級力量所界定的歷史和地理軌跡，就是必須從階級角度來加以回應。

這樣子說，並不是為了擴大對於某個逝去的無產階級運動黃金時代的緬懷。這也不必然意味著（即使曾經有這種必

要)，有某種我們可以訴諸的簡單無產階級概念，以其做為歷史轉變的首要（更別說是唯一的）能動者。並不存在我們可以退隱其中的，烏托邦馬克思主義幻想的無產階級領域。指出階級鬥爭的必要和無可避免，並不是說階級建構的方式已然決定，或甚至是可以預先決定的。雖然不是在自行選擇的條件下，階級運動還是開創出來了。分析表明了，目前這些條件分為兩股：一股是環繞著擴大再生產而展開的運動，核心議題是對薪資勞動的剝削，以及界定社會工資的條件；另一股是圍繞奪取式積累而推行的運動，從古典的原始積累形式，到破壞文化、歷史和環境的行徑，以迄金融資本的當代形式造成的蹂躪的每樣事物，都是抵抗的焦點。找出這些不同階級運動之間的有機連結，是迫切的理論任務和實踐任務。但是，分析也顯示了，這些都必須發生於資本積累的歷史地理軌跡中，這種資本積累奠基於橫跨時空的漸增連結性，但又以持續深化的地理不均發展為特徵。這種不均等必須想成是由資本積累過程積極塑造出來和維持的東西，而不論在文化地景和社會世界中，過去配置構造的殘餘跡象，會有多麼重要。

50

但是，分析也指出了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議程中，可以利用的矛盾。修辭（為了全民的好處）與現實（少數統治階級的好處）之間的鴻溝，在時間和空間中不斷擴大，各種社會運動也做了許多工作來關注這個鴻溝。市場就是競爭和公平的想法，已經逐漸被企業和金融勢力的高度壟斷、集中化和國際化的事實否定了。國內（如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南非）和國際上階級與區域不平等的驚人擴增，提出了嚴重的政治問題，再也不能用這是通向完美新自由主義世界的

「過渡」現象來遮掩了。新自由主義越是被視為失敗的烏托邦計畫，掩飾了階級力量復辟的成功計畫，它就越會替群眾運動的崛起奠定基礎，後者呼籲平等主義的政治要求，追求經濟正義、公平貿易和更大的經濟安全。

新自由主義下權利論述的興起，在帶來問題的同時，也提出了機會。即使訴諸傳統的自由主義權利概念，也能形成強大的「抵抗之劍」，藉以批判新保守主義的威權主義，尤其當前「反恐戰爭」到處（從美國，到中國和車臣）都被拿來當作縮減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藉口的時候，特別能發揮作用。要求承認伊拉克自決權和主權的呼聲日高，也是遏止美國帝國主義構想的強大武器。但是，我們還可以界定出一套替代性的權利。我在其他地方曾經主張一套權利，包含的權利有：生命機會、政治結社與「良善」治理、由直接生產者控制生產、人身的不可侵犯和完整性、提出批判而無須擔心報復、像樣且健康的生活環境、公共財產資源的集體控制、未來世代、空間的生產、差異，以及內蘊於我們身為物種之地位的權利。⁶⁹ 對於做為塑造我們生活之主導過程的無盡資本積累的批判，導向了針對內含在那個過程中的特殊權利——一個人財產權和利潤率——的批判，反之亦然。因此，提議一套不同的權利，就連帶承擔了說明這些權利可以內蘊地鑲嵌其中的主導性社會過程的義務。

51

針對新保守主義為了自身權威和正當性而尋求道德優勢的課題，也可以提出類似論點。道德共同體和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的理想，在歷史上對左派而言並不陌生，許多反對奪取式積累的運動，也都積極從道德經濟的角度，接合起替代性社會關係的建構。道德並不是只能由反動的宗教

右派界定的領域，這種反動宗教右派是由媒體霸權動員，並透過由企業金錢權力主導的政治過程來接合。我們必須面對，在令人困惑的道德辯論亂局底下的統治階級力量復辟。所謂的「文化戰爭」——無論其中有些曾經如何被誤導——不應該只是視為不受歡迎的令人分神的因素（像某些傳統左派的主張），要從階級政治中拋棄。實際上，新保守主義內部道德討論的興起，不僅證實了在個人化的新自由主義下，對社會解體的恐懼，還證實了已經有廣泛的道德反感，厭惡新自由主義世界造成的異化、失序、排斥、邊緣化和環境惡化。這種道德反感轉化為文化抵抗，進而形成政治抵抗，乃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跡象，必須加以正確解讀，而不是拋到一邊。文化的鬥爭，與試圖擊退階級勢力之壓倒性鞏固的鬥爭，這兩種鬥爭的有機扣接，必須有理論性和實際上的探索。

但是，正是由新保守主義分子的威權主義支撐的新自由主義，其深刻的反民主性質，肯定應該是政治鬥爭的主要焦點。在名義上的「民主」的國家，例如美國，民主的匱乏非常嚴重。⁷⁰ 政治代議制度因為金錢權力而妥協和腐化。基本的制度安排有嚴重的偏頗。來自不足總人口 20% 的 27 個州的參議員，在決定立法議程時，握有過半數投票權，有利現任者的公然任意畫分議會選區，也被逐漸充斥著懷有新保守主義偏見的政治任命人員的司法體系，認定為合乎憲法。像聯邦儲備局這樣大權在握的機構，不受任何形式的民主控制。在國際上，情況更為嚴重，因為對於 IMF、WTO 和世界銀行這樣的機構，毫無責信（accountability）可言，更別提民主控制，而 NGO 也是在沒有民主成分或監督的情況下運作，不論它們的行動有多好的美意。

重提對於民主治理的要求，以及對於經濟、政治和文化平等與正義的要求，並不是建議要回到某種黃金時代的過往，因為在每個情況下，都必須重新發明意義，以便處理當代的狀況和潛能。古雅典時期的民主意義，跟我們今天在聖保羅、約翰尼斯堡、上海、馬尼拉、舊金山、里茲、斯德哥爾摩和拉哥斯等，如此多樣的環境下，必須賦予民主的意義，幾乎沒有什麼關聯。但是，這裡令人驚訝的是，就在全球範圍內，從中國、巴西、阿根廷、臺灣、韓國，到南非、伊朗、印度、埃及，從東歐到現代資本主義心臟地帶，所有那些正在鬥爭的國家，都有正在運作的群體和社會運動團結以求改革，表現出某種版本的民主價值。⁷¹

美國領導人曾在相當程度的公眾支持下，將下列觀點投射到全世界：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價值觀是普遍而至高無上的，這些價值之所以重要，乃因為它們就是人類文明的核心。但是，當今世界已經可以拒絕這種帝國主義姿態，並且將一套截然不同的價值，折射回到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心臟地帶：這些就是致力達成社會平等，以及經濟、政治和文化正義的開放民主體制的價值。

不均地理發展理論筆記

前言

不均地理發展（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的理論，有待進一步發展。橫越世界經濟體內部各空間（各種不同尺度）的當代政治經濟命運極度多變，要求有更好的理論詮釋。政治上的必要性也同等急迫，因為福利方面的齊一並未發生，反而在最近幾十年裡，資本主義世界中，地理和社會上的不平等似乎日益嚴重。透過更自由的貿易、開放市場，以及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策略，承諾能減少貧窮的成果，並沒有實現。環境惡化與社會混亂的分布，也不均衡。在此同時，與新自由主義對抗的那些運動，在追尋替代出路時，其不均地理發展既創造了機會，也造成阻礙。

當然，資本主義內部，或者可以說，一切其他生產方式中的不均地理發展，一點也不新奇。再者，這有好幾種彼此重疊的思考方式：

(1) 歷史主義／擴散主義 (diffusionist) 的詮釋，認為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西方）的政治經濟發展，是資本主義的引擎，讓所有其他疆域〔territory，或譯領土〕、文化和地方，搭上通往經濟、政治、制度與知識進步之路的列車。不均地理發展被解釋為一個源於中心的差異化擴散過程的產物，會將先前時代的殘餘拋到後頭，或是遇到抗拒資本主義所推動之進步或現代化的抵抗角落。「落後」（這個詞意味深長）乃源於不願意或沒能力（從種族歧視角度來看，這是本性使然，從環境主義觀點來看，這是自然施加的結果，文化主義則將此理解為歷史、宗教等傳統的負擔），「趕上」以西方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動態，後者常被描繪為現代性，甚至是文明的高潮。因此，整個人口、文化和疆域，都被假定為無能塑造它們自身的歷史，更別提影響其他地方的發展了。某些地方偶而會「看到曙光」（例如，日本及晚近的大部分東亞和東南亞），並穩步向前。但是，世界其餘部分都活在「歷史的等候室」裡。這種歷史主義／擴散主義的論證，有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版本。

56

(2) 建構主義的論點，聚焦於「低度發展的發展」。由勢力最強，投身於對整片疆域與人口及其文化的帝國主義、殖民或新殖民剝削的國族國家，憑其政治、軍事和地緣政治活動來支持的資本主義剝削性作為，乃是不均地理發展的根源。這就導致了有所差別的剝削（人口、資源、土地）模式。在地原生的力量和文化特殊性，遭受這些橫跨全球大片

區域的力量破壞或摧毀。雖然剝削疆域的力量基本上是外來的，但是在地的買辦階級可能與之合作，有時候還獲得了足夠力量，能將部分剝削的果實留在疆域內，為自己建立美好生活。這種建構主義的取向，有保守主義（柏克〔Edmund Burke〕的傳統）、自由主義（人權）和馬克思主義（例如，依賴理論、不均交換、低度發展之發展，以及空間的生產）的版本。

（3）環境主義的解釋至少回溯到孟德斯鳩（Montesquieu）和盧梭（Rousseau）。雖然，他們的名聲由於跟（通常是）歐洲文化優越性的種族歧視和教條牽連而蒙上了污點，但是，將發展的差異歸因於潛在環境條件的論證線索，從來沒有消失。最近幾年，在許多關注自然極限、環境容受量，以及健康問題與疾病的差別化暴露（例如，熱帶的瘧疾衝擊）的「綠色」論點壓力下，我們見到了這種思考「可敬」的復興，見諸戴蒙德（Jared Diamond）和薩克斯（Jeffrey Sachs）的著作。比較好的版本，考察了人類適應多樣環境可能性的辦法，這些適應辦法支撐了疆域專殊化、分工，以及連續的資本積累框架下，獨特區域生活方式的創造。同樣的，這種論點也有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生物區域論者（bioregionalist），以及現在是馬克思主義／綠色的版本。

（4）地緣政治的解釋認為，不均地理發展是在各種不同尺度上運作、於疆域上組織起來的強權之間，政治和社會鬥爭的無可預測產物。這些強權可以組織成為國家或國家集團，但是，鬥爭也發生於區域、城市、社區、地方鄰里、地盤等等之間。過去，經常使用有機體的隱喻，來描述最適合的領域性政體的存活，取決於競爭力。比較近的版本拋棄了

粗糙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集中於權力政治（軍事、政治、經濟）的操弄，以及以疆域為基礎的組織，彼此在全球舞台上爭奪財富、權勢、資源和生活品質的競爭。帝國主義的版本強調，國家或國家集團從世界其餘地區抽取剩餘的能力，並且讓大部分世界淪於迎合霸權勢力需要的臣屬分工。地緣政治的解釋，替偶然性保留了極大餘地。歷史的意外（地域化的社會運動、文化規範、政治轉移、革命）和地理（資源、人力資本、先前的投資），都可以在界定鬥爭形式及其結果上發揮作用。例如，受壓迫民族爭取國族自我解放的解放性鬥爭，對比於全球資本主義內維繫某些支配性強權之霸權地位的鬥爭。同樣的，這種論點有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的版本。

這些不同取向之間，顯然有許多重疊之處。但是，採取哪一條基本論證線索，變得很重要，因為在涉及不均地理發展於資本主義中的角色的辯論上，這限定了可能的辯論場域邊界，並且範限了從政治行動的立足點來看，什麼是正當且理由充足的。例如，在（1）底下，原始積累和自然的徹底轉變，可以視為必要之惡，是為了打破傳統、迷信、宗教等等的必經階段，以便邁向更好的社會。資本主義，以及甚至是帝國主義，在世界史上都可以視為進步的運動，而且，如果社會未能經歷這些階段，社會主義或其他「進步力量」就必須做這些令人討厭的工作（例如，蘇維埃對富農的剝奪）。在（2）底下，就很難替資本主義及其同源的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形式，建構出相同的正當性。剝削性和破壞性的作為，無可避免會受到負面評價。追求自主（像是脫離全球經濟體）和國族解放，伴隨著拒絕從事某些類型的環境

轉化，被視為進步的抵抗形式。在（3）底下，不均地理發展的環境限制（甚至是必要性）的問題，變得更加引人注目，甚至於自然與營造環境之間的區別，變得越來越難以維持。判斷和政治都是以生態學角度來決定和界定，而這些角度限制了可能性。在這種論證的極端版本中，環境限制提供了不均地理發展必須遵從的規範。在（4）底下，我們比較傾向於假設政治實體之間的競爭性鬥爭乃無可迴避的：唯一有趣的問題是，誰能攀上頂峰，位於何處，以及原因為何（歷史和地理的「意外」經常扮演關鍵角色）。

依其較為極端的形式，不可能協調這些不同的論證。然而，我一開始的想法是，這些論證不見得會相互排斥；每一個都針對不均地理發展有重要的話要說。這引起了一項危險，即我們最後只能得到折衷且不一致的觀念大雜燴。我偏好勇於面對這種危險。因此，後文我將以關係性的方式，來探索這所有主題的潛在相互作用。目標在於辨認出不均地理發展的「統一」場理論（"unified" field theory）。我把「統一」置入引號，是因為這裡所要達致的統一的意義，迥然不同於談論理論如何建構的化約論、或甚至是有機論概念。為了簡潔起見，我僅僅聚焦於不均地理發展如何在資本主義底下運作。

58

論證的結構

任何不均地理發展理論，都必須夠簡潔以便幫助理解，還得夠複雜，以便含括有待解釋的細緻變化和特殊性。我圍繞著具有不同認識論狀態的四項大相逕庭的條件約制（conditionalities），來建構論證。一個統一場理論的基礎，正

在於結合這些條件約制。這種結合十分困難，而且我並不宣稱能夠解答所有問題。我所建議的取向，是指引出邁向一般理論可能性的道路。這四項條件約制是：

- (1) 資本積累過程於社會—生態生活之網中的物質鑲嵌。
- (2) 奪取式積累（這是馬克思的「原始」(primitive) 或「原初」(original) 積累概念的一般化，藉此將既有的資產——像是勞動力、貨幣、生產能量或商品——聚集起來，然後當做資本，納入循環）。
- (3) 資本積累於空間和時間中的規律特質。
- (4) 在各種地理尺度上的政治、社會與「階級」鬥爭。

那麼，這些元素要如何結合成一個統一理論？答案部分取決於所要提出的「理論」的概念。如果理論是建構為一種乾淨的邏輯結構，以直接的命題式術語來敘述，有乾淨俐落地導引自基本抽象範疇的法則般陳述，那麼，我在這裡組合的材料，就不可能被理論化。但是，我心目中有一種比較鬆散的理論概念：這種理論承認某些辨認得出來、相互獨立的過程的力量與重要性，但這些過程可以且必須一起帶到動態的互動場域中。這意味了建構出來的論證，涉及了生活網絡、奪取式積累，以及擴大再生產積累如何一起運作，以及政治與階級鬥爭力量的動態，如何在資本主義不均地理發展中持續變化。

雖然這種取向的證明還有待執行，但是，我認為先鋪陳兩個引導我自己思路的重要初步論點，應該有些幫助。第一個論點牽涉了馬克思在他的著作裡，構思抽象與具體之間關係的方式。要能掌握這點，本身就必須有長篇大論的鋪展，

所以我僅僅處理以下觀察。辯證法，尤其是強調內部關係（internal relation）的那種辯證法，持續不斷協商特殊與普遍、抽象與具體之間的關係。例如，馬克思的理論中，在生產與交換的多重具體活動之外，沒有抽象勞動這種東西，是這些多重具體活動才導致了抽象勞動，至於具體，誠如馬克思的觀察，乃是許多不同決定因素的匯集，永遠無法簡化為只是抽象的特殊展現。能動者（我們每個人都擁有某種能動性）開創自己的道路，但是，套用馬克思的著名格言，這並不是在他們自己創造的條件下進行，而其結果也不能免於其他人行動所引發的多重決定因素。大部分社會理論都處理了這種考慮：如何將個人能動性（無論這要如何理解）連結上社會結構的演變，反之亦然。辯證法避免了這個問題比較偏向機械論和化約論的版本，並容許這個議題可以用開放且流動的方式，在理論上處理。我在後文將極度仰賴這種結合抽象和具體、普遍和特殊的辯證方法。

第二點仰賴有待鋪陳的空間概念（參見下一章）。這非常要緊，因為不均地理發展這個詞本身就奠基於有關空間性（spatiality）是什麼的概念。大部分社會理論的傾向，不是完全將空間性排除在視野之外，視為不必要的複雜化，就是把它當成只是社會過程發生其中的單純而不變的容器。在這些假設底下，我心目中那種不均地理發展的一般理論，就不可能出現了。能夠接合起來的最佳研究，就是討論積累法則如何在預先決定的空間結構中造成了不均發展。但是，近年來，許多地理學家得到列斐伏爾（Lefebvre）和其他人的哲學論點的支持，開始以不同觀點來看待空間性，視其為積極生產出來的，而且是社會過程裡的活躍要素。從關係性及相對

性的角度來處理空間，而非視為社會行動的絕對框架，使得我們有可能看到，譬如資本積累如何創造出不僅是空間，還有不同形式的空間性（透過像網際空間中金融市場的組織等操作而出現）。這一整套觀點，開啓了空間與空間性之生產的各種理論前景。就像史密斯（Neil Smith）很久以前就堅持過的，這是建立任何一般不均地理發展理論的必要先行條件。

⁷² 我會在下一章仔細檢視這個課題。

「生活網絡」中社會過程的物質鑲嵌

不均地理發展反映了不同社會群體將其社會性（sociality）模式，於物質上鑲嵌到生活網絡中的不同方式，這種生活網絡就是不斷演變的社會一生態系統。這種系統是開放且動態的，而且很顯然的，有非常多社會行動產生了非意圖後果的例子，以及各種僅僅由於懷海德（Whitehead）所稱的自然（包括人性）中「對新奇的永恆追尋」而引起的環境變遷。地理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各種史學家、政治評論者，以及其他許多人，實際上已經產出了理解這種過程及其結果的龐大著作。全世界的日常生活如何在生活網絡中度過，相關的研究檔案，可說是汗牛充棟。問題在於找出一種辦法，以便連結上較為一般性的資本積累、社會鬥爭和環境轉變的過程，來理解這些多樣、特殊且經常獨具一格的地理變異。這意味了，要將特殊研究整合到某個比較一般性的資本主義不均地理發展理論中。

資本主義的活動總是奠基在某處。多樣的物質過程（物理、生態與社會的），必須配合資本積累的目的與路徑來挪

用、利用、彎曲和重塑。相對的，資本積累必須適應它遭遇到的物質條件，某些時候還要被這些條件改變。理論必須應付兩個議題：首先，必須說明資本循環和積累的法則，其次，必須建立一種方法論，來追溯這些法則如何透過社會—生態過程，而得以具體表現出來，並積極的被重新塑造。

針對第二個問題，傳統取向是堅持個案研究必須「以理論為支撐」。然而，這個說法的意思，經常是有一個導論和結論的章節，重要理論家的著作排列在論證前方，中間夾著個案研究，卻通常很難辨認出，裡頭有首尾兩章所引述理論著作的哪怕是一絲影響痕跡。理論著作如何可能得到個案研究工作的啟發和推進，這個議題極少或甚至是從未提及。有時候發生的事情是，理論被認定不合時宜，但真正的問題應該是如何促進理論。這種處理問題的傳統取向之所以出現，我懷疑是因為「理論」太常被理解為一組固定的、已經完全說明清楚的論點和命題，是能夠應用於「真實」世界，並加以測試的現成物品。這種實證主義的理論取向是個問題。反之，理論應該理解為一種演變中的論證結構，遇到社會過程於物質上鑲嵌在生活網絡中的複雜方式時，非常敏感。因此，我在這裡的目標，是要透過一個一般不均地理發展理論的問題意識來說話，它既鬆綁了一般理論如何運作的概念，同時拉緊了理論著作與歷史—地理唯物論（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的具體實踐之間的辯證整合。⁷³

61

這些困難還因為許多具有影響力且富有思想的學者，像是布勞岱（Braudel）和哈伯瑪斯（Habermas）的習慣而惡化，他們認為資本積累的抽象過程，位於日常生活「之外」，脫離了某人會偏好稱為「生活世界」的部分。例如，布勞岱

就認為，資本主義是三層結構中的頂層。最底層是由「物質生活」構成的，其定義是「非經濟的地層，是資本主義向下扎根，但永遠無法真正穿透的土壤。」在這層上頭：

是市場經濟偏愛的地盤，擁有許多不同市場之間的水平溝通：這裡有某種程度的自動協調，通常扣接了供應、需求和價格。然後，在它旁邊，或者說，在這一層上頭，有反市場（anti-market）的地帶，是大型掠奪者巡遊和叢林法則運作的地方。這就是資本主義真正的家園，無論是過去或今日，工業革命之前或之後。⁷⁴

布勞岱認為，1800年以前的日常物質生活，是在地方層次度過的，只受到資本主義少量影響。在某處，他確實對於在19世紀鐵路來臨以後，這種情況是否依然真確，表示了一些懷疑。甚至在今日，世界上確實有些地區，可以很合理的說，資本主義的宏觀過程只在日常生活上投下一抹陰影。但是，這種情形越來越罕見了。試想加州能源危機中，安隆（Enron）——是布勞岱所稱的典型「掠奪者」——扮演的角色。電力短缺和快速上漲的價格，以及間接的預算後果，影響了加州和其他地方的每個人。想一想墨西哥、阿根廷、莫三比克（Mozambique）、印尼、泰國和韓國（只舉少數實例）的財務危機和結構調整政策；這些國家裡頭的幾乎每個人，日常生活都有了深刻改變。例如，1997-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

失業暴增，國內生產毛額筆直滑落，銀行倒閉。失業率在韓國提高為四倍，泰國是三倍，印尼兩倍。在印尼，

1997 年正在工作的男性，到了 1998 年 8 月，幾乎有 15% 沒了頭路，在主要島嶼爪哇的都市地區，經濟災害更嚴重。在南韓，都市貧窮幾乎變成三倍，接近四分之一人口淪於貧困；印尼的貧窮人口加倍。⁷⁵

例如，印尼隨後發生的暴動與暴力（主要針對華人），撕裂了許多社會紋理。沒有任何地方或個人可以免疫，雖然在某些地方，影響顯然會比其他地方更強烈。無數的社會鬥爭也迸發而出，反抗資本主義（例如，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查巴達〔Zapatista〕運動，大量有記錄的反國際貨幣基金暴動）。我的結論是，資本主義只跟日常生活有陰影般的關係，或者，日常生活中的調整和適應，跟資本積累如何在全球舞台運作的理解毫不相干，這種觀點不可能站得住腳。布勞岱的設想對我們的當代世界來說，不合時宜。

博蘭尼（Polanyi）則看到了他所謂的市場經濟逐步「脫離」（disembedding）了社會系統。到了「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市場經濟的崛起）完成時，商品化（土地、勞動與貨幣的商品化，這些實際上都不是當作商品而生產出來的）與資本積累的邏輯，已經做為一套虛構和抽象過程而施加在社會生活上了。依照博蘭尼的觀點，問題在於將資本積累和市場關係重新鑲嵌於一種管制與制度性的架構中，可以約束其過度發展，並維持其某些優點（像是選擇的自由，以及分散化的決策）。當然，博蘭尼的論點並不是說，資本循環在物質上位於社會與生態生活網絡之外，而是驅動它的抽象過程，脫離了源於整個社會和生態過程的更寬廣邏輯。⁷⁶這導向了生活網絡內部許多具有潛在破壞性的後果，尤其是

對於環境和勞工的損害。在我看來，這似乎是比較堅實的構想。然而，危險在於我們將資本主義邏輯的抽象和虛構，推斷為某種神秘的外部力量——「資本」——的性質，位於「生活網絡」之外，並且免於唯物主義的影響，而實際上，它們應該刻畫為是一種乖逆剛愎且限制性的邏輯的產物，起源於按照一群稱為資本家的人的指示而構成的制度性安排。資本家會適應新狀況：實際上，資本主義歷史地理比較傑出的事情之一，就是它的彈性和適應力。新的制度性安排，不斷為了回應資本循環於生活網絡中的物質鑲嵌情勢而構成。例如，資本主義會經由它與環境極限和限制的遭遇，來修改行為。馬克思所謂的資本在追求剩餘價值上的「彈性」力量，必須納入理論性的論證中。

其他理論家假設了有受保護空間（傅柯〔Foucault〕命名為「異質地方」〔heterotopic〕）的存在，在裡頭，日常生活和情感關係的運作，可以不受到資本積累、市場關係和國家權力的支配。哈伯瑪斯轉向胡塞爾（Husserl）的「生活世界」概念，意思是指位於資本與國家概念中，既有的經濟、技術及科層官僚理性之外的，非人類與人類思想暨行動的領域。在哈伯瑪斯的情況中，有著維繫人文主義的明顯意欲，讓私人激情和關切、個人道德和美學判斷、溝通倫理和對話，都能夠攜帶它們自身獨特且自主的意義。這種類型的構想捍衛著空間，對抗「資本邏輯」理論的壓倒性力量，以及由這種邏輯所主宰的，顯然反人文主義的立場。⁷⁷ 我同情這個整體目標，但認為它錯誤且自毀長城地假設了某種異質地方或分隔之「生活世界」空間的存在，這種空間隔絕了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和概念（即使長期看來，有遭受穿透和淹沒的危險）。

接受了「生活世界」和「系統」這樣的區分，會導向拋棄馬克思教導我們的，有關歷史唯物論探究原則的每件事情。畢竟，馬克思尋求的是日常生活的批判知識。他的方法導向「對於存在的一切事物的無情批評」。雖然馬克思主義有時候會淪為自身抽象性的犧牲者，但基本的探究線索，必須環繞著抽象和具體事件之間的辯證關係。

如果將日常生活與生活世界視為位居資本循環「之外」的東西，會招致不滿，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目前在工作場所，以及生產—消費過程中發生的每件事情，都以某種方式陷入了資本循環和積累。幾乎我們現在吃喝穿戴，收聽、觀看和學習的每件東西，都以商品形式來到我們面前，而且由分工、產品利基的追求，以及體現資本主義信條的論述與意識形態的一般演化所塑造。唯有當日常生活已經完全朝資本循環開放，以及政治主體的願景，幾乎完全受制於鑲嵌在這種循環中的狀況，資本主義的運作方能以情感性的意義及正當性當做支撐。在這種情勢下，身體變成了「積累的策略」，而且我們全都得在這種條件的符號底下過活。⁷⁸ 即使對那些嘗試靠每天不足 2 美元過活，以及經常被看作和對待為宛如他們是可拋棄的冗贅人口的人來說，這點現在也是真確不虛。

64

當然，無可否認的是，資本主義推動且改變了制度性架構及功能專殊化，這促進了非常抽象且讓大多數人看不透的論述的發展。金融系統尤然，它挾其衍生性金融產品和避險基金（hedge-fund）、垃圾債券和現金期貨，它複雜的行為法則，以及資產估價的迴旋，似乎造就了一個自成一格的世界，其中龐大的投機能量，顯然跟物質生產與消費的世界毫無瓜葛。批判性探究的任務，就是要穿透這種現象的底層意

義，然後探索它們於日常生活中的縱橫交錯。這要如何辦到，是個大問題。葛蘭西（Gramsci）的洞見在這裡有很大的相關性：

群眾裡的積極人物，有實際的活動，但對於他的實際活動沒有清晰的理論意識，但就這活動改變了世界而言，依然牽涉了對世界的理解。他的理論意識實際上很可能與他的活動形成歷史性的對立。我們幾乎可以說，他具有兩種理論意識（或者一種矛盾的意識）：其一隱含在他的活動中，而實質上將他與他的同僚統合在真實世界的實際轉變裡；另一個是表面上明顯或口頭宣稱的意識，他從過去繼承而來，未經批判就吸收。但是，這種口頭上的概念，並非毫無作用。它將特殊的社會群體凝結起來，它影響了道德行為和意志的方向，它的效能不一，但經常是足夠強大而造成了一種情境，使得意識的矛盾狀態不容許任何行動、任何決定或任何選擇，並且產生了一種道德和政治順服的狀況。⁷⁹

葛蘭西指出，「常識」是：

由各種社會與文化環境未經批判地吸收的世界概念，一般人的道德個體性，就在這些環境中發展。常識並非單一獨特的概念，在時間和空間中都是一個模樣……。它最基本的特徵是，這種概念即使是在某個人的腦海裡，也都是片斷、不一致且不重要的，遵從那些群眾的社會與文化立場，這就是他們的哲學。

這種共同持有的一套信念，對比於「良好見地」(good sense)，後者以深刻而批判的方式連結了生命活動和理解：

我們每個人都改變他自己，修正他自己，使得他改變和修正了他位居核心的那個複雜關係。在這個意義下，真正的哲學家不可能是其他，只能是政治人物，是改造環境的積極人物，並且理解到環境是我們每個人參與其中的全體關係。如果某人的個體性是這些關係的**全體**，那麼要創造某個人的個性，就意味了要對這些關係有所覺察，而且，改變某人自己的個性，就意味了改變這些關係的全體。⁸⁰

65

有鑒於附著在資本循環和積累過程上頭的拜物教，以及遮蔽這些過程的曖昧難明，我們無法期望會有涉及世界的「常識」概念以外的任何事物，來調節日常生活的言行。分裂與認知的不一致很重要。我們沒有辦法期待資本積累的規矩和法則，以未經中介的方式進入社會一生態的世界。但是，同樣的，這意味了資本循環與積累的活動，透過真實的論述實踐、理解和行為（包括葛蘭西所指認出來的被動順從和「常識」）而折射。這些中介以影響深遠的方式，塑造了資本主義的不均地理發展。但是，這會帶領我們兜了一圈，因為果真如此，就像我稍後的主張那樣，疆域競爭在資本積累的進展裡扮演關鍵角色，那麼在資本主義的不同空間中浮現的，「常識」的不均等且全然不同的結構，即使不是扮演構成的角色，也發揮了塑造作用。例如，如果矽谷的「常識」奠基於有關嚴苛的進取式個人主義和冒險資本主義的信仰，那麼這個區域相對於英國各郡的穩健社會性，或是喀拉蚩

(Karachi) 的宗教強度，其相對成功就不難預測了。在我看來，「常識」地理學是文化地理學和人類學的適當主題。

列斐伏爾同樣提出了關鍵洞見。他的計畫是要解放馬克思主義，使其脫離教條主義，並將對於「日常生活」的理解，整合到馬克思理論中。他力陳，「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方法」：

正是在於追尋人爲己身所思、所欲、所言與所信者，以及他們之所是與所爲者，這兩方之間的扣接。這種扣接一直存在。它可以從兩個方向來探尋。一方面，史學家或行動者可以從觀念前進到人，從意識到存有，也就是說，邁向實際的日常現實，讓這兩者遭遇，然後達致**藉由行動和現實來批評觀念**……。但是，同樣有可能（拿）真實生活做爲出發點，來探察表達真實生活的觀念，以及反映它的那些意識形式，是如何出現的。這種扣接，或者更妥切地說，這兩極之間的扣接網絡，將證明是極爲複雜的……。以此方式，我們可以達致**藉由觀念來批評生活**，這在某種意義上，延伸且完成了第一種程序。

81

列斐伏爾指認出一系列能夠執行這種操作的關鍵要點。他提議要批判（a）個體性（私人意識）；（b）神秘化（神秘化的意識）；（c）貨幣（拜物教和經濟異化）（d）需要（心理與道德的異化）；（e）工作（勞工的異化）；以及（f）自由（凌駕自然與人性的力量）。列斐伏爾凸顯了**批判**的必要性，視之爲整合日常物質關切與某個更寬廣架構的任何嘗試的認識論支撐。列斐伏爾引導我們從日常生活的單純描述的領域（類似於葛蘭西的「常識」），轉而考察日常生活轉變的

可能性（尋求葛蘭西的「良好見地」）。日常生活批判導致建構出一組轉變日常生活的可能性，引領我們脫離葛蘭西所描繪的被動順從，邁向革命行動。對列斐伏爾而言，社會主義就是日常生活的轉變。但是，這些轉變無論如何都在我們週遭發生。因此，這個世界充滿了可能性。可是，這些可能性沒有得到同等的把握，這取決於良好見地的政治贏過常識通常會傳達的消極順從的程度。日常生活的不均地理發展，是我們藉由轉變性的行動，包括論述理解和日常實踐，來造就自己及我們世界的過程的產物。

我閱讀了葛蘭西和列斐伏爾，並且思考了眾多特殊個案研究後，認為絕對可以建構出一種或可稱為「由下往上理論化」的模式。我要在這裡澄清，我不是主張要回到某種版本的歸納法，有一整套經驗探究，來替綜合性概推（*generalization*）的提煉提供原料，而這些概推可以擔任理論命題的角色。馬克思的方法很不一樣，從特殊事件的表象，下降到底層的主導性抽象過程。探究的任務是要透過批判分析及對於個別狀況的詳細檢查，來辨認出這些底層力量。簡言之，我藉由詳細重構特定一座城市如何演變，從而獲得資本主義底下都市過程的知識，遠遠多過我從一百座城市樣本收集經驗資料的所獲。從這個視角來看，我們可以知道，所有的個案研究必然都內含了理論建構。因此，「操作理論」是一切形式的歷史—地理唯物論探究必然附隨的產物。透過這種活動，就有可能重新構想和推進我們手邊擁有的任何一般理論（像是馬克思在《資本論》提出來的那種）。任何個案研究的最後一章，因而都應該討論個案研究如何推進了理論，以及有什麼一般效果。

在此，我們也需要更仔細檢視資本積累和「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關係，因為經常有人提出似乎可信的聲言，指稱這使得我們在理論建構方面，位居性質不同的領域。確實，誠如史密斯的主張，對於不均地理發展的認識，取決於首先要瞭解經由資本主義活動的「自然的生產」。⁸² 物理和生態條件在地球表面的變異非常劇烈。我們必須迴避將「自然」範疇予以均質化（這在哲學辯論裡經常發生）的誘惑。自然應該總被視為具有強烈的內部變化——是無可比擬的差異場域。動員和利用自然剩餘的可能性，隨著環境脈絡不同而有極大變異，資本的地理循環便反映了這個簡單事實。但是，這些可能性也仰賴科技、組織形式、分工、需要、需求和欲望，以及我們的文化偏好（包括表達於「常識」中的那些偏好）。再者，這個自然世界處於持續變動中，而人類產生的影響在規模和重要性上，都與時俱增。博凱特（Paul Burkett）是這麼說的：

自然吸收或調適於人類生產過程的能力，本身大體上受到構成特定生態系統，以及整個地球生物圈的物質客體、物理力量及生命形式的綜合性質所決定。人類影響生物圈的無數形式，以及空間和時間上的不均衡，只能從生態系統內部各處自然的性質變化與適應力差異的角度來理解。當然，不均等且差別化的人類生態衝擊，也牽涉了人類相對於其他物種的發展特色。社會分工特別使得人類生產的水平與質性分化，相較於非人類的自然，具有特殊的推動力。⁸³

在轉變我們的環境時，我們必然改變了自己。這是馬克思涉及我們與自然的新陳代謝關係之辯證法的最基本理論觀點。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觀察是，唯有當「人和自然的關係被排除於歷史之外」時，才「造就了自然和歷史的反命題」。⁸⁴而且，如果這種關係是辯證的，是內部關係的性質，那麼就會直接面臨特殊性—普遍性的問題。因此，在生態這一方，我們必須理解資本積累如何透過生態系統的過程而運作，重塑這些過程，並擾亂它們。能量之流、物質均衡的變動，環境轉變（有些無法逆轉），都必須徹底納入這幅圖像。但是，68社會面無法當成全然不同於其生態外殼的東西而迴避。就像我在《正義、自然與差異地理學》（*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中的主張，紐約市並無任何不自然之處。⁸⁵貨幣和資本的循環，一點一滴都必須解釋為跟空氣及水循環一樣重要的生態變數。因此，包括生態和社會兩方面都鑲嵌於「生活網絡」的概念，對於不均地理發展的理論化相當重要。這是政治生態學著手進行，而且已有顯著成果的工作。

然而，辯證開展時，我們並未特別覺察到我們重新塑造自己的方式。即使有某種對於「掌控自然」（僅舉一例）如何有助於人類啓蒙和解放的集體感知，人類行動的非意圖後果還是如此龐大而無法預期，因而打斷了，甚且在某些情況裡，逆轉了某些我們最珍愛的希望。意外的後果反而是餵養了我們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恐懼。環境主義所提出的一切問題意識，在這裡都即將顯現。資本積累如何經由我們週遭的物理、化學和生物過程而運作的問題，成為批判研究的迫切議題。

當我們把「營造」(built) 這個詞放到「環境」前面時，這就更加明顯了。因為誠如著名的都市社會學家帕克 (Robert Park) 曾經說過的，城市是：

人類按照心中欲望來重塑他生活其中的世界的企圖裡，最一致的嘗試，而且整體而言，是最成功的嘗試。但是，如果城市是人類創造出來的世界，那也是他此後注定要生活其中的世界。因此，間接地，而且在對他的工作沒有任何清楚覺察下，人類在創造城市的時候，也重塑了他自己。⁸⁶

然而，我們大多數人都將自己按照我們心中欲望來創造城市的個人權利，退讓給了地產擁有者、地主開發商、金融資本家和國家的權利。這些是替我們塑造我們的城市，從而塑造了我們自身的主要能動者。我們取消了我們塑造自己的權利，讓渡給資本塑造我們的權利，消極接受或心不在焉地擁抱了資本家階級利益的計畫對日常生活的再結構。如果結果沒那麼討人喜歡，我們必須重申我們改變它們的權利。若要認識到不僅是我們過去置身哪裡，以及我們如何被重塑，還要理解我們可以走向何方，以及我們能夠集體渴求成為什麼，批判與辯證的方法就非常重要。

69 生活網絡中社會過程之物質鑲嵌的如何、為何及何處中，所遭遇到的豐富變化，是建構不均地理發展之一般理論的任何嘗試，必須考量的一環。但是，在我們歷史的這個時間點上，我們不會對資本積累之社會過程的一般性質毫無所悉，就來處理這個問題。我們現在就轉而討論這些課題。

奪取式積累 / 貶值

所有社會都會產生剩餘（其定義為超出立即消費所需部分的使用價值），以求取生存。社會系統越精密，剩餘就越重要且必要。有利的自然條件使得剩餘生產較為容易，但是剩餘的階級占用和集中化，全然取決於政治發展與階級力量的形成。占用其他人生產的剩餘，或試圖掌控便利剩餘生產的自然條件，是存在已久的人類行為。僅存的有趣問題是：誰從占用中得到好處，可以占用多少剩餘，以及這些剩餘如何使用？神權政體（像古埃及或印加）、帝國（像羅馬和中國）、都市富豪政治或民主政治（古希臘和威尼斯）、各種封建秩序，全都仰賴某種政治和階級力量對於剩餘的生產和占用。針對剩餘占用和使用的政治、軍事及社會鬥爭，不僅經常發生，而且暴力連連。

資本家階級的崛起，最初並未取決於它產生剩餘的能力。它反而是仰賴其占用剩餘的能力，將剩餘當成自己的私有財產，並且爲了追求更多剩餘而將剩餘投入循環。商業、銀行業務和高利貸提供機會以獲取利潤，資本主義做爲一個社會系統，最終則是取決於無產階級的形成，以及薪資勞動的僱用。於是，剩餘的產生可以在系統內部持續確保。以這種方式運作的嘗試，其痕跡可以在不同時代裡，世界的許多地區（尤其是阿拉伯人和中國人的貿易區，以及地中海周邊）發現，但是，在每個情況中，資產階級登臨霸權地位的崛起，都遭受其他階級力量（通常是以宗教或國家爲基礎）的阻撓。資本主義要成爲一個主導性的社會系統，需要有資產階級興起，並在控制剩餘方面，壓倒其他階級力量。這一點

如何及為何在歐洲發生（而且當時只在某些地區發生），是個爭議不休的議題，但是，這種現象首先以自我延續的方式出現於歐洲，則沒有疑問。商人在公海航行，並且占用全世界的剩餘（有時平和，有時暴力），然後，商人將剩餘集中到歐洲的能力（使得城市 and 國家極度仰賴他們的活動），配合上封建勢力的崩解（農奴轉變為薪資勞工），對某些地區教會領地的占用，也與此關係密切。控制剩餘的其他階級勢力的衰弱，局部解釋了資產階級在歐洲征服權力的獨特條件。

一旦以歐洲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系統形成了，涉及占用、控制和使用剩餘的鬥爭，就不會停歇。實際上，證據顯示，持續的鬥爭某種程度上保存了資產階級與資本家的階級力量（對抗像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各種神權反動形式的威脅）。然而，更重要的是，將資本主義力量延伸到剩餘（或生產剩餘的有力自然條件）尚未納入資本循環的那些疆域、部門及場域的無止盡追尋。因此，透過奪取（dispossession）而積累，必須解釋為資本主義存活的必要條件。這項命題（這是盧森堡〔Luxemburg〕提出的，持續性的帝國擴張是資本主義存活之必要條件的主張的概推版本）需要更仔細的說明。⁸⁷

首先，剩餘有很多種形式。自然資源及其他自然條件，提供了快速生產剩餘的可能性，因此方便通往及控制資源豐富的位址，成為一種透過占用而積累的幽暗形式。不懈地尋找可以劫奪以供剩餘及剩餘價值生產的高品質自然資源，因而成為資本主義歷史地理的關鍵面向。這些資源和資源複合體的分布並不平均，就此而論，就會環繞著譬如農業生產力或原油蘊藏等條件，產生某種類型的不均地理發展。土地、可以商品化的使用價值、貨幣商品（黃金）、勞動力（包括技

能)、文化產物和地方習俗、社會網絡等等，則提供了占用活動的更直接目標。這一切都在地理上有所差別，而且座落其中，因此，其占用就取決於接近和掌控它們的空間策略。

例如，考慮占用文化歷史來當成商品以供觀光消費的情形。資本對壟斷地租的追求，創造出某些現象商品化之後的酬賞，而這些現象在其他方面則是獨特、真實，因而是不可複製的。⁸⁸ 掠奪文化歷史、收集和展示獨特物件（各種博物館），以及地方做為某種獨特環境的行銷，在近幾年裡成了一門大生意。但是，這一切要能夠發生，就必須有資本對各種事物的全盤占用，而資本與這些事物的創造卻極少或毫無關聯。再者，這種占用也進入了個人創意的領域（試想，音樂產業如何劫奪了區域傳統，以及從日常生活條件中產生的新音樂類型〔像是嘻哈和饒舌歌曲〕）。就這樣，資本占用了鑲嵌於生活網絡中的創意，並以商品形式回流給我們，以便抽取剩餘價值。這是資本對於創意和情感性文化形式的占用，而不是資本自身的直接創造。

71

奪取有各種不同方式。某個優勢力量（商人、國家、殖民勢力、多國公司等）的外部強制，穿透了某種既存社會秩序和地理領域，以迎合該力量的利益。商業資本主義，以及殖民、新殖民和帝國主義事業的長遠歷史，基本上就是這種情形。盜取世界的使用價值，這種行徑在資產階級狼藉劣行的萬神殿中可謂歷史悠久。但是，如果下結論認為，這是唯一或主要的形式，那就錯了。一旦資本循環及其同夥的力量（最終是技術與軍事的優勢），已經清楚展現，那麼臣屬群體就會一直面臨與外部資本主義勢力合作的誘惑，藉此控制它們自己的剩餘。深受資本蹂躪之苦的整個社會形構，可能會

決定，如果他們無法擊敗資本主義，那麼最好加入它。非資本主義社會形構中的國家和集團階級勢力，可以從內部動員剩餘（有時訴諸武力），然後透過世界貿易，將這些剩餘當成資本來流通。這種活動在各式各樣的國家裡行之已久，例如，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以及比較晚近的中國，運用國家力量來動員自己內部的剩餘，投入世界市場做為資本來循環。在其他情形下（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南韓與日本），則是外部影響和內部勢力的結合，積累了供資本主義發展所需的剩餘。一整系列的「買辦」資產階級和資本家階級集團，如雨後春筍般現身，在不同地方（有些能利用國家暴力，有些則否）運用其占用勢力，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網絡的一部分。經常是在地方層級運行的野心勃勃集團，可以犧牲同胞來抽取剩餘（有時透過凶惡手段），以此做為將自己納入世界市場的策略之一。在國際競爭的洶湧波濤中，成功或失敗永遠都說不準，今年的成功故事很容易就成為明年的失敗（就像日本最近的例子）。不均地理發展正是這種分歧過程的必然結果。很顯然的，奪取式積累位於何時、何地，以及如何進行，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一般性的命題依然有效：

72 資本主義系統要能達致任何穩定外貌，就必須維持規模龐大的奪取式積累。據此推論，透過奪取而造成的不均地理發展，乃是資本主義穩定性的必然結果。

但是，這只說出了奪取式積累的部分故事。另一半則比較仔細地關注資本主義系統本身內部的資產吞噬，這是某些集團（像是金融資本）掌握機會來占用其他人（例如農民或工業家）的資產，或是疆域或資本的區域配置（城市、區域、國家）試圖透過商業競爭和（或）地緣政治操縱（包括

軍事干預和瓦解）來獲取或摧毀敵手的資產。經由合併和資產掠奪來奪取，也是尋常無奇的資本主義行徑。資產的破壞（例如，19世紀時摧毀發展相當完善的印度手工紡織業，以便替英國廉價棉製品打開出路），和將它們吸收到新的用途配置中同等重要。我們曾指出，在資本主義危機時期，資本會貶值，這意味著剩餘價值，以及最終是位居它們背後的剩餘，遭到縮減或摧毀。貶值危機提供了多重機會來「廉價」獲得資產，那些掌握力量而能安然度過危機者，將變得更富裕。誠如阿銳基（Arrighi）說明過的，在世界舞台上，這意味著資本積累的霸權中心，隨著時間而有地理和尺度上的重大轉移（從義大利城邦國家，到荷蘭、英國，然後到了美國）。但是，危機也點燃了集團和疆域之間強烈的地緣政治對抗和權力鬥爭，來決定是誰和哪裡要承擔貶值的衝擊。在這種情況下，占用或控制他人剩餘的目標，不是要將它們吸收到資本循環中，而是要掌握力量來予以貶值，甚至是摧毀它們（必要的話，透過軍事手段），藉以將貶值的衝擊侷限在別人的地盤上。透過債務來實行金融控制，是目前將其他地方的資本貶值的主要手段。我們只要看看國際貨幣基金的結構調整方案，就知道這如何運作了。所以，貶值會隨地方而定（2001年以後阿根廷發生的事情即為明證）。這種情況所導致的跨區域或國家的不均等地理效果，正是不均地理發展。

資本積累必然是物質性地根植於社會一生態生活的網絡中。但是，資本積累不僅牽涉了剩餘之為剩餘價值的生產和循環。它也涉及了占用他人的資產。任何資本主義下的不均地理發展理論，如果要有任何一般性的效度和用處，就必須將奪取式積累／貶值納入，視之為一種基本力量。

空間與時間中的資本積累

我們手中已握有相當接近空間與時間中，資本積累之一般理論的東西了。⁸⁹ 這種理論的運作預設是，原初積累已經發生，而且資本家階級和無產階級已經形成了；實施某種制度性安排（法律、契約、私有財產和個人司法權利）的「促進式國家」（facilitative state）已經穩穩到位；積累過程發生其中的物質世界，已經變得順服且便於操縱，以便迎合資本主義的目標。此外，還假設資本積累擁有以下特徵：（1）活動是擴張性的，成長咸認為不可避免，而且是件好事，（2）成長是透過在生產中剝削活勞動（living labor）來維持的，（3）階級鬥爭是特有的病態，但不構成威脅，（4）技術變遷（或「進步」）不可避免，同時本身被視為好事，（5）系統充滿矛盾，內蘊了不穩定（例如，工作場所中資本的生產條件，不斷地與市場中資本的實現條件相衝突），（6）危機無法避免，其特徵是過度積累（資本與勞動的剩餘同時出現，而且顯然沒辦法把它們兜攏在一起），以及（7）如果無法以某種方式來吸收剩餘，那麼它們將會貶值（計算淨值、賠售，或甚至摧毀其實體）。過度積累危機可以至少暫時紓解，辦法是時間移轉（將資本和勞動剩餘吸收到長期計畫中，例如大型公共工程）或是空間修補（spatial fix）（將資本和勞動剩餘分散或出口到比較有利可圖的新空間）。

那麼，在這種對於資本積累的一般理解中，要如何建構一個比較清楚詳盡的不均地理發展理論？這裡的論證必須通過好幾個理論步驟。

市場交換

將勞動力和生產資料（means of production）匯集到生產位址上，然後將完成的商品運送給消費者，這就牽涉到商品耗費時間的空間移動。這產生了運輸成本，並且限制了交換在經濟上行得通的空間範圍。就勞動力在工作場所和居住地點之間的日常流動而言，這一點格外重要。商品可以移動的空間範圍，取決於運輸能力和手段，以及所花費的成本和時間。但是，在任何既定的歷史—地理情境中，空間範圍和所費時間大致上都能夠知悉，並且會出現一個很特殊的資本積累的時空結構。

74

廖什（Lösch）、韋伯（Weber）和其他人的古典區位理論（location theory），乍看之下在這裡會派得上用場。困難在於這個理論——至少在廖什的情況中——假設了隨距離而上升的運輸成本與相應降低的需求之間的理性權衡，會產生均衡狀態。有利可圖的活動會侷限在具地理特定性的市場地區。但是，資本主義涉及的是成長，而非靜態的均衡。問題是要去探討，空間上受限的市場結構，如何相對於成長及技術動態而演變。再者，商品不會自己跑到市場：它們是由商人帶過去的。空間阻礙的不斷探索，以及不斷開啓新空間，就是他們的專長。當地方市場受到高運輸成本限制時，例如中世紀，商人就成為巡迴小販，四處漫遊以販賣貨品。低買高賣的前景，塑造出各式各樣的不同行銷方法和手段。隨著商業資本和貿易的形式不同，出現了類似貨品的千差萬別變化。在比較晚近的時代，大部分注意力都合宜地專注於商品鏈（commodity chains）、市場系統內部的社會關係與結構、商業

資本家的力量（例如獨買〔monopsonist〕），以及這些中介如何不僅促進了商品交易，還設置了抽取價值和剩餘價值的無數地點（因為加工者、大盤商、零售商全都中介了這些流動，雇用薪資勞動，並且瓜分了一份）。不均地理發展是透過這種手段而生產出來的。

空間競爭的強制法則

資本家生產者彼此競爭，試圖藉由採用更優越的技術和組織形式，來獲取優勢和更高利潤。然而，這種優勢是暫時的，轉瞬即逝，因為競爭者會迎頭趕上（除非以壟斷控制、專利法等來防止），甚至是蛙跳般，一躍進入新的技術／組織組合。據此，我們可以導引出資本主義內部技術和組織動態的必然性。生產的功能不斷改變，資本主義的地理景觀變得很不穩定。占有優越區位的資本家，同樣能獲得超額利潤。這項優勢也是臨時性的，理由有二：其他資本家可以找到具有同樣優勢的區位，或者，如果超額利潤相對持穩，就可能會被高昂的土地租金／價格「徵收」：超額利潤會被地主階級吸走。但是，對於超額利潤的追求，在生產中引發了一種區位動態，平行於技術和組織的動態。這兩種獲得競爭優勢的方法，彼此間會權衡得失（例如，資本家可以在非常優越的區位上，保留他們的舊技術）。即使如此，競爭的強制法則，還是在資本主義地景中產生了恆常的不穩定。

地理分工

小規模的既存地理差異，無論是自然資源或社會建構的資賦方面，都會因為自由市場競爭而放大和鞏固，而非消失不見。競爭的強制法則驅策資本家將生產重新安置在比較有利的區位，特定形式商品生產的特殊需求，則推動資本家邁向領域專殊化。這有很多種方式。除了比較明顯的，由於不同資源天賦造成的生產的區域專殊化，建構的資賦（例如營造環境）之間的差異，也會有所影響。這就將都市過程帶到了理論的核心焦點。但是，經濟體的不同部門，像是指揮與控制功能、研究與開發、生產、行銷和財務，其組織方式都不一樣，也有各自獨特的區位要求和空間範圍（例如，貨幣，尤其是其信用形式，在空間中可以比商品或生產活動更容易移動）。財務控管可以且逐漸是座落於一個地方，而商業活動和生產出現在其他地方。群聚經濟（Agglomeration economies）（包括經由都市化而達致者）產生了一種區位動態，使得新的生產傾向於被吸引到既有的生產區位。近年來，許多人關注資本在空間中的聚集（concentration）和集中（centralization）的「自組式」動態。經濟體內部的循環和積累因果關係，因此確保了資本豐裕的區域傾向於成長得比較快，而貧乏地區成長得比較差。地理集中和分散的張力，遍布地景。

壟斷式競爭

76 壟斷是個基本概念，因為（a）對於做為私有財產安排之生產資料（means of production）的壟斷控制，乃是資本主義的基礎，（b）競爭的最終結果很可能是壟斷（我們目擊了壟斷與寡占勢力在近期的新自由主義支配中，令人難以置信地崛起），以及（c）資本家尋求壟斷勢力，因為這能提供更大的安全、可計算性，並容許理性的剝削結構。傳統的區位理論正確地訴諸壟斷式競爭的理論，因為無論是誰控制了特定區位的財產權，就成了絕對空間與時間中的壟斷者。

在過去，高運輸成本和其他移動障礙（通行稅和關稅），意味了有許多地方壟斷者的存在。例如，19世紀早期，地方釀酒商、麵包師傅和燭臺製造商，都受到高運輸成本的保護而免於競爭。藉由這種方式，19世紀的資本主義雖然規模小而分散，卻比現在更少競爭。但是，隨著空間阻礙的消除，許多地方產業喪失了它們的壟斷特權。他們被迫和其他區位的生產者競爭，先是位置鄰近者，然後是那些越來越遠的生產者。近幾年來，運輸成本的下降，以及貿易阻礙（關稅等）的減少，在許多部門裡，都降低了（如果沒有消除的話）壟斷式競爭的空間和疆域面向（個人服務業是個主要例外，雖然即使在這裡，某些服務功能也都已經移到境外了）。雖然歸因於空間區位的壟斷要素，並未完全消失，但資本家必須找出不同辦法，來建構和保有他們的壟斷特權（例如，藉以對抗來自中國的產品狂潮）。兩項主要行動是導向資本的漸趨集中化，以及藉由專利法和智慧財產權來保護技術優勢。在兩種情況中，效果都是在關鍵位址（例如所謂的「全球」城市）

集結資本積累的強大力量。位於其他空間的活動，則可能成為這些集中化勢力的附屬。因此，多國公司看得見的手（錢德勒〔Chandler〕如此稱呼），在資本主義的地理不均發展上，相對於市場那隻隱匿的手，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如果沒有更重要的話）。

加速與經由時間消滅空間

有很強烈的個人和集體動機，要將資本的週轉時間降到最低，而且，我們因此看到了，有許多創新是為了加速生產、行銷和消費。既然距離是以移動的時間和成本來衡量的，就有強大的壓力要藉由運輸和通訊創新，來減少距離摩擦。商品、人員（勞動力）、貨幣和資訊移動的成本與時間，透過馬克思所謂的「經由時間消滅空間」而減少，這正是資本積累的基本法則。這種現象在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中明顯存在，而且在許多方面支持了不均地理發展的生產。有一項效果已經受到了注意：由運輸和通訊成本所確定的，空間中的壟斷式競爭元素，已經有系統的隨著時間而縮減了。在某一組運輸和通訊關係（例如鐵路和電報）下達成的任何空間安排，必須改變來配合任何一套新條件（例如航空運輸和網際網路）。此外，我們必須考慮資本（作為貨幣、商品、生產活動）和勞動的不同地理移動性。例如，貨幣資本較為輕易的移動，可能為特別是難以移動的生產類型造成困難。

77

運輸成本的普遍降低，並未瓦解疆域區分和勞動專殊化的重要性。實際上，這還容許了更細緻的疆域區分，因為高

度移動的資本可以更方便的利用生產成本的細微差異（歸因於原料、勞動條件、中間投入、消費者市場、基礎設施或賦稅制度）。簡言之，減少了距離摩擦，使得資本對於地方地理變異的敏銳度提高而非降低。自由貿易和運輸成本縮減的綜合效果，並非透過疆域分工的變化而達致更高的均等，反而是地理不均等的擴大。

生產與消費的實質基礎設施（鑲嵌於土地的固定資本）

必須有空間上固定且不能移動的運輸及通訊系統等實質基礎設施（港口、機場、運輸系統），才能將其他資本和勞動形式解放出來，達致更便利的空間移動。運輸投資會被吸引到主要的生產、金融和商業中心，因為這裡是投資最有利可圖的所在。隨著運輸系統的不均地理投資，促進了更高程度的不均地理發展，我們可以感受到一股強大的向心力。在這背後，時空中之資本積累的理论裡，存在著固著（fixity）與移動（movement）的根本矛盾。鑲嵌於土地的實質投資，形成了交換、生產和消費過程的必要先決條件。非常具體的條件，調節了營造環境中資本的循環（在資本發覺很難或不可能承擔的建設計畫方面，若非由國家出資，通常會深度依賴信用和債務融資）。這種投資的路徑很容易與標準循環過程抵觸，原因正是其運作乃位居不同於標準型資本循環的時空視野上。這種投資必須協調一致，使得運輸關係、勞工階級住宅、工廠和辦公室、購物中心與休閒場所、機構（醫院、學校等），以適當的協調整合和彼此通達的方式，匯聚在物理空

間中。其效果是讓這些投資在地理上聚集起來。這種聚集導致都市化（urbanization）的形成，成為一個有空間秩序的實質架構，讓資本積累在其中展開。

78

不同土地用途之間的競爭、地主從有利區位抽取租金的權力，以及實質地景隨時間過去而變得較為僵化、缺乏彈性的趨勢，全都傾向於凍結不均地理發展的模式。土地資本經常需要來自金融資本和（或）國家的大力支持，以便籌畫和興建工程計畫，如果要避免貶值的話，這些計畫就必須在一段長時間裡，有適當且連續的使用。建造一座沒有船隻進入的港口設施，會導致投入該設施的資本貶值。因此，在奮鬥爭取一切其他資本集團的更高地理移動性之際，地理的固著有增加的趨勢。很顯然的，這裡有很多機會發生資本集團之間的緊張，以及營造環境的貶值危機。

區域體的生產

營造環境中的投資，有效地界定了資本循環的區域空間。在這些空間裡，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尤其是勞動力的）供應與需求、階級鬥爭、文化與生活風格，匯聚在一個開放系統中，但該系統展現了某種「結構一致性」（structured coherence）。消費模式在這裡根據財富和權力的集中而在地理上分化（例如，曼哈頓財富的龐大匯聚，將該地轉變為非常特殊的市場），文化分化則可以加以轉變或積極生產出來，以便形成利基市場（niche market）。消費者力量和消費者偏好的分化世界，在此成了一個地理不均發展的主要決

定因素。區域意識和認同，甚至是情感性的忠誠，可能在這個區域內部建立，而且當它遭到某種治理機構或國家權力的壓制時，區域空間可能變成一個疆域單位，成為某種類型的集體消費與生產及政治行動的明確空間而運作。這個集體可以藉由擔負起將各種基礎設施（公路系統、港口設施、自來水與污水系統等）鑲嵌於土地上的責任，來鞏固自身，並且設置多重的制度性支持（教育和健康照護），來界定它與資本積累的特殊關係，以及與世界其他地方的關係。

因此，通常會出現區域階級聯盟來建立一個治理模式，而其報酬基本上是這個區域而非階級的經濟健全和福祉。土地資本（和開發商資本）時常在「成長機器」（growth machine）政治中帶頭，但金融資本經常也涉入很深，因為土地資本高度仰賴信用系統。這裡就有了「成長機器政治」、「都市企業主義」和「區域成長聯盟」及其他治理結構，致力於改善該區域／疆域相對於其他區域／疆域的競爭力。地方資產階級（小型商業、土地所有者、地主）可能提供群眾支持，而勞工階級的各種成分，也經常能被說服加入地方階級聯盟，其基礎是區域的繁榮將替他們提供外溢利益。地方聯盟的結構變化非常大，這取決於由誰擔任領導角色，計畫是什麼，以及它如何接合起來。聯盟很容易變得排外（例如反對移民），以及發展掛帥，它們可能隨著情勢不同而分裂、衝突不斷，或是享有安穩的霸權地位。因此，不均地理發展的重大變項之一，是區域階級聯盟形構的性質和形式。

當然，總是會有破壞區域體（regionality）之結構一致性的力量。階級聯盟可能崩潰或轉移。界線充滿了孔洞，資本和勞動都可以移入和移出（尤其是為了回應特殊地方的危機

和貶值)。運輸關係的革命可以變更整合模式，並且改變最能夠達致結構一致性的尺度。資源可能耗盡，或者降低了重要性，因為其他地方有更廉價的資源開發出來。過往的基礎設施配置與投資，可能因為強大的技術變遷潮流而過時廢棄。階級鬥爭可能往外和往內蔓延，治理結構內部衝突造成的片斷化，可能破壞政治凝聚性（試想北愛爾蘭做為資本積累位址的長期問題）。國際壓力同樣可以影響區域結構，使其早期一致性變得過時無用（就像 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許多舊工業區域發生去工業化的情形）。即使如此，有眾多證據顯示，區域體總是透過資本積累而在「打造中」與「調整中」。後續的資本積累總是必須協商、對抗，以及必要的話，革新它先前生產出來的區域結構。資本主義若沒有這些交戰，就無法存在。不均地理發展的理論因而必須承認這些過程的力量，它們獨立於為了其他理由而建立疆域結構的任何既有傾向。

尺度的生產

經由時間來消滅空間，導致了資本積累之時空結構化的尺度（scale）轉變。它延伸了貨品、金融流動，以及資訊可得性（availability）的典型空間範圍。它轉變了勞動市場的地理形勢。資本（例如企業組織）集中化和分散化之間的張力，活動的地理聚集和分散的緊張，明顯可見。勞動的疆域分工、技術和組織形式，以及類似的經濟體，都會有所影響。我們如何理解資本主義底下的尺度生產，是個關鍵問題。近年來，這已經成為研究的焦點。有件事情很清楚：積累發生

所在的主導性地理尺度，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存在著尺度的層級（時常描述為地方、區域、國族和全球，雖然這些本身都是任意的指稱），資本循環通過這種尺度層級而運作，同時生產出它本身獨特的組織尺度。

因此，在某個時期有意義的區域體尺度，不必然在另一個時期有意義。區域結構必須理解為內蘊了不穩定，在它們之間穿越的資本與勞動流動的反覆無常，成為資本主義不均地理發展的特有疾患。但是，這又會要求我們面對整個疆域管理（尤其是國家及其權力）的議題，它疊覆在區域體透過資本循環與流通而生產的內在傾向上。

政治管理的疆域系統（干預主義國家）

資本主義並未發明疆域管理。資本主義掌握了政治—行政結構，並且當它成為主導性的政治—經濟系統後，調整、轉變，以及有時候是徹底革新了它們。簡言之，如果國家不存在，資本主義就必須發明國家。實際上，這個世界已經由資產階級力量再疆域化了（reterritorialized）。許多情況下，這是透過為遂行殖民統治而分割出疆域行政結構而達成的。殖民管理的便利或殖民權力的競爭幻想，當然絕對不會自動與商業和資本主義的要求一致，但這所導致的拼花布般的殖民疆域，隨著解殖（decolonization）而成為獨立國家，卻以粗略且現成的方式服務於資本積累。另一方面，國族國家於歐洲和其他地方的崛起，則是複雜得多的事情，資產階級對抗非資本家勢力以獲取政治支配的鬥爭，部分是透過行政的疆域

結構而展開的。貨幣、法律、軍事和意識形態機器的控制，對於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繁榮很關鍵。例如，義大利和德國的統一，與並未沿著資本主義路線組織的老舊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和奧圖曼（Ottoman）帝國的崩解，恰好形成對比。

資本主義的霸權力量，已經穩定地隨著時間而轉移尺度，從義大利的城邦國家（像威尼斯與熱那亞），經由荷蘭到英國的中間型組織形式，最後是美國。最近一回合的資本主義全球化，伴隨的是反映了運輸和尺度壓力變化的強烈再疆域化潮流。像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等組織變得比較突出，在此同時，都市區域（像是加泰隆尼亞〔Catalonia〕），以及某些情況下，甚至是準城邦國家（新加坡與香港），都成為資本主義事業活力充沛的核心。雖然某些人堅持，傳統國族國家相較於全球資本已經變得不相關且無能為力，這樣的說詞錯了，但它們確實變得更容易滲透（尤其是相較於資本流動），而且在某些重要方面，改變了它們的功能（如我們於第一章所見，主要是邁向新自由主義為投資建立「優良企業環境」的目標）。在其新自由主義的構造下，資本主義國家的功能，比起歷史上的任何時刻，目前越來越清楚是擔任「資本家階級利益的執行委員會」。

81

適當的行政與權力之疆域結構，是資本主義存活的必要條件。難題在於，疆域權力一旦形成，就會成為資本主義地理形勢相對固定的特性，並且會抗拒變遷的壓力。資本主義地景中，固著與移動之間的張力重新凸顯出來，因為國家牽涉的是固著而非移動。但是，國家做為區域體的制輪楔，是確保形成生產、交換和消費之集體先決條件的首要載體。因

此，國家行政總是資本循環與積累中的積極能動者。「干預主義」(interventionist) 國家必然要接替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理論的「促進式」國家。它也承擔了試圖透過財政和貨幣政策來中介、甚至是解決資本主義長期危機傾向的角色。

國家做為一個政治實體，是階級鬥爭和階級形構的領域。它要能夠運作，就必須邁向某種形式的民主治理（不論有多少偏見和侷限）。資本家階級集團以及其他階級和社會群體，在國家政治領域中，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而爭鬥，這個政治領域總是難以預測，而且容易發生政治／意識形態的騷動。結果是，從福利安排，到國家經濟政策與投資決策的每樣事物，都有不均地理發展。國家和其他政治實體（像是城市與都會區政府），無論是否願意，都被迫加入了跟其他實體爭取經濟及政治優勢的競爭性鬥爭。由於戰爭和其他形式的軍事壓力是有效的工具（就像著名的格言所說的，「是透過其他手段執行的外交」），於是，強權的軍事均勢在保有全球經濟體中的優勢地位上，其角色的吃重程度就幾乎跟經濟力量一樣。不過，這就引導我們去考察資本主義內蘊的地緣政治。

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

資本主義裡有著權力的疆域邏輯（或譯，領土邏輯）和資本主義邏輯的核心矛盾。這個矛盾內化於資本積累中，因為一方是區域體和疆域階級聯盟形構，另一方是資本的自由地理循環，兩者產生了緊張。所謂的疆域邏輯，我是指在疆域上界定的實體，像是國家，為了在自身權利範圍內確保利

益和積蓄力量，所訴諸和運用的政治、外交與軍事策略。資本主義邏輯聚焦於經濟勢力橫跨和穿越連續空間，經由生產、貿易、商業、資本流動、貨幣移轉、勞動遷移、技術轉移、貨幣投機、資訊流通、文化衝力等日常實踐，而朝向或遠離疆域實體的方式。這兩種邏輯大相逕庭。雖然它們無法彼此化約，卻有緊密的糾葛關聯。首先，能動者的動機和利益不同。握有貨幣資本的資本家，會希望將它投到有利可圖的任何地方，而且通常試圖積累更多資本。政客和政治家典型上尋求的結果，則是要維持或擴大他們的疆域相對於其他疆域的力量。資本家追求個別優勢，而且（雖然通常受限於法律）除了他或她自己的近身社交圈外，不對其他任何人負責，但政治家追求集體優勢，而且受限於國家的政治與軍事情勢。資本家比較是在連續的（相對和關係）空間和時間中運作，政客則比較是立足於絕對的疆域空間。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公司來來去去、改變區位、合併或退出，但國家是長久存在的實體，侷限於固定的疆域邊界。權力的疆域邏輯和資本主義邏輯的辯證，具有深遠廣闊的影響，尤其是帝國主義和地緣政治方面。

在資本主義的時空邏輯中，興起了兩種不同但相關的地緣政治鬥爭形式（融合成為帝國主義的實踐）。首先想像一個特殊疆域（像是達到某種積累的結構一致性的孤立國家，擁有治理的區域階級聯盟支撐）。資本積累的矛盾形成了資本和勞動的過度積累危機，威脅要造成大規模的資本貶值，和毀滅性的失業水準。面對這種困境，資本會尋求一種「空間修補」（spatial fix）。資本，以及或許是勞動的剩餘，會出口到其他地方（例如，在 19 世紀，從英國出口到殖民地或美國）。

當然，這需要有某些疆域開放出來，以供資本與勞動的穿透。疆域可能藉由軍事力量、殖民化或商業壓力而撬開，或者，它們可能自願開放自己，以利用來自其他地方的剩餘資本（就像中國近年來的所作所為，吸收了大量外國直接投資）。疆域力量的角色，在這裡是要確保特別是剩餘資本能夠移動的開放空間。其效果是資本積累可以向外散播，在世界舞台上增殖滋長。但是，最終所有被資本主義「占領」的疆域，都會產生資本剩餘而尋求空間修補。著眼於影響或控制其他疆域的地緣政治對抗，是無可避免的結果。這種對抗在20世紀，協助造成了資本主義強權之間的兩次世界大戰。

這第一種情節融合成為第二種。假設一個比較開放的區域體，裡頭有處於不同發展狀態的、各種不同但相互連結的資本積累之疆域構造。這些疆域之間的勞動和資本流動，以及商品交換，可以在相對沒有危機的模式裡，有助於維持總體的積累率，前提是（a）有可能從分工的疆域漸趨專殊化中獲利，（b）某處的資本和勞動剩餘，可以搭配上其他地方的資本與勞動短缺，（c）高運輸成本和制度限制（如關稅）造成的移動障礙有系統地減少了，以及（d）特定地方的過度積累壓力，不會在區域階級聯盟中產生防衛性的姿態（像是保護主義的呼籲）。當然，這種情節類似於資產階級經濟學所提議的，好幾種版本的區域間發展（interregional development），認為從貿易、比較利益等獲得的收益，可以整合成為相互支持的經濟成長之動態模式。這裡的空間修補似乎能夠支撐資本主義的長期穩定，將危機形成和貶值限制在地方事件上（某處關閉了工廠，另一處提高了失業率）。

這種事件的「快樂良性循環」，由於兩項重大因素而瓦解

了。一方面，區域階級聯盟之間的競爭，產生了強制性的力量。內部政治結構被迫調整，以適應不受歡迎的外部壓力（國際貨幣基金的結構調整方案就屬於這一種）。區域被迫形成某種權力和利益的階層，使得較富裕的區域成長更快，而貧窮區域則負債苦惱。這可能導致內部騷亂、治理階級聯盟的崩解，以及與外部勢力的交戰。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球危機的問題，因為過度積累在每個地方都成為長期問題（1930年代的大蕭條是個經典案例）。疆域之間的共生和相互支持關係，實際上是誰要去承擔貶值代價的競爭。地緣政治鬥爭因而在全球尺度接踵而至，後果難料，而且有可能產生暴力結果。

社會鬥爭的政治

84

潛伏在前一節論證裡頭的觀念是，階級與階級集團之間的鬥爭，雖然深刻鑲嵌於資本積累的動態中，卻不只是瓦解或重新導引了能夠自我複製（即使有危機形成和解決的不確定地緣政治）的整個系統的微觀動態。這只是個方便的虛構，而且立即會提出疑問，即當階級和集團以及其他政治與社會鬥爭形式出現，成為不均地理發展的積極決定因素時，會發生什麼事情。爭取國族解放，爭取國族做為凝聚的國家形式，反映族裔認同或宗教關聯而存在的權利，這種鬥爭不能被掃到一邊，當成只是資本主義歷史地理的小病痛。但是同樣的，我也認為，將這種鬥爭當成宛如它們全然獨立於奪取式積累過程，或者脫離了時空中資本積累的一般動態，那也不對。譬如說，由於資本積累導向了疆域階級聯盟的結構，產生某種區域體和地緣政治對抗，非常有可能的是，任

何有關族群或宗教認同及自主的鬥爭，都將交織且結合所有這些力量。與奪取式積累之間，也可能存在有同樣的連結。對於理解像是長期的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這麼複雜且戲劇化的事情，這種交織非常重要。雖然這樣的衝突無法簡化為奪取式積累和資本擴大再生產的混合，它也無法看成是完全獨立而自主的存在。這種內部連結正是有待拆解的最大疑惑。因此，參照理論結構裡的其他三種元素，來檢視社會鬥爭的變化特質，會有所幫助。

社會運動與奪取式積累

有關原始積累和奪取式積累的鬥爭，在過去和今日的世界裡，都為數眾多。所以，我們應該謹慎地關注到它們的起源、它們的結構，以及它們的意義。政治民族誌和社會運動研究替全世界這種鬥爭的廣闊範圍，提供了豐富例證。這些鬥爭幾乎有無窮的變化。最明顯而具體的鬥爭，涉及的是近用土地和生活空間，以及像是水源、生物質量（biomass）（森林）、能源等基本資源。爭取尊嚴、認可、自我表現、承認某些權利（傳統、文化與習俗）的鬥爭也同樣鮮明，但由於其性質使然，除非是透過它們的效果，否則很難加以確認。環繞這類議題展開的運動，也展現了幾乎無窮多樣的目標——有些是回顧過往，渴望回歸先前既存的（真實或想像的）社會生態秩序，其他則試圖實現較偏理想性和未來主義的目標，另外一些則尋求對於社會或政治排斥，或是特定環境惡化及不正義等迫切問題的實用主義解答。

這裡的重點不是要企圖綜合或均質化這類鬥爭，形成一套一般法則，而是要釐清這些持續進行的鬥爭中，為何有那麼多內化了奪取式積累的一般問題意識。例如，巴勒斯坦人恢復土地和水源權利的鬥爭，對於理解中東衝突而言十分根本，它還聯繫上這個區域資本積累動態的更廣泛地緣政治鬥爭。這裡的論點並非化約論，而是辯證觀點：雖然這種衝突顯然表現了長期的仇恨和怨怒，但若要改善這種情況，無可避免必須處理源於奪取土地和水源近用權的問題。面對這些具體問題，至少是理解該難題的性質，以及理解支撐更大區域衝突的不均地理發展的必要條件。

我的結論是，如果沒有遇見奪取或排除的主題，就無法很深入的探索這類衝突。這種奪取逐漸超越了積聚某個社會群體相較於其他群體的赤裸暴力，而越來越涉及了有關資本積累，且透過資本積累而積聚的力量。畢竟，資本積累現在是積聚和流通權力的主要手段。這個奪取式積累的一般主題無所不在，只有它展現其中的環境與情境令人驚異的多樣性，能夠與這種無所不在匹敵。有關奪取什麼、由誰奪取，以及該怎麼辦的鬥爭，其顯然無窮的多樣變化，使得時空中資本積累的動態，增添了無法預測的魅力。但是，這種無可預測的特性，完全沒有否認，有必要在任何不均地理發展的一般理論中，讓政治鬥爭的這個面向成為主要成分。

環繞著資本擴大再生產的衝突

如果我們回溯整個積累過程如何在空間與時間中運作的

動態，我們立即能辨認出，各種類型的社會鬥爭可能會發生的眾多關鍵點。最明顯的，對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最突出的衝突地點，起源於剩餘價值生產中，資本和勞動的階級敵對。有關薪資率、契約條件、生活水準、勞動過程條件、工作日／年／生涯的長度等等的衝突，無所不在，而且它們會外溢進入政治競技場，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必得處理的事務的重要成分。有關技能形成與界定、勞動的分工與片斷化（例如，圍繞著種族、族群和性別等議題展開），有時候也會以破壞和暴力方式，進入景象中。任何區域階級聯盟及其國家機器內部的階級力量與權力的均勢，很明顯會隨著組織形式、階級意識水平、集體記憶和傳統等，而各處變異極大。然而，同樣重要的是，直接圍繞著區域體而產生的鬥爭：基礎設施投資的地理形勢、行政和集體行動的疆域化、階級聯盟形構，以及爭取地緣政治優勢的鬥爭。雖然這些現象到處可見，但馬克思主義傳統傾向於更為關注第一群直接鬥爭，也就是資本與勞動涉及剩餘價值生產的鬥爭。這一點很不幸，因為後面這種鬥爭形式〔譯按：即圍繞著區域體而產生的鬥爭〕直接聚焦於不均地理發展，不僅是產物，還是推動整個資本積累動態的積極能動者。如果疆域單位（像是國家或城市）之間的競爭，例如，不斷驅動資本主義動態前進，那麼特殊區域崛起，成為資本積累成功且具高度競爭力的中心，就會影響全球情勢。譬如，如果珠江三角洲透過製造業的資本積累，成為全世界最活潑且成功的核心之一，那麼，這裡就會設下了每個地方的底線標準，涉及勞動成本、可接受的工作條件、技術組成、工會組織等。世界其他地方（即使是在墨西哥與巴西等低工資國家）發生去工業化，正當中國工廠接手之際。

這種過程的結果，對於任何不均地理發展理論都事關重大，它們取決於疆域中聯盟的性質，以及橫跨全球空間的資本、勞動、資訊等，毫不停歇、變動不居的流動。雖然這些在原則上都相當明顯，但是，要追溯有關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鬥爭，與不均地理發展在資本積累整體動態中扮演的錯綜複雜角色，兩者之間的關係，絕非易事。不過，這是任何不均地理發展的一般性理論，必須堅定且詳盡探討的議題。

有關「生活網絡」中社會過程之物質鑲嵌的衝突

資本主義將生活網絡中，許多不是生產為商品的基本元素，都當成了商品。這適用於勞動，適用於一切我們經常指稱為「自然」的東西，以及我們社會存在的特殊形式（最明顯的是貨幣，但是也包含像文化、傳統、智慧、記憶，以及物種的物質再生產等特性）。一旦身體成為公然的「積累策略」，異化就隨之而來了（雖然這到底會受到反叛或是被動順從的歡迎，是個開放性問題）。「萬物的商品化」感染了日常生活的每個面向。博蘭尼以下列方式描繪了這種後果：

87

容許市場機制成為人類及其自然環境的唯一指導者……會導致社會的毀滅。因為「勞動力」這個宣稱的商品，無法隨意亂放、不加區別的使用，甚至是不予利用，而不會影響剛好是這個特殊商品的承載者的人類個體。在處理人類勞動力時，系統也會附帶處理貼附在那個標籤上的生理、心理和道德實體「人」。剝除了文化制度的保護外殼後，人類會因為社會暴露的效果而滅亡；他們會成

為惡行、墮落、犯罪和飢餓引起的劇烈社會混亂的犧牲者而死去。自然將會被簡化成為它的要素，鄰里和地景敗壞，河流污染，軍事安全瀕臨危險，生產食物和原料的能力遭到摧毀。最後，購買力的市場管理將會週期性地清算企業，因為貨幣的短缺和過量，證明將跟原始社會的洪水和乾旱一樣，對企業造成災難。⁹⁰

博蘭尼在這裡闡述了馬克思的基本論點，即未經管制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要能存活，唯有摧毀其自身財富的兩個主要根源：土地和勞動。因此，鬥爭環繞著商品化影響生活網絡的方式而爆發。個人和集體必然會嘗試保護自己和其他人，避開博蘭尼指認出來的破壞。隨後，就有對於環境、社會關係、社會再生產過程、集體記憶和文化傳統的積極防衛。有大量鬥爭出現在這個領域，其中有很多在最低限度上都有微弱的反資本主義傾向，因為它們試圖重建那些博蘭尼提到的「保護性的外殼」。反對商品化的破壞性後果的運動，像是環境主義，不必然會和其他形式的社會運動協調一致，但是，它們都同樣堅定對抗自由市場資本積累的動態。每一天，社會一生態領域的物質生活鬥爭，都充滿了源自商品化及其相關的拜物教的意義。對於替代出路——社會主義、環境主義、無政府主義、女性主義等——的追尋，每當它們無法以令人滿意的方式處理日常生活議題時，就會面對最明顯的失敗。

我的結論是，我們在週遭見到的反資本主義鬥爭的多樣性，部分是因為引發這些鬥爭的不同條件而導致的變異。政治鬥爭隨著在定義中哪個元素占主導地位，而有相當不同的特質。然而，我們可以辨認出這些分歧的政治鬥爭中的一貫性，而不會掩蓋它們的差異。這應該更方便我們在一個基礎

廣泛且全球性的反資本主義運動中，去思考它們之間的相互扣接。很明顯的，並非所有這些鬥爭都是古典馬克思主義意義下的「階級鬥爭」。忽略了當代條件下這種鬥爭的多面向特質，形同放棄打造反資本主義聯盟，這種聯盟實際上能夠做一些事情，來遏止（如果還不是促成轉型的話）掠奪性資本主義的所作所為。

88

評論

如果資本主義是透過不均地理發展而存活，如果資本主義**就是**不均地理發展，那麼，我們肯定需要找出適當的理論架構，來涵蓋這項事實。這些筆記並未竭盡可能性的場域。理論永遠無法提供完整或明確的世界陳述。無論如何，理論總是（或應該是）處於形成歷程。我在這裡收集的元素種類各異，但正因為如此，把它們納入對於適當理論架構的尋找，才會既有趣又充滿可能性。

我也主張，個案研究工作應該納入理論化的實踐。針對這個過程，還有一些話要說。對我而言，最近重新出版為《巴黎，現代性之都》（*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的研究，在這方面是個重要經驗。我做這個研究時，同時也在從事有關空間與時間中資本積累的理论工作，出版成為《資本的限制》（*The Limits to Capital*）。雖然我總是認為，這兩項研究是在平行的軌道上運行，但是，最初的意圖是要看看，馬克思提議的資本積累理論，在適當地延伸以便包含時空動態後，可以多好的解釋第二帝國時期巴黎發生的轉變，並且對於 1871 年的巴黎公社提出更深刻的理解。時空中資本積累理論的闡

述，是獨立在唯物論的探究之外完成。作法是將馬克思的辯證論證模式，延伸到像是固定資本形成、營造環境投資、金融資本、地租、空間結構和國家等領域。這項理論化的結果，大部分反映在這篇論文的第三部分。這個透過抽象的理論化過程，產生了各種有用的洞見，並且協助框架和重新架構了巴黎研究產生的許多基本問題。

89 但是，雖然這個理論在某些方面有所啓發且豐富，但是一點也沒能窮盡在第二帝國巴黎重塑中運作的過程及力量的複雜糾葛。很顯然的，我們需要一個更寬廣的理論架構，至於已經從闡述馬克思資本積累理論取得的理論洞見，可以轉變並鑲嵌其中，而不是予以拋棄。在某方面，馬克思自己提出了這個問題，留下《資本論》與他有關《法蘭西階級鬥爭》（*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⁹¹之間關係的問題懸而未解。其實，我在這些筆記裡所呈現的，乃是起源於巴黎研究的理論化，因為我試圖連結有些人錯誤地稱為「兩種馬克思主義」的《資本論》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的鴻溝。我在這裡爲了分別仔細探討而詳述的元素，這些理論反思的精粹，都共同出現在巴黎研究中。我在這裡提出來的，正是根據那次經驗而來的一套重構理論的反思和提議。《資本的限制》描述了我納入巴黎研究的理論架構，這些筆記則描繪了從巴黎研究中獲得的理論化架構。

因此，這些邁向不均地理發展的統一場理論的筆記，奠基於特殊個案研究，構成持續且無窮追尋的一小步，嘗試替我們當前世界上最令人迷惑、政治上最顯著的特色——長期且不斷變動的不均地理發展狀態——找到適當的理論化框架。

空間是個關鍵詞

如果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今日還在思索他那本備受讚譽的《關鍵詞》（*Keywords*）的條目，他肯定會把「空間」一詞收進去。他也很可能將空間列入像「文化」和「自然」這類概念的簡短名單中，視之為「我們語言中最複雜的字詞之一。」⁹² 那麼，我們要如何澄清附著在「空間」一詞的廣泛意義，而不讓自己身陷複雜的迷宮（這本身是個有趣的空間隱喻）呢？

93

「空間」經常引發修飾。複雜性有時候來自修飾（這經常在訴說或書寫中省略了），而不是空間觀念本身內蘊的錯綜複雜。例如，當我們寫到「物質」、「隱喻」、「閼限」、「個人」、「社會」或「心理」空間（僅舉幾個例子）時，我們指出了各式各樣深刻影響事物的脈絡，使得空間的意義取決於

脈絡。同樣的，當我們建構像是恐懼空間、遊戲空間、宇宙學空間、夢想空間、怒氣空間、粒子物理空間、資本空間、地緣政治張力空間、希望空間、記憶空間，或是生態互動空間等片語的時候（再度只是舉出這個術語顯然無窮無盡的配布場域中的幾個例子），應用領域界定了非常特殊的事物，因而使得提出空間的任何類屬定義，都像是毫無希望的任務。然而，下文我將撇開這些困難，嘗試針對這個術語的意義，提出一般性的釐清。我希望能因此稍微驅散折磨著這個術語的使用的錯誤溝通迷霧。

不過，我們選擇進入這項探究的切入點，並非純真無邪，因為它無可避免界定了一個特殊視角，強調了某些主題，而封閉了其他主題。當然，哲學思考經常被賦予某種特權，因為哲學渴望凌駕於各種分歧的人類實踐與局部知識場域之上，以便將明確的意義分派給我們可能訴諸的範疇。我的印象是，哲學家對於空間的意義，已有夠多的意見不合及混淆，使得哲學根本不是毫無問題的出發點。再者，由於我一點也沒有資格從哲學傳統內部來思索空間概念，看來，最好是從我最熟知的地方著手。因此，我從地理學家的觀點出發，並非由於這是個在空間概念的使用上，具有某種妥當權利（有時候某些地理學家會如此宣稱）的特權位址，而是因為這剛好是我從事我大多數研究的所在。在這個領域中，我跟「空間」一詞可能有何意義的複雜狀態，有最直接的搏鬥。當然，我經常援引學院及知識分工各種分支裡的工作者的著述，以及許多積極以各自的獨到方式探索這些問題的地理學家著作（人數眾多，在這篇短文裡無法一一指明）。我不打算在這裡綜合這一切著作。我要提出的是純屬個人的陳

述，說明了在我追尋針對我最關切的理論與實際議題，能夠盡可能令人滿意地派上用場的意義時，我自己的觀點如何隨之演變（或不變）。

我在很多年前就開始思索這個問題。在 1973 年出版的《社會正義與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裡，我主張，如果我們要理解資本主義下的都市過程，思考空間的性質正是關鍵。我引用了先前研究科學哲學時揀選出來，並在《地理學中的解釋》（*Explanation in Geography*）裡局部探究的觀念，辨認出三種理解空間的不同方式：

如果我們認為空間是絕對的（absolute），它就成為一個「物自身」（thing in itself），有獨立於物質之外的存在。於是，空間擁有一種結構，我們可以用來替現象分類歸位或是賦予個性。相對的（relative）空間觀則認為，空間應理解為物體之間的關係，其存在只是因為物體存在且彼此相關。有另一種意義的相對空間觀，而我決定稱之為關係空間（relational space）——依照萊布尼茲（Leibniz）的方式，空間被認為包含在物體之中，亦即一個物體只有在它自身之中包含且呈現了與其他物體的關係時，這個物體才存在。⁹³

我認為，這種三分法很值得保持下去。所以，就讓我先簡單闡述一下，這些範疇各自可能導向什麼。

絕對空間是固定的，而且我們在它的框架裡記錄或籌謀事件。這是牛頓（Newton）和笛卡兒（Descartes）的空間，它通常被再現為一個預先存在且不會移動的格網，可以從事標準化的測量，也能夠計算。就幾何學而論，它是歐幾里德

(Euclid) 空間，因此是各種地籍製圖與工程操作的空間。它是個別化 (individuation) 的主要空間——就像笛卡兒說的，是外延物 (*res extensa*) ——這適用於一切分離且有界線的現象，包括身為個體的你和我。就社會面而言，這是私有財產和其他有邊界的疆域稱號 (像是國家、行政單位、城市計畫和都市格網) 的空間。當笛卡兒的工程師懷抱一種掌控感觀看著世界時，那是個絕對空間 (和時間) 的世界，在這裡，一切不確定和曖昧，原則上都能夠消除，而人類的計算可以不受約束地施展。

95 相對的空間觀念主要是和愛因斯坦的名號，以及非歐幾里德幾何有關，從十九世紀起，有了最系統化的建構。空間是相對的，這有雙重意思：有好幾種幾何學可以選擇，而且空間架構深深取決於被相對化的是什麼，以及被誰所相對化。當高斯 (Gauss) 首度建立了非歐幾里德球面幾何的規則，來處理精確調查地球曲面地表的問題時，他也肯定了歐拉 (Euler) 的堅持，即不可能有針對地表任何部分的完美縮尺地圖。愛因斯坦將這個論點往前推，指出了一切形式的測量，都取決於觀察者的參考框架。他教導我們，必須拋棄物理宇宙中的同時性觀念。在這種構想裡，無法獨立於時間之外來理解空間，而這就要求用語上的重大轉變，由從空間與時間，轉變為時空 (space-time)，或是空間—時間性 (spatio-temporality)。當然，愛因斯坦的成就，是在檢視於光速下運作的時間過程時，找到了檢視這種空間曲度現象的精確手段。⁹⁴ 但是，在愛因斯坦的架構裡，時間依然是固定的，是空間隨著某些可觀察的法則而彎曲 (這非常像高斯發明了球面幾何學，做為透過三角測量以便調查地球曲面的精確方

法)。在比較凡俗的地理研究層次，我們知道運輸關係的空間，看起來和私有財產的空間非常不同，也確實如此。絕對空間中，由有邊界的領域所界定的區位獨特性和個別性，讓位給譬如說，跟核心城市區位等距離的多重區位。我們可以藉著區分以成本、時間、運輸模式（汽車、自行車或滑板）來衡量的距離，創造出完全不同的相對區位地圖，甚至藉由觀察網絡、拓樸學關係（郵差遞送郵件的最佳路徑）等等，打破空間的連續性。既然地表的距離摩擦各處不同，我們知道兩點之間的最短距離（以耗費的時間、成本、能量來衡量），不必然以傳說中的烏鴉飛行方式（即直線）來確定。再者，觀察者的立足點也扮演關鍵角色。典型紐約客對世界的看法，就像著名的史坦伯格（Steinberg）漫畫顯示的，隨著某人考慮哈德遜河以西，或是長島以東的地方，這種看法會模糊消散得很快。重要的是，這一切相對化不必然會減少或消除計算或控制的能力，但是，它確實顯示了針對考察中的特定現象與過程，需要有特殊的規律和法則。然而，當我們試圖整合來自不同領域的理解，形成比較統合的努力時，確實會產生困難。譬如，透過生態系統來精確再現能量流動時所要求的空間—時間性，可能就無法與穿越全球市場的金融流動之空間—時間性相容。要理解資本積累的時空節奏，需要的是非常不同於理解全球氣候變遷時所需的架構。這些分裂雖然非常難以跨越克服，但不必然是個缺點，只要我們認識到這些分裂是什麼。不同時空架構之間的比較，可以闡明政治選擇的問題（例如，我們偏愛金融流動的空間—時間性，還是金融流動經常加以破壞的生態過程的空間—時間性）。

空間的關係性概念，最常與萊布尼茲的名字連繫在一

起，他在一系列寫給克拉克（實際上是牛頓的替身）的著名信件裡，強烈反對位居牛頓理論核心的絕對空間與時間觀。⁹⁵他的主要反對意見是神學上的。牛頓的作法使得甚至是上帝也猶如位居絕對空間和時間中，而不是主宰了空間一時間性。延伸來看，關係性的空間觀點認為，在界定空間或時間的過程之外，沒有空間或時間這樣的東西存在（如果上帝創造了世界，那麼祂也是在許多種可能性之中，選擇要創造特殊類型的空間和時間）。過程並非發生於空間之中，而是界定了自身的空間框架。空間的概念鑲嵌於或內在於過程。就像相對空間的情況一樣，這個說法暗示了，我們不可能拆開空間和時間。因此，我們必須聚焦於時空的關係性，而非孤立的空間。時空的關係性觀念，暗含了內在關係（*internal relation*）的觀念：外部的影響內在化於特殊的過程或穿越時間的事物裡（這很像是我的心靈吸收了各式各樣的外部資訊和刺激，產生了奇特的思考模式，包括夢與幻想，以及理性計算的嘗試）。在某個空間點上的事件或事物，無法僅僅訴諸那個點上存在的東西來理解。它還取決於環繞著那個點而進行的一切其他事物（就像是每個進入房間討論的人，全都帶有在世界中累積起來的龐大經驗資料）。非常多樣的個別影響，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空間裡旋轉，集中且凝結於某個點上（例如在一個會議室裡），從而界定了這個點的性質。在這個論證裡，同一性（*identity*）的意義就和我們考慮絕對空間時的意思大異其趣了。如此，我們便抵達了萊布尼茲單子（*monad*）概念的延伸版本。

我們越是靠近關係性時空的世界，測量就變得越來越成問題。但是，為什麼要假設，唯有可以用某種傳統方式來測

量和量化，時空才會存在？這導向了針對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失敗（也許稱為限制比較好）的某些有趣反省，因其無法提出對於無法測量的時空概念的適當理解。在某方面，關係性的時空概念帶領我們到達了數學、詩與音樂會合（如果還不能稱為融合的話）的地點。從科學（對比於美學）的觀點來看，這對於那些具有實證主義或粗糙的物質論傾向者而言，是個詛咒。就此而論，康德承認空間是真實的，但只能經由直覺來接觸的折衷看法，試圖在牛頓和萊布尼茲之間搭個橋樑，他的做法正是將空間概念納入美學判斷的理論。但是，萊布尼茲再度受到歡迎、深受重視，不僅是網際空間（cyberspace）的大師，還是心靈一大腦議題與量子理論的較為辯證取向的奠基思想家，這顯示有強烈的動力，要超越絕對與相對空間及其相對容易測量的性質，並且超越康德的妥協觀點。但是，關係的地勢是個充滿挑戰且艱鉅的工作領域。有許多思想家在過去幾年裡，發揮了他們的天分，思索關係性思考的可能性。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深深著迷於關係性觀點的必要性，並且對其進展大有貢獻。⁹⁶ 德勒茲（Deleuze）同樣在他對於萊布尼茲（思考了巴洛克建築與萊布尼茲著作中的皺褶〔fold〕數學）和史賓諾莎（Spinoza）的思考裡，深入討論了這些觀念。⁹⁷

但是，身為一個從事研究的地理學家，我為何及如何發現研究時空的關係性模式有用處？答案很簡單，有些主題，像是都市過程中集體記憶的政治角色，只能夠以這種方式來處理。我無法將政治和集體記憶裝入某個絕對空間之中（很清楚的將它們安置在格網或地圖上），我也無法根據無論多麼精細的相對時空法則，來理解它們的流通。如果我問這個問

題：天安門廣場或「歸零地」(Ground Zero)〔譯按：即飛彈投射目標或核武爆炸點，這裡是指 9/11 事件中的紐約世貿大樓原址〕有何**意義**，那麼我能夠尋找解答的唯一方式，就是以**關係性**的角度來思考。這是在寫巴黎聖心堂 (The Basilica of Sacre Coeur)⁹⁸ 的時候，遇到的問題。而且，我也會簡短說明，如果不運用關係性的視角，就不能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

所以，空間（時空）到底是絕對的、相對的，或是關係性的？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是否有存有論式的解答。在我自己的著作裡，我認為答案是三者皆是。這是在三十年前就得到的結論，我找不到特殊理由（也沒聽過任何論證）要改變我的心意。我當時是這麼寫的：

98

空間本身既不是絕對的、相對的，或是關係性的，它可以視情境而定，成為其中一種，或同時是全部。空間之適當概念化的問題，是透過與空間有關的人類實踐而解決的。換言之，有關空間性質的哲學問題，沒有哲學上的解答——解答在於人的實踐。因此，「空間是什麼？」這個問題，必須代之以「不同的人類實踐，如何創造和使用不同的空間概念？」例如，財產關係創造了壟斷性控制可以操作的絕對空間。人群、貨物、服務與資訊的移動，在相對空間裡發生，因為它採取了貨幣、時間、能源等，來克服距離的摩擦。小塊的土地也可以獲取利潤，因為它們包含了和其他小塊土地的關係……展現為地租的關係性空間，本身成為人類社會實踐的重要面向。⁹⁹

有規則可以決定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使用某種空間架構會比較好嗎？或者，這是任意的選擇，全憑人類實踐的奇想？使用某個概念的決定，確實取決於所要考察的現象性質。絕對的概念可能非常適合用於財產邊界和疆界畫設的議題，但是，在什麼是天安門廣場、歸零地或聖心堂的問題上，就一點也幫不上忙了。因此，我發覺草擬一下絕對、相對和關係性參照架構的選擇理由，會有些幫助，雖然這可能只是個內部檢查。再者，我常常發覺我在自己的操作中，假定了它們之間有某種階層性，意思是說，關係性空間可能包含了相對和絕對空間，而相對空間包含了絕對空間，但是絕對空間就只是絕對空間。不過，我沒有自信將這個觀點提出來當作操作原則，更別提在理論上嘗試為它辯護了。我發現，在原則上讓這三個概念彼此保持辯證的張力，並且不斷思考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會有趣得多。歸零地是個絕對空間，同時也是個相對和關係性的時空。

讓我試著將這個觀點放在較為當下的脈絡中。我在一個房間裡演講。我的話語所能達到的範圍，受限於這些特定牆壁內的絕對空間，也受限於這場演講的絕對時間。要聽到我的演講，人就必須在這段絕對時間裡，位於這個絕對空間中。沒辦法進來的人，就被排除在外，遲到的人也聽不到我講話。在這段時間裡，這裡的人都可以被指認為個體——被個別化——其依據是絕對空間，像是座位。但是，我也位居相對於聽眾的相對空間中。我在這裡，他們在那裡。我嘗試跨越空間來溝通，使用的媒介——空氣——會以有所差別的方式折射我的話語。我輕聲細語，我的話語清晰度會隨著空間而模糊：後排根本聽不到。如果有錄影連接到亞伯丁

(Aberdeen)，那邊就能聽到我講話，但是後排卻聽不見。我的話語在相對時空中的接收情況有所差別。這裡的個別化比較成問題，因為在這個時空中，與我彼此位於完全相同的相對位置的人有很多。位於第四排的人，跟我的距離都相等。在能夠聽見和無法聽到的人之間，有著時空的不連續性。對於在演講廳這個絕對空間和時間裡進行的事情的分析，若經由相對時空的透鏡來解析，看起來就大異其趣了。但是，這裡還有關係性的成分。聽眾裡的個體將各式各樣從他們的生活軌跡中採集而來的觀念和經驗，帶到了這場演講的絕對空間和時間裡，而且這一切都同時出現在這個房間中：他無法不繼續思考早餐的爭論，她無法從腦海裡抹除昨晚新聞中死亡與破壞的可怕景象。我談話的方式令某人憶起某個遙遠過去的創傷事件，而且我的話語喚起另一個人在 1970 年代曾經參加的政治集會的記憶。我的話語表達了對於當前世界所發生事情的一定憤怒。我發覺自己在談話的時候，想著我們在這個房間裡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既愚蠢又瑣碎。這個房間裡有感受得到的緊張感。我們為什麼不出去，把政府推翻？我讓自己脫離這一切關係性，撤回到這個房間的絕對和相對空間中，嘗試以乾枯而技術性的方式，談論空間做為一個關鍵詞的主題。這個張力消散了，前排有個人開始打盹。我知道每個人在絕對空間和時間中的位置，但是我完全不曉得，就像俗諺說的，「大家的腦袋裡在想什麼。」我可能察覺得到，有些人跟得上我，有些人沒有，但我永遠無法確定。但是，這肯定是最重要的元素。畢竟，這是變動的政治主體性的所在。如果不是完全無法確定的話，關係性至少是難以捉摸的，但即使如此，它依然非常重要。

我以這個例子來說明，空間性本身注定會有個閹限（liminality），因為我們無可改變地同時置身於這三個架構中，即使置身其中的狀況不全然相同。我們經常在不知不覺中，最後透過我們的實際行動而偏好其中某個定義。在絕對主義的模式裡，我會做某個事情，得到某一組結論；在相對的模式中，我會建構出不一樣的詮釋，做出其他事情；如果每件事物透過關係性的濾鏡，看起來都不一樣，那麼我的言行舉止將會很不一樣。我們如何認識，以及我們如何做，都整個取決於我們擺放自身的主要時空框架。想一想，針對我們稱為「認同」的這個最令人憂慮的社會—政治概念，這會有什麼情況。在絕對空間和時間裡，每件事物都非常清晰，但是，如果來到了相對時空，事情就變得比較棘手，如果是關係性的世界，那就是非常艱鉅了。但是，唯有在最後這一種架構裡，我們才能開始掌握當代政治的許多面向，因為那是政治主體性和政治意識的世界。杜波依斯（Du Bois）很久以前嘗試以他所謂的「雙重意識」來討論這個問題——他問，在自己身上帶有同時是黑人和美國人的經驗，是什麼意思？我們現在可以把問題弄得更複雜一點，探問身為美國人、黑人、女性、女同志和勞工階級是什麼意思？這一切關係性如何進入主體的政治意識？當我們考慮其他面向——移民、流移群體、觀光客和旅行者，以及那些觀看當代的全球媒體，並且局部過濾或吸收其訊息雜音的人——時，我們遭遇的主要問題，乃是認識到這整個經驗和資訊的關係性世界，如何內化於特定政治主體（雖然是個別化於絕對空間與時間）之中，以便支持這種或那種思考和行動路線。坦白說，如果沒有從關係的角度思考發生了什麼，我們就無法理解政治主體性形成，以及政治行動發生所在的那個變化地勢。

如果絕對、相對和關係性空間概念的對比，是開啓空間做爲一個關鍵詞的意義的唯一方法，那麼我們就可以安心地把問題丟下了。但是，幸運或不幸的，還有其他同樣令人信服的方法，來討論這個問題。例如，近年來有許多地理學家指出了空間概念部署上的一項關鍵差異，一方是空間做爲理解有形之地理基礎的唯物主義計畫的基本要素，另一方是社會、文學與文化理論中廣泛挪用的空間隱喻。再者，這些隱喻經常用於破除所謂的後設敘事（例如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那些時間向度通常占上風的論述策略。這一切激起了有關空間在社會、文學與文化理論中的角色的廣大辯論。我不想介入有關這波所謂「空間轉向」的一般意義，以及它與後現代主義的特殊關係的詳細討論。但是，我自己的立場始終都很清楚：空間和時空的恰當考慮，對於理論和理解如何接合和發展，當然有重要影響。但是，這絕對不會構成任何理由，可以脫離任何類型的後設理論的一切嘗試（其結果可能是讓我們回到了 1950 年代學術界所操作的地理學，有趣的是，當前英國地理學界有相當部分的人，似乎很高興要往這方面走，但這並不明智）。因此，掌握空間做爲一個關鍵詞的要點，是要辨認出這個概念如何可能更好的整合到既有的社會、文學和文化後設理論中，以及效果爲何。

例如，卡西勒（Cassirer）設立了人類空間經驗模式的三重區分，區別了**有機的**、**感知的**，以及**象徵的空間**。¹⁰⁰ 在第一種底下，他配置了一切來自生物學的空間經驗形式（因此是物質性的，而且透過我們感官的特徵而記錄）。感知的空間指的是我們利用神經來處理身體與生物性空間經驗的方式，並且記錄在思想世界裡。另一方面，象徵空間是抽象的（而

且可能導致一種抽象的象徵語言的發展，像是幾何學，或是建築或圖象形式的建立）。象徵空間透過閱讀和詮釋而產生獨特的意義。美學實踐的問題在這裡就登上了前台。在這個領域中，藍格（Langer）區分了「真實」和「虛擬空間」。依她的觀點，後者等同於「由形式、色彩等等創造出來的空間」，以便生產可以觸知的影像和幻覺，而這構成了一切美學實踐的核心。她主張，建築「是個雕塑藝術，在無意識中且無可避免的，其首要成就總是個幻象：是純屬幻想或概念的東西，轉換成為視覺印象。」存在於真實空間中的事物，可以很輕易的加以描述，但若理解面對藝術作品時的情感，我們就必須探索大異其趣的虛擬空間世界。她主張，這總是將我們投射到一個特殊的人種領域。¹⁰¹ 這些是我在《社會正義與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中首度遇到的觀念。

列斐伏爾（Lefebvre）正是從這個空間化思想的傳統中（幾乎肯定是引用了卡西勒），建構了他自己獨特的三分法，即物質空間（朝向物理接觸和感官開放的經驗空間和感知空間）；空間的再現（構想和再現出來的空間）；以及再現的空間（納入了我們每天生活方式的感官、想像、情感和意義的生活空間）。¹⁰²

如果我在這裡聚焦於列斐伏爾，並不是因為有這麼多文化和文學理論學者，似乎假設了列斐伏爾提供了一切有關空間生產之思考源起的原初時刻（這個論題顯然是荒謬的），而是因為我發覺，採用列斐伏爾的範疇而非卡西勒的分類，操作起來比較便利。對我們人類而言，物質空間很單純就是與物質產生觸覺和感官互動的世界，這是經驗的空間。這個世界裡的元素、時刻和事件，是由具某些特質的物質性所構成

102 的。我們如何再現這個世界，就全然是另一回事了，但是我們在這裡也不是任意的構想或再現空間，而是嘗試透過抽象再現（字詞、圖案、地圖、圖表、圖畫等），來恰當（如果無法精確的話）反映我們週遭的物質現實。但是，列斐伏爾和班雅明（Benjamin）一樣，堅持我們不能夠像個在唯物論世界裡漂浮的物質原子般生活；我們也有想像、恐懼、情感、心理、幻想和夢想。¹⁰³ 這些再現的空間，是我們生活在世的方式的主要部分。我們也可能試圖再現這個空間在物質上和情感上為人所生活的方式，辦法是透過詩意意象、攝影構成、藝術重建等。一場夢、一個幻想、一個潛隱的渴望、一段喪失的記憶，或甚至是我們沿街行走時的特殊激動或一陣恐懼，都可以透過藝術作品來給予再現，而這些作品最終在絕對空間與時間中都有其世俗存在。萊布尼茲也發覺，可以替換的時空世界和夢想的整個問題，饒富興味。

就像是我們考察過的第一種空間術語三分法，我們也會受到誘惑，要將列斐伏爾的三個範疇視為階層性的排序，但是，這裡似乎最適當的方式，是保持三個範疇的辯證張力。空間和時間次序的物理和物質經驗，在某個程度上是由空間和時間的再現方式所中介的。在波浪中游泳的海洋學家／物理學家對於海浪的體驗，很可能大不同於迷戀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詩人，或是鍾愛德布西（Debussy）的鋼琴家。閱讀有關巴塔哥尼亞（Patagonia）的書，很可能會影響我們旅行到當地時，對於該地的經驗，即使我們體驗到書寫的字句與實地真實感覺之間，有相當程度的認知不一致。我們度過每日生活時，包圍我們的那些再現的空間與時間，同樣會影響我們的直接經驗，以及我們詮釋和理解再現的方式。我們

甚至可能不會注意到納入每日生活的空間次序的物質性質，因為我們緊緊追隨未經檢視的例行事務。但是，正是透過這些日常物質慣例，我們才吸收了某種空間再現如何運作的感受，並且為我們自己建立了某些再現的空間（例如，在熟悉的鄉里或「安適家居」時，有發自內心的安全感）。我們只有在某樣事物很顯然偏離位置時，才會加以注意。我要指出，真正起作用的，是範疇之間的辯證關係，即使為理解的目的，將每個元素結晶出來，成為空間與時間經驗的獨特態勢，會有所幫助。

這種空間思考模式，幫助我們詮釋藝術作品和建築。像是孟克的《尖叫》（*The Scream*）這樣一幅畫，是個物質客體，但它是從某個心理狀態（列斐伏爾的再現的空間或生活空間）的立場來運作，並且嘗試透過一組特定的再現符碼（空間的再現或構想的空間），以採取特殊物理形式（朝向我們的真實物理經驗開啓的圖畫的物質空間），向我們訴說了有關孟克如何生活於那個空間的性質。他似乎有某種恐怖的夢魘，是我們會從中驚醒尖叫的那種。他藉由這個物質客體，設法傳達出那種感覺。許多當代藝術家，運用多媒體和動力技巧，創造了好幾種經驗時空的模式結合在一起的經驗性空間。例如，以下是展覽手冊對於巴利（Judith Barry）參加第三屆柏林當代藝術雙年展的作品的描述：

103

在她的實驗性作品中，錄像藝術家朱蒂絲·巴利調查了私人和公共空間、媒體、社會與性別的用途、構成和複雜互動。她的裝置和理論著作的主題，將它們自己安置在一個觀察場域中，述說著歷史記憶、大眾傳播和感

知。在位於觀者的想像與媒體產製的結構之間的領域中，她創造出幻想的空間，凡俗現實的異化描述……在《靜音》（*Voice Off*）這個作品裡……觀者穿透了展示空間的幽閉恐懼症般的擁塞，更深入到作品中，而且被迫穿越裝置而移動，經驗到不僅是電影的印象，還有電影美學的印象。分割的投射空間提供了與不同聲音接觸的可能。使用且聽到以聲音做為驅動力，以及心理張力的強度——尤其是在投射的男性一側——傳達了這個無可觸摸且短暫無常的客體的內在力量。這些聲音替觀眾展現了某人可以如何透過它們而轉變，某人如何嘗試控制它們，以及當它們不再能被聽到時，人所感受到的失落。

展覽手冊的結論是，巴利「將過渡（transit）的美學空間搬上舞台，讓誘惑和反思之間的矛盾心理無可解決。」¹⁰⁴

但是，要完全掌握對於巴利作品的這段描述，我們必須將空間和時空的概念，帶到更深的複雜層次。這個描述裡有很多東西逃脫了列斐伏爾的範疇，但回頭指涉了絕對空間與時間（展覽擁擠的物理結構）、相對時空（參觀者穿越空間的相繼移動），以及關係性的時空（記憶、聲音、心理張力、無可觸摸和短暫無常，以及幽閉恐懼）。但是，我們也無法放開列斐伏爾的範疇。建構的空間具有物質、概念和生活的向度。

因此，我提議一個思想性的跳躍，我們可以將絕對、相對和關係性時空的三重區分，對照於列斐伏爾所指認出來的經驗的、概念化的，以及生活的空間三元區分。結果就得到一個三乘三的矩陣，其中的交叉點指出了理解空間和時空之意義的不同模態。這裡可以很正當的提出反對意見，指稱我運用矩陣再現模式會限制了可能性，因為這本身就是自我侷

限於絕對空間。這是個完美的有效反對。就我在這裡從事的是再現實踐（概念化）而論，我也無法公平對待空間性的經驗和生活領域。因此，就定義而論，我所設立的矩陣，以及我能夠加以運用的方式，其揭示力量都有所侷限。但是，承認了這些缺點，我發覺考察矩陣中不同交叉點上所浮現的組合，很有用處。於絕對空間中再現的優點是，這讓我們得以非常清楚的分別出現象。加上一點想像力，就有可能跨越矩陣裡的元素，從事辯證的思考，使得每個態勢（moment）都可以設想為具備了與一切其他態勢的內在關係。我將我腦海裡思考的東西（以某種濃縮、任意且概要的形式）描繪於圖一。矩陣裡的項目只是建議，而非定義（讀者可以享受建構自己的項目的樂趣，來稍加理解我的意義）。

104

我發覺，沿著橫軸或往下閱讀這個範疇矩陣，然後想像複雜的組合情節，會有幫助。例如，設想一下紐澤西海岸富裕的門禁社區的絕對空間。某些居民每天進出曼哈頓金融區而在相對空間裡移動，他們在金融區裡發動了信用和投資貨幣的移動，影響了全世界的社會生活，藉此賺取了龐大的貨幣力量，從而容許他們將一切能量、異國食物和不可思議的商品，回頭輸入他們門禁社區的絕對空間，來確保他們享有特權的生活風格。然而，這些居民模模糊糊感受到威脅，因為他們察覺到外頭的世界興起了一種發自內心、難以界定且無法定位的，對於一切美國事物的仇恨，它的名字是「恐怖主義」。他們支持承諾要保護他們免於這種含糊威脅的政府。但是，他們對於他們在週遭世界裡察覺到的敵意，變得越來越偏執，而且逐漸試圖建立起他們的絕對空間，以便保護自己，築起越來越高的牆，甚至雇用武裝警衛來保護邊界。同

	物質空間 (經驗的空間)	空間的再現 (概念化的空間)	再現的空間 (生活的空間)
絕對空間	牆、橋、門、樓梯、樓板、天花板、街道、建築物、城市、山嶺、大陸、水域、領域標誌、實質邊界與障礙、門禁社區……	地籍與行政地圖；歐式幾何學；地景描述；禁閉、開放空間、區位、定置和位置性的隱喻；（指揮與控制相對容易）——牛頓與笛卡兒	圍繞著壁爐的滿足感；封圍所致安全感或監禁感；擁有、指揮與支配空間的權力感；對於「範界以外」他者的恐懼。
相對空間 (時間)	能量、水、空氣、商品、人員、資訊、貨幣、資本的循環與流動；加速與距離摩擦的縮減……	主題與地形圖（例如倫敦地鐵系統）；非歐式幾何和拓樸學；透視畫；情境知識、運動、移動能力、移置、加速、時空壓縮和延展的隱喻；（指揮與控制的困難需要更複雜的技巧）——愛因斯坦與黎曼	上課遲到的焦慮；進入未知之境的驚駭；交通堵塞的挫折；時空壓縮、速度、運動的緊張或歡快。
關係空間 (時間)	電磁能量流動與場域；社會關係；地租與經濟潛勢表面；污染集中區；能源潛能；隨風飄送的聲音、氣味和感覺	超現實主義；存在主義；心理地勢學；網際空間；力量與權力內化的隱喻；（指揮與控制極度困難）——萊布尼茲、懷海德、德勒茲、班雅明	視域、幻想、欲望、挫敗、記憶、夢想、幻象、心理狀態（例如廣場恐懼症、眩暈、幽閉恐懼症）

圖一 空間性的通用矩陣

時，他們揮霍能源來驅動他們的防彈悍馬車（humvee），以便每天進出城市，結果成了壓斷全球氣候變遷脊梁的最後一根稻草。大氣循環模式變動劇烈。於是，在引人注目但極不精確的混沌理論（chaos theory）的通俗描述中，一隻蝴蝶在香港拍動雙翼，一場毀滅性的颶風侵襲紐澤西海岸，夷平了門

禁社區。許多居民罹難，他們非常害怕外頭的世界，所以忽視了撤離的警告。如果這是一部好萊塢產品，那麼一位孤單的科學家會指出危險，然後搭救他愛慕但迄今忽略他的女人，而她現在會充滿感激的愛上他……。

在講述這類簡單的故事時，證明了我們無法侷限在僅僅一種空間和時空思考模態中。在絕對空間裡採取的行動，唯有從關係的角度來看才有意義。因此，更為有趣的是，矩陣裡的各種態勢處於更清楚的辯證張力下的情況。讓我舉例說明。

要採用什麼樣的空間和時空原則，來重新設計稱為「歸零地」的曼哈頓位址？這是個可以在物質上重新建設的絕對空間，就此而論，必須做一些工程計算（由牛頓力學支撐）及建築設計。有非常多討論涉及了保留牆壁，以及該基地的負重能力。有關這個空間一旦轉變成某種物質人造物之後，於概念化和經驗之外，要如何在其中生活的美學判斷，也變得很重要（康德會同意這點）。問題在於如何安排物理空間，以便產生一種情感效果，同時滿足某些有關這個空間要如何生活的期望（商業的，以及情感和美學的）。一旦興建了，空間的經驗可能受到再現形式（像是導覽書籍和藍圖）影響，協助我們詮釋重建位址所企圖表達的意義。但是，僅僅沿著絕對空間向度來辯證移動，比起訴諸其他時空架構所能獲得的洞識，報償少得多了。資本主義開發商敏銳覺察到這個位址的相對區位，而且根據交換關係的邏輯，判斷這裡的商業開發前景。它的核心位置，以及與華爾街的指揮和控制功能的臨近性，是重要的屬性，而且，如果運輸通道在重建過程中可以改善，就更好了，因為這可以增加土地和房地產的價值。對開發商而言，這塊位址不只存在於相對時空中：這個

基地的重新設計提供了轉變相對時空的展望，以便提升絕對空間的商業價值（例如，改善到機場的通道）。時間範圍將會由營造環境之固定資本投資的攤還率及利率／貼現率考量所主宰。

但是，幾乎肯定會出現群眾的反對，由那些葬身該位址的罹難者家庭主導，反對只以這些絕對或相對時空的角度來思考和建設。無論在這塊位址上興建什麼，都必須針對歷史和記憶說些什麼。也很可能會有壓力產生，要求必須針對共同體和國家的意義，以及未來的可能性（甚至是永恆真理的展望），說些什麼。這個位址也不能忽略與世界其餘地方的關係性空間連接的議題。甚至資本主義開發商也不會反對將他們的世俗商業考慮，連結上富有啓發的象徵陳述（強調經歷了 9/11 重擊的全球資本主義，其政治—經濟系統的強大和無法摧毀），豎立起譬如說一個訴說著蔑視的高聳陽具象徵。他們也嘗試在關係性時空中表達力量。但是，有各種方式的關係性有待探索。我們會知道那些攻擊者的什麼事情，以及我們會連結得多遠？無論這個位址上蓋了什麼，這個位址現在有、也將會在世界上有關係性的現身，重要的是要反思這種現身會如何運作：它會成為美國傲慢的象徵，或是成為全球同情與理解的符號，而為人所生活其中？探討這些課題，需要我們利用關係性的時空概念。

107

如果就像班雅明說的，歷史（一個相對的時間概念）不同於記憶（一個關係性的時間概念），那麼，我們可以選擇是否要歷史化 9/11 事件，或是嘗試記憶它們。如果這個位址只是在相對空間中歷史化（藉由某種紀念物），那麼這會施加某種固定的敘事在空間上。其效果將是排除了未來的可能性和

詮釋。這種封閉性將傾向於壓縮了建造不同未來的生發力量。另一方面，根據班雅明的說法，記憶是一種潛勢（potentiality），可以偶而在危機時刻無法控制地「閃現」，顯示出新的可能性。¹⁰⁵ 那些遇到這塊位址的人可以在裡頭生活的方式，就變得無法預測且不確定。集體記憶，一種四散但依然強大的感受，瀰漫於許多都市場景中，可以在激活政治與社會運動上扮演重大角色。歸零地無法是集體記憶位址之外的其他任何東西，設計師的問題是要將這種分散的感觸，轉譯成為由磚塊、灰泥、鋼鐵和玻璃構成的絕對空間。如果像巴爾扎克（Balzac）曾經說過的，「希望是有所欲望的記憶」，那麼在那個地點創造一個「希望的空間」，需要的是記憶要被內化在那裡，同時要替欲望的表達留下一些餘地。¹⁰⁶

歸零地的表現關係性，本身提出了迷人的問題。匯聚在空間裡而產生 9/11 的力量，非常複雜。那麼，如何給這些力量某些陳述呢？某樣在經驗上是地方與個人悲劇的事情，能夠調和於對強烈濃縮於特定地方的幾個毀滅性時刻中的國際力量的理解嗎？我們能夠在那個空間裡，感覺到世界其他地區對於 1980 和 1990 年代以徹底自私方式運作的美國霸權的廣泛憤慨嗎？我們會知道雷根（Reagan）政府在塑造和支持阿富汗塔利班（Taliban）政權上扮演關鍵角色，以便破壞蘇聯的占領，而奧薩瑪·賓拉登（Osama bin Laden）之所以從美國盟友轉變為敵人，是因為美國支持腐敗的沙烏地阿拉伯政權嗎？或者，我們只會曉得外邊那些懦弱的外國邪惡「異類」（others）痛恨美國，並試圖加以摧毀，只因為美國代表解放與自由的價值？這個事件與位址的關係性空間—時間性，有足夠的心力就可以挖掘出來。但是，它的再現方式，以及它

的物質化，卻無法確定。其結果很顯然取決於政治鬥爭。重建所要召喚的是什麼樣的關係性時空，必須打一場最猛烈的戰鬥來決定。這些是我試圖在巴黎公社的歷史背景下，詮釋巴黎聖心堂的意義時，遇到的一些議題。

這引領我針對論證的政治（politics of the argument）做了一些觀察。考察空間和時空如何被運用為關鍵詞的不同方式，有助於界定批判性介入的某些可能條件。這也開啓了辨認出衝突性宣稱，以及替選的政治可能性的途徑。它邀請我們考察我們如何在實質上塑造了我們的環境，以及我們同時再現環境，並生活其中的方式。我認為可以公允的說，馬克思主義傳統並沒有深刻關注這種議題，而這種普遍的疏忽（雖然當然有很多例外），多半意味喪失了某種類型的轉型政治（transformative politics）的可能。舉例來說，如果社會主義寫實主義藝術未能掌握到想像，以及如果過去共產主義政權底下所造就的紀念性，缺乏啓發，如果計畫的社區和共產主義城市在這個世界看來，經常顯得毫無生趣，那麼，批判性地關注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就是探索有關空間和時空的思考模式，以及它們在社會主義規畫實踐中，所扮演的不必要的限制與壓縮角色。

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針對這些議題沒有太多清楚的辯論。但是馬克思自己是個關係性的思想家。在像 1848 年這樣的革命情境中，馬克思憂心的是過去可能會像夢魘一般，重壓在活人的腦海裡，而且直截了當提出了一個問題，即未來的革命詩學如何能夠在此時此地構成。¹⁰⁷ 當時，他也懇請卡伯特（Cabot）不要將他具有共產主義心態的追隨者帶到新世界。馬克思堅稱，伊卡利派（Icarians）只會重新植入從舊經

驗內化而來的態度和信念。馬克思建議，他們應該留在歐洲，當個好共產主義者，在那個空間中爲了革命性的轉型而戰，即使總是會有危險，使得「我們這個世界小角落」的革命，淪爲環繞週遭的全球力量的犧牲者。¹⁰⁸

列寧顯然爲馬赫（Mach）的唯心論再現模式很苦惱，試圖強化與牛頓有關的，絕對的、機械論的空間與時間觀點，以此做爲科學探究唯一適當的唯物論基礎。他這麼做的時候，正逢愛因斯坦將相對的、但同樣是唯物論的時空觀點推上舞台。列寧的嚴格路線在某個程度上由盧卡奇（Lukacs）加以軟化了，後者轉向了比較柔軟的歷史和時間性觀點。但是，盧卡奇有關與自然之關係的建構論觀點，遭受魏復古（Wittfogel）直接拒斥，他堅持一種頑固的唯物論，後來變形爲環境決定論。另一方面，在湯普森（Thompson）、威廉斯和其他人的著作裡，我們發現不同層次的評價，尤其是關於時間的向度，雖然空間與地方也無所不在。在威廉斯的小說《黑山居民》（*People of the Black Mountains*）裡，時空的關係性位居核心。威廉斯用它來將敘事結合起來，並且直接強調了隨著不同時空感而來的不同認識方式：

109

如果我們認真探察生活和地方，就徹底需要對於生活與地方的強烈依附。聚苯乙烯模型及其構造和理論等價物，與它們所重構和模擬的實體依然不同……在他於圖書館的書籍和地圖裡，或是在山谷的房屋裡，有一段共同的歷史，在證據和理性探究的社群中，可以將它轉譯到任何地方。但是，他唯有在山區行走，才能獲得一種不同的心靈來確認自己；非常頑強的屬於鄉土和當地，

但是延展到更廣闊的共同流動，在那裡，感動和寬宏取代了記錄和分析；不是敘事的歷史，而是生活的故事。¹⁰⁹

對威廉斯而言，在山區漫步的時候，關係性就活了起來。它以全然不同於從檔案建構出來的感受和感覺為核心。有趣的是，威廉斯似乎只有在他的小說裡，才能夠掌握這個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傳統裡，除了列斐伏爾和地理學家是例外，缺乏對於空間與時間問題意識的廣泛認識。因此，這些空間和時空的視角，如何能夠更緊密的整合入我們對於馬克思理論的閱讀、詮釋和利用？讓我先撇開一切警告和細微差別的關切，以便以盡可能明白的術語來提出論證。

在《資本論》的第一章，馬克思引介了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和價值這三個關鍵概念。每件屬於使用價值的事物，都位於絕對空間和時間的範圍裡（圖二）。個別工人、機器、商品、工廠、道路、房屋，以及實際的勞動過程、能源的耗費等等，都可以在牛頓的絕對空間與時間的架構裡個別化、描述和理解。每件屬於交換價值的事物，都位於相對時空中，因為交換導向了商品、貨幣、資本、勞動力和人員跨越時間與空間的移動。重要的是循環，連綿不斷的運動。誠如馬克思的觀察，交換打破了一切空間和時間的阻礙。¹¹⁰ 它不斷重塑我們度過日常生活的座標。隨著貨幣的出現，這種「突破」界定了更廣大且更流動的交換關係宇宙，橫越了世界市場（不是理解為一種東西，而是連續的移動和互動）的相對時空。資本的循環和積累發生於相對時空中。然而，價值是個關係性的概念。因此，它的指涉對象是關係性的時空。馬克思（有點令人驚訝的）指出，價值是非物質但客觀的。「沒

有任何物質原子進入了價值商品的客觀性」。因此，價值並不會「貼個說明標籤，然後高視闊步」，而是將它的關係性掩藏在商品拜物教裡。¹¹¹ 我們能夠接觸它的唯一路徑，是經由那個人與人之間建立了物質關係（我們經由我們生產和交易的東西而彼此關聯），以及事物之間建構了社會關係（我們生產和交易的東西標了價格）的特殊世界。簡言之，價值是個社會關係。如此，就不可能不經由它的效果來加以測量（試試看直接測量任何社會關係，你一定會失敗）。價值內化了無數勞動過程的整個歷史地理，這些勞動過程是在世界市場時空的資本積累條件下，或是與資本積累產生關聯而設置的。很多人驚訝的發現，馬克思最根本的概念是「非物質但客觀的」，因為他通常被描述為一個唯物論者，任何非物質的事物都是詛咒。我順便指出，這種價值的關係性定義，如果以某種直接和本質論的方式來加以衡量，就會變得毫無意義，或是誤置了一切努力。社會關係只能夠以它們的效果來衡量。

如果我對於馬克思範疇的特徵描述沒有錯，那麼這顯示我們不能賦予任何一個時空架構優先性。這三個時空架構必須彼此保持辯證的張力，就像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和價值，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彼此辯證的糾結在一起一樣。例如，如果沒有具體勞動建構於絕對空間和時間的無數地方，就不會有關係性時空中的價值了。如果沒有將相對時空中的全球市場結合在一起的無數交換行動，連續的循環過程，價值也不會成為一種非物質但客觀的力量。所以，價值是內化了世界市場中具體勞動的整個歷史和地理的社會關係。它表現了世界舞台上所建立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要是但不只是階級）關係。標明捲入其中的時間性非常重要，這不僅是因為過去的

「死」勞動（包括一切鑲嵌於營造環境中的固定資本）的重要性，也是因為內化於價值形式中的無產階級化、原始積累、

111

	物質空間 (經驗的空間)	空間的再現 (概念化的空間)	再現的空間 (生活的空間)
絕對空間	有用的商品、具體勞動過程、紙幣和硬幣（地方貨幣？）、私有財產／國家疆界、固定資本、工廠、營造環境、消費空間、警戒線、占領空間（靜坐）；猛攻巴七底獄或冬宮……	<u>使用價值與具體勞動</u> 勞動過程的剝削（馬克思）vs.工作是創造性的遊戲（傅立葉）；私有財產地圖與階級排斥；不均地理發展的拼貼	異化 vs. 創造性的滿足；孤立的個人主義 vs. 社會團結；忠於地方、階級、認同等；相對剝奪；不公不義；缺乏尊嚴；憤怒 vs. 滿足
相對空間 (時間)	市場交換；貿易；商品、能量、勞動力、貨幣、信用或資本的循環與流動；通勤與遷移；貶值與降級；資訊流動與來自外界的擾動	<u>交換價值</u> <u>(運動中的價值)</u> 積累的框架；商品鏈；遷移與流離的模型；投入—產出模型。時空「修補」的理論、經由時間消滅空間、資本穿越營造環境的循環；世界市場的形成、網絡；地緣政治關係與革命策略	貨幣與商品物神（永遠無法滿足的欲望）；時空壓縮的焦慮／歡快；不穩定性、不安全、行動與運動的強度 vs. 靜止（一切堅實的都煙消雲散……）
關係空間 (時間)	抽象勞動過程；虛擬資本；抵抗運動；政治運動的突發性展現與表現性爆發（反戰、68' 學運、西雅圖……）；「革命精神擾亂……」	<u>貨幣價值</u> 價值之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相對於世界市場的凝結人類勞動；運動中的價值法則，以及貨幣的社會力量（全球化）；革命性的希望與恐懼；變革策略	<u>價值</u> 資本主義霸權（「沒有其他出路」）；無產階級意識；國際團結；普遍人權；烏托邦夢想；諸眾；對他者的移情作用；「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圖二 馬克思理論的空間性矩陣

技術發展的一切歷史痕跡。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承認，「歷史與道德的元素」總是會進入勞動力價值的決定中。¹¹²於是，我們是從特殊的方式來看待馬克思理論的運作。紡紗工人藉由在絕對空間與時間中操作具體勞動，而將價值（亦即做為關係性決定的抽象勞動）鑲嵌於布匹中。

當紡紗工人被迫放棄製作布匹，工廠沉寂下來，因為世界市場裡的條件使得這個特殊的絕對空間與時間中的活動變得毫無價值時，價值關係的客觀力量便顯現出來了。雖然這一切可能很明顯，但是，馬克思理論因為未能認識到不同時空架構之間的相互作用，經常產生概念上的混淆。例如，大部分所謂「全球在地關係」的討論，都成為一個概念泥淖，因為無法理解牽涉其中的不同空間—時間性。我們無法說，價值關係導致工廠關閉，好像它是某種外部抽象力量。中國變化中的具體勞動狀況，透過相對時空中的交換過程中介，才改變了做為一種社會關係的價值，使得墨西哥的具體勞動過程停止。

112

目前為止，我大體上把注意力放在向下沿著矩陣的左欄，來從事馬克思理論的辯證閱讀。如果我開始橫向閱讀的話，會發生什麼事？使用價值和具體勞動的物質性非常明顯。但是，這要如何再現和構想呢？物理描述很容易產出，但是馬克思堅持工作操持所在的社會關係也很重要。在資本主義底下，薪資勞動者被概念化（第二欄）為替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的生產者，而這被再現為一種剝削關係。這暗示了勞動過程的生活（第三欄）乃是異化。在不同的社會關係下，例如社會主義的關係下，工作生活起來可能是創造性的滿足，並且概念化為透過集體努力的自我實現。甚至不需要

在物質上有所改變，就能夠以非常不一樣的方式來概念化和過活。畢竟，這是當列寧主張蘇聯工廠採取福特主義時的希望。對傅立葉而言，他認為工作應該涉及遊戲，以及欲望的表現，並且生活起來像是崇高的享樂，爲了要實現這一點，工作過程的物質特性必須徹底重構。在這裡，我們必須承認有各式各樣相互競爭的可能性。例如，在他的書《製造甘願》（*Manufacturing Consent*）裡，布若威（Burawoy）發覺在他研究的工廠裡的工人，一般而言，對工作的經驗不是異化。¹¹³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將工作場所轉變爲角色扮演和玩遊戲的所在（傅立葉式的），從而鎮服了剝削的觀念。工人操持勞動過程的方式，使得他們可以非異化的方式來經歷這個過程。對資本而言，這有幾個好處，因爲非異化的勞工通常工作得比較有效率。資本家因此同意實施若干措施，像是健身操、品管圈等，以便減少異化，加強收編。他們也產出了替代性的概念化，強調辛勞工作的報酬，並且產製了意識形態，以便否定剝削理論。因此，雖然馬克思的剝削理論可能在形式上是正確的，但是它並不總是或必然會轉譯爲異化和政治抵抗。這大致上取決於它如何被概念化。這對於政治意識和勞工階級行動的影響非常廣泛。因而，階級鬥爭有部分是牽涉了把剝削的意義講得更透徹，使其成爲具體勞動在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下如何完成的適當概念化。這裡真正要緊的，再度是物質、構想和生活之間的辯證張力。如果我們以機械的方式來處理這些張力，我們就迷失了。

雖然以這種方式來處理課題會有幫助，但我先前主張，「矩陣思考」提供的機會有限，除非我們準備同時自由且辯證地橫越所有矩陣態勢的範圍。讓我舉個例子。價值再現的主

要形式是透過貨幣。這也是個具有客觀力量的非物質概念，但是，它也必須採取物質形式，成為真實的使用價值。首先，這是透過貨幣商品（例如黃金）的出現而達到的。然而，這種出現是透過相對時空中的交換行動，也因此讓有形的貨幣形式成為絕對空間和時間裡的積極存在。這造成了一個弔詭，就是特殊的物質使用價值（像是黃金或紙鈔），必須再現價值（即抽象勞動）的普遍性。這又進一步暗示了，私人可以挪用社會力量，而且貨幣做為資本而置入相對時空的循環的可能性，也就出現了。馬克思指出，在貨幣如何同時做為世界市場上的有形流通手段與價值之再現，而被創造、概念化、流通和使用上，存在有許多二律悖反、對立和矛盾。正因為價值是非物質且客觀的，貨幣總是結合了虛構的性質和有形的形式。它屈服於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中描述的顛倒狀態，人與人之間的物質關係與社會關係，被記錄為事物之間的關係。貨幣做為一個欲望對象，以及做為一個大腦沉思的對象，將我們拘禁在拜物教中，而貨幣形式的內在矛盾，則無可避免的產生了資本主義危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貨幣焦慮與我們長相左右，而且有它們自己的時空區位（在永遠無法企及的，商店櫥窗中壯麗陳列的資本主義商品面前停駐的貧困孩童）。四散於絕對空間與時間之地景中的消費奇觀，可以產生相對剝奪感。我們在每個轉角，都被對於貨幣力量之拜物欲望的呈現所環繞，而這種力量是世界市場上價值的再現。

對於那些不熟悉馬克思理論的人，這毫無疑問會顯得相當神秘。然而，這裡的要點是說明，理論工作（我想要指出，這對於一切社會、文學和文化理論都一樣真確）一定且

必然會在最低限度上，導向在矩陣裡的一切點上辯證地移動，並且跨越其外。我們移動越多，理解的深度和廣度越大。這個系統中沒有孤立而封閉的盒子。辯證張力不能只是保持不變。它們必須持續擴張。

不過，我最後要提出一些告誡性的評論。近年來，許多學界人士，包括地理學家，擁抱了關係性的概念和思考方式（雖然沒有很明顯的聯繫上時空的關係性）。這項舉措既值得讚賞，又很重要，在某個程度上與文化轉向和後現代轉向有所關聯。但是，誠如傳統的實證主義地理學完全專注於絕對和相對，以及時空的物質和概念面向（迴避了生活和關係的面向），會限制了它的視野，如果只是停留在關係性和生活的層次，宛如物質和絕對性一點也不重要，也會產生嚴重危險。完全停留在矩陣右下方，跟把自己的視野侷限在左上方一樣，都是有所誤導、侷限和無效的。真正能派上用場的唯一策略是，讓張力橫越矩陣的所有位置而辯證地移動。這會讓我們得以更好的認識到，關係性的意義（例如價值）如何內在化於在絕對空間和時間中建構出來的物質性事物、事件和實踐中（像是具體勞動過程）。換個例子，我們可以沒完沒了的辯論，表現歸零地之關係性的一切觀念和設計，但是在某個點上，總是有某些東西必須物質化於絕對空間和時間中。一旦興建了，這個位址就獲得了一種物理形式的「恆久性」（懷海德的用語）。由於總是有可能重新概念化這個物質形式的意義，所以人們可以學習如何藉此來過著不同的生活；絕對空間和時間中構造物的物質性本身，就承擔了自己的重量和權威。同樣地，想要在世界上發揮某些力量的政治運動，直到它們確立了物質現身以前，都不會有效。例如，

召喚關係性的概念，像是移動中的無產階級，或是諸眾（multitude）的崛起，都非常好。但是，直到真實的身體在絕對時間的某個時刻，進入西雅圖、魁北克市和熱那亞（Genoa）街道的絕對空間以前，沒有人知道這些是什麼意思。米契爾（Don Mitchell）很敏銳的觀察到，如果沒有能力將權利具體化於絕對空間和時間中，權利就毫無意義：

如果接近城市的權利是個呼籲和要求，那麼它只能是一種被聽到的呼籲，以及擁有力量打造一個空間，讓這呼籲和要求得以現形的要求。在公共空間裡——在街角或公園，在暴動和示威時期的街道——政治組織可以把它們自己再現給廣大人群，而且透過這種再現讓它們的呼籲和要求有力量。藉由宣稱公共空間的權利，藉由創造公共空間，社會群體本身變成公共的。

米契爾正確的堅稱，公共空間「是非物質的」，而且它「構成了一個真實的位址、一個地方、一個基地，在裡頭，從這裡，可以流洩出政治行動。」¹¹⁴ 唯有當關係性連結上社會與物質生活的絕對空間和時間，政治才會活起來。忽視了這種連結性，就是追逐無關緊要的政治。

115

大致掌握空間是怎麼一回事，以及不同空間性和空間一時間性如何運作，對於建構獨特的地理學想像非常重要。但是，空間已然證明是個異常複雜的關鍵詞。它的作用是個複合詞，而且有多重的決定因素，所以，它的任何特定意義都無法孤立於其他意義來理解。但是，也正是這樣，才讓這個詞變得如此富有可能性，尤其是連結上時間的時候。

克勞斯奇拉基金會

物理學家克勞斯·奇拉博士（Dr. h.c. Klaus Tschira）於 1995 年建立了克勞斯奇拉基金會（Klaus Tschira Foundation），這是個非營利組織，旨在支持資訊學、自然科學與數學研究，並提升公眾對這些科學的認識。為表彰克勞斯·奇拉對這項目標的貢獻，他於 1999 年榮獲德國基金會全國聯合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Foundations）頒發「德國創辦人獎」（Deutscher Stifterpreis）。克勞斯·奇拉是位於沃爾朵夫（Walldorf），世界軟體產業的領導公司之一 SAP AG 的共同創辦人。在擔任理事多年後，克勞斯·奇拉目前是該公司監事會成員。

119

克勞斯奇拉基金會（KTF）主要支持應用資訊學、自然科學和數學的研究與學生計畫，公立與私立大學的教育計畫，

以及致力保存歷史紀念物和藝術的特選計畫。在這一切活動裡，KTF 嘗試促進公眾對於科學、社學和資訊學的認識。大部分提供的資金用於補助由基金會本身發起的計畫。為此，它委託來自像是克勞斯·奇拉於 1997 年創立的歐洲媒體實驗室（European Media Laboratory, EML）等機構的研究。這個應用資訊學的機構的主要目標是發展新資訊處理系統，並讓相關技術不會成為使用者感知上的障礙。此外，KTF 也徵求計畫補助的申請，只要計畫提案符合基金會主旨。

基金會址位於海德堡的波希別莊（Villa Bosch），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卡爾·波希（Carl Bosch, 1874-1940）的舊寓所。卡爾·波希是科學家、工程師與企業家，於 1899 年進入巴斯夫（BASF）擔任化學工程師，於 1919 年任執行長。1925 年，他另被指派擔任當時新設的法本工業公司（IG Farbenindustrie AG）執行長，1935 年波希成為這間大型化學公司的監事會主席。1937 年，波希獲選為德國首屈一指的科學學會，威廉大帝協會（Kaiser Wilhelm Gesellschaft）（後來成為馬克斯－普朗克協會〔Max-Planck-Gesellschaft〕）主席。波希在他的研究裡將化學和技術知識做了最巧妙的結合。1908 至 1913 年間，以哈伯（Fritz Haber）（喀斯魯，1918 年諾貝爾獎得主）先前發現的製程為基礎，他協同米塔奇（Paul Alwin Mittasch）克服了工業合成氨的諸多問題。後來稱為哈伯－波希製程的程序，很快成為迄今為止製造氨的最重要製程。波希的研究也影響了其他物質的高壓合成。他於 1931 年與伯吉尤斯（Friedrich Bergius）共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1922 年，BASF 為執行長波希在海德堡－施勒巴赫（Heidelberg-Schlierbach），建造了廣闊的鄉村宅邸和附屬建築

物。這棟別莊位於涅卡河（Neckar）上方山丘的小公園裡，步行即可抵達著名的海德堡城堡。這棟建築是 1920 年代風格與文化的絕佳典範，公認是海德堡最美麗的建築物之一，受到文化資產保護。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波希別莊成為美軍高階軍事人員的住所。後來的好幾年，一間當地企業以此地為總部。1967 年，南德無線廣播公司（Süddeutsche Rundfunk）在這裡成立海德堡工作室。克勞斯·奇拉於 1994 年末，為安置計畫成立的基金會而購置了波希別莊，同時展開了別莊的復原、更新和現代化。1997 年中以來，波希別莊已經煥然一新，結合了 1920 年代的歷史風貌，裝置了最新的基礎設施和技術，準備迎接新挑戰。以前的車庫位於別莊西邊三百公尺，目前是海德堡卡爾波希博物館，由葛達·奇拉（Gerda Tschira）創辦和經營，以紀念這位諾貝爾獎得主，展示其生活與成就。

120

資料來源：克勞斯奇拉基金會，2005

欲知更多資訊，請洽：

克勞斯奇拉基金會

Villa Bosch

Schloss-Wolfsbrunnenweg 33

D-69118 Heidelberg, Germany

Tel: (49) 6221/533-101

Fax: (49)6221/533-199

beate.spiegel@ktf.villa-bosch.de

公共關係：

Renate Ries

Tel: (49)6221/533-214

Fax: (49)6221/533-198

renate.ries@ktf.villa-bosch.de

<http://www.villa-bosch.de>

註釋

- 1 'Free Market Capitalism and the Restoration of Class Power', *Alte Aula der Universität*, Monday, June 28, 2004, 18.15; afterwards reception.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Hörsaal des Geographischen Instituts*, Tuesday, June 29, 2004, 15.15。第二場演講之後有個公開討論，由 Michael Hoyler 主持（拉夫堡，Loughborough）。
- 2 G.W. Bush, "President Addresses the Nation in Prime Time Press Conference," April 13th, 2004;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4/04/20040413-20.html>.
- 3 Matthew Arnold 引用自 R.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850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58), p. 118.
- 4 A. Juhasz, "Ambitions of Empire: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Economic Plan for Iraq (and Beyond)," *LeftTurn Magazine*, No. 12 Feb/March 2004.
- 5 N. Klein, "Of course the White House fears free elections in Iraq," *The Guardian*, January 24, 2004, p. 18.
- 6 T. Crampton, "Iraqi official urges caution on imposing free market," *New York*

- Times*, October 14, 2003, C5.
- 7 G. W. Bush, "Securing Freedom's Triumph,"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1th, 2002, p. A33.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 可以查詢網站: www.whitehouse.gov/nsc/nss.html.
 - 8 J. Valdez, *Pinochet's Economists: The Chicago School in Chi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9 G. Duménil and D. Lévy, "Neo-Liberal Dynamics: A New Phase?" , 未出版手稿, 2004, p. 4 。另參見 "Task Force on Inequalit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American Democracy in an Age of Rising Inequa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4) p. 3.
 - 10 同前註。
 - 11 P. Armstrong, A. Glynn and J. Harrison, *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II: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Long Boo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 12 同前註。
 - 13 柴契爾邁向新自由主義之路的故事, 概述於 D. Yergin and J. Stanislaw,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Pla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9).
 - 14 L. Panitch and S. Gindin, "Global Finance and American Empire," *Socialist Register*, 2005 , 即將刊登。
 - 15 T. Edsall, *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 (New York: Norton, 1984) p. 217.
 - 16 同前註, 關於 PACs , 參見 pp. 129-38; p. 235 。
 - 17 同前註, p. 235 。
 - 18 L. Alvarez, "Britain says U.S. planned to seize oil in '73 crisi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4, 2004, p. A6 。關於沙烏地同意讓油元透過美國來流通, 參見 P.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Washington's Faustian Bid for World Dominance* (London: Verso, 1999).
 - 19 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N. Smith, *American Empire, 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20 Panitch and Gindin, "Global Finance and American Empire", 前引書。
 - 21 1980 年代許多債務危機, 都在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 前引書中有所說明。
 - 22 同前註。

- 23 G. Duménil and D. Lévy, "The Economics of US Imperi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 未出版手稿, 2004。
- 24 D. Stockman, *The Triumph of Politics: Why the Reagan Revolution Faile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86).
- 25 C.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26 1980 年代, 這些現象大部分是得「調節理論」(regulation theory) 之助而有所探討, 參見 R. Boyer, *La Théorie de la Régulation: Une Analyse Critiqu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86).
- 27 G. Duménil and D. Lévy, *Economie Marxiste du Capitalism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3); R. Brenner,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The US i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Verso, 2002);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前引書; R. Pollin, *Contours of Descent* (London: Verso, 2003).
- 28 Pollin. *Contours of Descent*, 前引書。
- 29 B. Fine (ed.) *Development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eyon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London: Routledge, 2001).
- 30 很難追得上中國變化的腳步。來自亞洲開發銀行、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 (the Asian Monitor) 的報告, 搭配其他金融報刊的報導, 可以讓我們做些粗略評估。Si-ming Li and Wing-shing Tang, *China's Regions, Polity, and Economy: A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Reform Er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D. Hale and L. Hale, "China Takes off," *Foreign Affairs*, 82 No. 6 (2003) pp. 36-53。參見 H. McRae, "Working for the Yangtze dollar," *The Independent Review*, November 18, 2003, pp. 2-3; K. Bradsher, "Is China the next bubbl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8, 2004, Section 3, 1 and 9; T. Crampton, "Asia's rally defies most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21, p. 17; L. Uchitelle, "When the Chinese consumer is king,"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4, 2003, Week in Review, p. 5; K. Bradsher, "Consumerism grows in China, with Beijing's blessing,"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 2003, C15; K. Bradsher, "China's Strange Hybrid Economy,"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1, 2003, C5; J. Kahn, "China seen ready to conciliate U.S. on trade and job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 2003, A1 and C2; K. Bradsher, "Like Japan in the 1980's, China Poses Big Economic challenge," *New York Times*, March 2, 2004, A1 and C2; T. Fishman, "The Chinese Centur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ly 4, 2004, pp. 24-51.
- 31 Wang Hui, edited by T. Hutters, *China's New Order: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 in Trans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66.
- 32 Yasheng Hua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An Asian Perspectiv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Si-ming Li and Wing-shing Tang, *China's Regions, Polity, and Economy*, 前引書；J. Kahn, "Made in China, Bought in China: Multinationals Succeed, Two Decades Late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5, 2003, Section 3, 1 and 10.
- 33 J. Khan, "China's Leaders Manage Class Conflict Carefull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5, Week in Review, p. 5; E. Eckholm, "Where Workers, Too, Rust, Bitterness Boils Over," *New York Times*, March 20, 2002, A4; E. Eckholm, "A Ming Town's Sullen Peace Masks the Bitter Legacy of China's Labor Strategy," *New York Times*, April 14, 2002, International Section, 8; E. Rosenthal, "Workers' Plight Brings New Militancy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March 10, 2003, International Section A8; J. Kahn, "Beijing Leaders Populist Touch Is Not Felt by Most Rural Poo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0, 2004, A5.
- 34 J. Kahn, "China Gambles on Big Projects for its Stability," *New York Times*, Jan 13, 2003, A1 and A8; H. French, "New Boomtowns Change Path of China's Growth," *New York Times*, July 26, 2004, A1 and A8.
- 35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Statement of Yasheng Huang, "Is China Playing by the Rules? Free Trade, Fair Trade, and WTO Compliance," September 24, 2003, <http://www.cecc.gov/pages/hearings/092403/huang.php>
- 36 K. Bradsher, "GM to Speed Up Expansion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June 8, 2004, W1 and 8.
- 37 Wang Hui, *China's New Order*, 前引書, p. 53。
- 38 M. Hart-Landsberg and P.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Market Reforms and Class Struggle," *Monthly Review*, 56, No. 3.
- 39 Wang Hui, *China's New Order*, 前引書, pp. 57-8。
- 40 Yasheng Huang and Tarun Khanna, "Can India Overtake China?" *China Now*, April 3, 2004, <http://www.chinanowmag.com/business/business.htm>. 另參見 Yergin and Stanislaw, *The Commanding Height*, 前引書, 第八章與第十章。
- 41 World Commission on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Globalization, *A Fair Globalization: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2004).
- 42 從比較的觀點來檢視美國社會不平等惡化的趨勢, 參見 "Task Force on Inequalit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American Democracy*, 前引書。這些技術

報導也包含了適當的比較性資訊。

- 43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前引書, 第四章。
- 44 A. Roy, *Power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 2001).
- 45 P. Dicken, *Global Shift: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Map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Guildford Press, 4th edition, 2003), 第 13 章。
- 46 透過金融衍生性商品來分散風險的重要性, 強調見於 Panitch and Gindin, "Global Finance and American Empire", 前引書。
- 47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前引書。
- 48 R. Wade and F. Veneroso, "The Asian Crisis: The High Debt Model versus the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plex," *The New Left Review* 228 (1998) pp. 3-23.
- 49 J. Stedile, "Brazil's Landless Battalions," in T. Mertes (ed.) *A Movement of Movements* (London: Verso, 2004).
- 50 Roy, *Power Politics*, 前引書。
- 51 D. Rodrik,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Trade: As If Development Really Mattered*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2001) p. 9.
- 52 D. Chandler, *From Kosovo to Kabul: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p. 89。
- 53 Chandler, *From Kosovo to Kabul*, 前引書, p. 230。
- 54 T. Wallace, "NGO Dilemmas: Trojan Horses for Global Neoliberalism?"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Merlin Press, 2003) pp. 202-19. 關於 NGO 角色的一般調查, 參見 M. Edwards and D. Hulme (eds.)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London: Earthscan, 1995).
- 55 L. Gill, *Teetering on the Ri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 56 J. Cowan, M.-B. Dembour and R. Wilson (eds.) *Culture and Right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57 A. Bartholomew and J. Breakspear, "Human Rights as Swords of Empire,"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Merlin Press, 2003) pp. 124-45.
- 58 同前註, p. 126。
- 59 Chandler, *From Kosovo to Kabul*, 前引書, p. 27; p. 218。
- 60 同前註, p. 235。
- 61 D. Harvey, "The Right to the City," forthcoming in R. Scholar (ed.) *Divided Cities* (Oxford Amnesty Lectures).

- 62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前引書。
- 63 Bartholomew and Breakspear, "Human Rights as Swords of Empire", 前引書, p. 140。
- 64 Wang Hui, *China's New Order*, 前引書, p. 44。
- 65 R. Hofstadter,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edition).
- 66 Chandler, *From Kosovo to Kabul*, 前引書, p. 223。
- 67 B. Gills (ed.)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stanc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T. Mertes (ed.) *A Movement of Movements* (London: Verso, 2004); W. Bello, *Deglobalization: Ideas for a New World Economy* (London: Zed Books, 2002); P. Wignaraja (ed.)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South: Empowering the People* (London: Zed Books, 1993); J. Brecher, T. Costello, and B. Smith,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Power of Solidarity*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 2000).
- 68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前引書, 第四章。
- 69 D. Harvey,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第 12 章。
- 70 "Task Force on Inequalit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American Democracy*, 前引書, 描繪了一幅驚人的圖像。
- 71 例如, 這是 Wang Hui, *China's New Order*, 前引書, 就中國的案例而論, 經常回溯提及的論點。
- 72 N.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Reprint Edition, 1990).
- 73 關於什麼是我所謂的「歷史地理唯物論」, 我所能提出的最接近一般原則的說法, 參見 D. 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6),
- 74 F. Braudel,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 translated by M. Kocha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3);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P. Ranu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實際的引述見於 G.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Verso, 1994) p. 10。
- 75 J.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orton, 2002) p. 97。
- 76 K.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edition).

- 77 J.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85).
- 78 D. Harvey,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 79 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translated by Q. Hoare and G. Nowell Smith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 p. 333.
- 80 同前註， p. 419, p. 352。
- 81 H.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One, translated by J. Moore, (London: Verso, 1991) p. 145.
- 82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 前引書。
- 83 P.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9) p. 21.
- 84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ume 5*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 p. 55.
- 85 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前引書， p. 186.
- 86 R. Park, *On Social Control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7 edition) p. 3.
- 87 R.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translated by A. Schwartzschi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8); 另參見第一章（前文），以及 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A Short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88 D. Harvey, "The Art of Rent: Globalization, Monopol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 *Socialist Register* (2002) pp. 93-110.
- 89 後文的陳述大部分取自我自己的著作， 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以及相關論文，收於 *Spaces of Capital*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有關這本著作的批判性評價，參見 N. Castree, J. Essletzbichler and N. Brenner (eds) "Symposium: David Harvey's *The Limits to Capital: Two Decades On*," *Anitpode* 36 (3) (2004) pp. 401-549。其他主要著述，參見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前引書； E. Sheppard, T. Barnes and C. Pavlik, *The Capitalist Space Economy: Analytic Found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M. Webber and D. Rigby, *The Golden Age Illusion: Rethinking Postwar Capitalism* (New York: Guilford, 1996); K. Cox (ed.) *Spaces of Globalization: Reasserting the Power of the Local*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7) 以及許多其他著作。
- 90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前引書， p. 73.

- 91 K.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edition);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1848-1850*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4); D. Harvey,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Harvey, *Limits to Capital*, 前引書。
- 92 R.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vised edition, 1985).
- 93 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p. 13.
- 94 R. Osserman, *The Poetry of the Universe* (New York: Doubleday, 1995).
- 95 我就此曾有若干評論，參見 D. 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6)，尤其是第十章。
- 96 J. Fitzgerald, *Alfred North Whitehead's Early Philosophy of Space and Time*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79)；我嘗試處理了懷海德的觀點，參見 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前引書。
- 97 G. Deleuze, *The Fold: Leibniz and the Baroque*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1992).
- 98 D. Harvey, "Monument and Myth,"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69 (1979) pp. 362-81.
- 99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前引書，p. 13.
- 100 E. Cassirer, *An Essay on M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另參見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前引書，p. 28.
- 101 S. Langer, *Feeling and Form: A Theory of Art*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53)；另參見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前引書，p. 31.
- 102 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 103 W.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99).
- 104 第三屆柏林當代藝術雙年展，Catalogue: Judith Barry, Voice Off (Berlin: Biennale, 2004) pp. 48-9.
- 105 W. Benjamin, *Illuminations* (New York: Schocken, 1968).
- 106 參見 D. Harvey,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3)，第一章。
- 107 K. Marx, *The Eighteen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 108 引自 L. Marin, *Utopias: A Spatial Play* (Atlantic Heights, N.J.: Humanities

Press, 1984).

109 R. Williams, *People of the Black Mountains: The Beginning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89) pp. 10-12.

110 K. Marx, *Capital Vol I*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6) p. 209.

111 同前註， p. 138; p. 167.

112 同前註， P. 275.

113 M. Burawoy,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2).

114 D. Mitchell, *The Right to the Cit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Fight for Public Space*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03) pp. 129-352.

附錄：歷屆赫特納講座

1. *Explorations in critical human geography* Derek Gregory 1997
2. *Power-geometries and the politics of space-time* Doreen Massey 1998
3. *Struggles over geography: violence, freedom and development at the millennium* Michael Watts 1999
4. *Reinventing geopolitics: geographies of modern statehood* John A. Agnew 2000
5. *Science, space and hermeneutics* David N. Livingstone 2001
6. *Geography, gender, and the workaday world* Susan Hanson 2002
7. *Institutions, incentives and communica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y* Michael Storper 2003
8. *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David Harvey 2004

索引

條目後的頁碼係中譯本頁碼，
檢索時請查正文上方左右數碼。

A

accumulation 積累；參見 capital
accumulation 資本積累
advocacy groups 辯護團體 46-7
Afghanistan 阿富汗 48, 137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群聚經濟 95
agriculture 農業
 destruction of India's rural economy
 印度農業的摧毀 44
 and opposition to capital accumulation
 對抗資本積累 47
Allende, Salvador 薩爾瓦多·阿萊德 8
al-Qaeda 蓋達組織 5

"American values" 「美國價值」 55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47-8
anti-capitalist movement 反資本主義
 運動 113
anti-communism 反共產主義 18, 88
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 反全球化
 運動 42
Arab-Israeli War 以巴戰爭 55
architecture, and space 建築，與空間
 127, 129, 132-3
Argentina 阿根廷 64, 76
Arnold, Matthew 馬修·阿諾德 5

Arrighi, Giovanni 喬凡尼·阿銳基 91
art 藝術
 and concepts of space 與空間概念 121
 socialist realism 社會主義寫實主義 136, 141
assets, appropriation of 占有資產 37, 94
Austro-Hungarian Empire 奧匈帝國 103
authoritarianism 威權主義
 and culture of individual rights 與個人權利的文化 45
 neo-conservatism 新保守主義 52-4, 62-3
 in neo-liberal states 新自由主義國家 35, 45, 53, 62-3

B

Balzac, Honoré de 巴爾札克 135
Bandung Conference (1955) 萬隆會議 35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國際清算銀行 22
Barry, Judith 茱蒂絲·巴利 129
Bartholomew, A. 巴索羅繆 48, 52
Benjamin, Walter 渥特·班雅明 128, 132, 134-5
Bin Laden, Osama 奧薩瑪·賓拉登 135
Blair, Tony 湯尼·布萊爾 29
bourgeoisie 資產階級 22, 34, 46, 51, 87-90, 100, 102, 106
Braudel, F. 布勞岱 75-7
Brazil 巴西 8, 13, 35, 44, 64, 110
Breakspear, J. 布瑞克斯皮爾 48, 52
Bremer, Paul 保羅·布瑞默 6-8, 49

Brenner, R. 布瑞納 27
Bretton Woods system 布萊頓森林體系 10
Britain 英國
 City financiers 西堤區金融家 20
 economic crisis in 1970s 1970年代的經濟危機 9
 economic expansion in 1990s 1990年代的經濟擴張 28
 as hegemonic center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做為資本積累的霸權核心 91, 103
 intelligence on oil-producing countries 關於石油輸出國家的情報 16-7
 left political power in 1970s 1970年代的左派政治勢力 8, 10-1
 model of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義模型 28
 neo-liberal turn under Thatcher 柴契爾之後的新自由主義轉向 8, 11-3, 21, 25, 43, 53
Burawoy, M. 布若威 142
Burke, Edmund 艾德蒙·柏克 69
Burkett, Paul 保羅·博凱特 84
Bush, George W. 喬治·布希 7, 9, 52, 55
business 企業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中國共產黨 34-5
 climate in Thatcher's Britain 柴契爾主政下英國的企業環境 12
 in mission of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義國家的使命 7, 20
US coalition with elite class 美國與菁英階級的聯盟 18, 55

C

- Cabot, John 約翰·卡伯特 136
- California, energy crisis 加州能源危機 76
- Callaghan, James 詹姆斯·卡拉罕 12
- Cancun Conference 坎昆會議 35
- capital accumulation 資本積累
aim of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義國家的目標 23-4
aim of US measures in Iraq 美國在伊拉克措施的目標 7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 37-38, 40-2, 44, 70, 85, 88, 89, 105, 106, 107
experiments by European left parties 歐洲左派政黨的實驗 8
historical-geographical trajectory 歷史地理軌跡 61, 78, 88, 97, 107
Marx's theory 馬克思的理論 113-4
material embedding of processes 過程的物質鑲嵌 72, 74, 78, 86, 111
and nature 與自然 83-5
Polanyi's view 博蘭尼的觀點 75, 109-10
and regime of rights 與權利體制 51
in space and time 於空間和時間中 72, 84, 105, 122
- capitalism 資本主義
Braudel's conception 布勞岱的概念 75-7
class formation in China 中國的階級形成 34
class power and surplus generation 階級權利與剩餘產生 79, 88-9, 91
commodification 商品化 111-2
creation of abstract discourses 抽象論述的創造 77
crises of 危機 91
geopolitics of 地緣政治 104-6
and neo-liberalism 與新自由主義 11-2, 25-6, 35-6
production of scale 尺度的生產 101
as progressive movement 做為進步的運動 70
"self-organizing", concentration in space 空間中「自組式」的聚集 95
and Thatcher's organization of democratic consent 與柴契爾對於民主同意的組織 12
and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與不均地理發展 115
參見 global capitalism 全球資本主義
- Carter, Jimmy 吉米·卡特 11, 13
- Caşşirer, Ernst 恩斯特·卡西勒 128-9
- Catalonia 加泰隆尼亞 103
-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 17 ; 參見 Nicaragua 尼加拉瓜
- Chandler, D. 錢德勒 45-6, 48, 97
- Chaniotis, Angelo 安吉羅·香尼奧提斯 3
- Chechnya 車臣 62
- child labor 童工 47
- Chile 智利 8-9, 29, 38, 51
- China 中國 50, 53-4, 64, 90, 96, 110, 143
accumulation practices 積累實踐 47, 79
economic reform program 經濟改革方案 29, 31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義 30-1, 35-6, 50-1
rise of nationalism 國族主義的崛起 56

- 參見 Pearl River Delta 珠江三角洲； Tiananmen Square 天安門廣場
- Christian right 基督教右派 15, 55
- CI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中央情報局 17
- the city 城市 84, 86, 88
-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紐約市立大學 1
- "civil society" 「市民社會」 24
- civil wars 內戰 59
- class movements 階級運動 60-1
- class power 階級力量 (權力、勢力)
- capitalism and surplus generation 資本主義與剩餘的產生 85-6, 108
- Marxist theory 馬克思主義理論 108, 111-2
- neo-conservative agenda for 新保守主義議程 61
- and neo-liberalism 與新自由主義 11-12, 25-6, 30, 35-6, 65
- restoration in US in 1970s 1970 年代在美國的復辟 14, 19, 24, 27, 34, 36, 45, 49
- class relations 階級關係 24, 30
- alliance formation 聯盟形成 98, 102-5, 106, 108-9, 111
- and authoritarianism 與威權主義 27
- and China's economic evolution 與中國的經濟演變 30
- class struggles 階級鬥爭 60-1, 102, 111-2
- Marxist theory 馬克思主義理論 108, 111-2, 126, 136, 138
- undermining regionality 破壞區域體 98
- and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與不均地理發展 65-73, 79, 81-4, 86, 88-90, 92, 95
- Clinton, Bill 比爾·柯林頓 28-9, 55
- coercion 強制
- and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與奪取式積累 106
- and neo-conservatism 與新保守主義 52-7, 59-60, 62-4
- Cold War 冷戰 25, 35, 45, 54
-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 85, 88
- exploitative practices 剝削性實踐 66, 68
- struggles against 對抗的鬥爭 56, 60
-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s 疆域行政結構 100
- commodification 商品化
- capitalism 資本主義 75, 86, 110
- in neo-liberal project 於新自由主義計畫 38
- commodities 商品 70, 75, 77, 86-7, 91-3, 95, 104, 109
- common property rights 公共財產權利 39
- common sense 常識 78-81
- Communism, structural inequalities in China 共產主義，中國的結構性不平等 34, 40
- competition 競爭
- aim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 29, 31
- and anarchy 與無政府狀態 53
- and monopoly 與壟斷 14, 21-2, 24, 29, 87, 92, 94-5, 122
- spatial 空間的 95
- territorial 疆域的 67, 98, 103-4

conflicts 衝突
 around capital reproduction 環繞資本再生產 106-7, 109
 undermining regionality 破壞區域體 98
 參見 political and social struggles 政治與社會鬥爭
 consent 同意
 and hegemony 與霸權 12
 and neo-conservatism 與新保守主義 54
 consumption 消費
 conditions of physical infrastructures 實質基礎設施的條件 96
 local experiments with new forms 新式的地方實驗 60
 neo-liberal suppression of indigenous forms 新自由主義對於本土形式的壓抑 37
 regionality 區域體 97-101
 speed-up innovations 加速創新 95
 credit system 信用(信貸)系統
 and landed capital 與土地資本 97-8
 as means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做為原始積累的手段 37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反人道罪 50
 cultural forms/histories, commodification 文化形式/歷史, 商品化 39, 87
 cultural nationalism 文化國族主義 55-6, 58
 cultural theory, and relational concepts 文化理論, 與關係性的概念 143
 cultures, undermined by capitalist forces 文化, 遭受資本主義力量破壞 67-8
 "culture wars" 「文化戰爭」 63

D
 debt crises 債務危機 41
 Deleuze, Gilles 吉列斯·德勒茲 121, 132
 democracy 民主
 deficit in "democratic" countries 「民主」國家的匱乏 63
 social movements for 社會運動 64
 參見 social democratic state 社會民主主義國家
 Democratic Party (US) 民主黨(美國) 15
 Deng Xiaoping 鄧小平 29-30
 depression (1930s) 蕭條(1930年代) 105
 deregulation 解除管制(鬆綁)
 as answer to stagflation in US 美國對於停滯型通膨的解答 13
 policies of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義國家的政策 19-20, 25
 Descartes, René 勒奈·笛卡兒 117-8, 132
 developer capital 開發商資本 98
 developing countries 開發中國家
 debt crises 債務危機 22, 41
 repression of protest movements 抗議運動的壓制 44
 and US imperial power 與美國帝國勢力 18
 dialectics 辯證法 71, 83
 Marxian theory 馬克思理論 138
 Diamond, Jared 賈瑞·戴蒙德 67
 dispossession, accumulation by 奪取式積累 36-38, 40-42, 44-47, 58-9, 61-2, 70, 85, 88-9, 105-7
 divisions of labor 分工 108

geographical 地理的 97
Du Bois, W.E.B. 杜波依斯 125
Duménil, G. 杜曼尼 9, 19, 27

E

Eastern Europe 東歐 64
East/Southeast Asia 東亞 / 東南亞
authoritarian control and neoliberalism
威權控制與新自由主義 29
financial crisis 金融危機 74
investment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對中國製造業的投資 33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現代
化與發展 66
"tiger" economies 「小龍」經濟體
36
East Timor 東帝汶 48
ecological systems 生態系統
energy flows 能量流 132
uneven impacts on human development
對於人類發展的不均衡衝擊 82
economic growth 經濟成長
interregional development 區域間發
展 104
neo-liberal regime of rights 新自由主
義權利體制 51
economics 經濟學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ile's
economy 與智利經濟的重建 8
Thatcher's ideology 柴契爾的意識形
態 13
Economist 《經濟學人》 6
Edsall, Thomas 湯瑪斯·艾德索爾
14, 16
Egypt 埃及 65
Einstein, Albert 阿伯特·愛因斯坦
118, 132, 137

Engels, Friedrich 弗列德瑞克·恩格
斯 83
Enron 安隆 20, 40
environmentalism 環境主義 66, 67,
110
and uneven development 與不均發
展 71, 95, 97
and universalism 與普遍主義 47-8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環境資源
degradations 惡化 65
depletion of commons 公地的剝奪
40
ethics committees 倫理委員會 48
Euclid 歐幾里德 117-8
Euler, Leonhard 李恩哈德·歐拉 118
Europe 歐洲
investment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對中國製造業的投資 33
left's reaction to economic crisis 左派
對經濟危機的反應 10-11
neo-conservative turn 新保守主義轉
向 55, 57
neo-liberal pressures on 新自由主義
的壓力 29, 31
postwar decolonization of powers 強
權的戰後解殖 17
rise of capitalist class 資本家階級的
興起 88, 90
rise of nation state 國族國家的崛起
100
social democratic state 社會民主主
義國家 10, 12, 20, 21, 25
European Union 歐盟 56, 101
Explanation in Geography (Harvey)
《地理學中的解釋》(哈維) 2, 117
exploitation 剝削 140-2

F

- Falklands/Malvinas war 福克蘭群島 / 馬文納斯群島戰爭 25
- Falwell, Jerry 傑瑞·法威爾 15
- Federal Reserve Bank (US) 聯邦儲備銀行 (美國) 13, 23, 41, 63
- Volcker shock 沃爾克震撼 18-9
- financial crises 金融危機
- effects on people's lives 對人民生活
的影響 74
- management and manipulation of 管
理與操縱 41-2
- financial institutions 金融機構 (體制)
- importance to neo-liberal states 對於
新自由主義國家的重要性 21-4
- relationship with corporations 與企
業的關係 26-7
- financialization 金融化 20, 22, 27, 40
- Fordism 福特主義 142
- Ford Motors 福特汽車 32
- 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務》 45
- foreign investment 外國投資 12, 30,
32, 34
- channeled into China 導入中國 30-3,
104
- inflow in Thatcher's Britain 流入柴
契爾主政下的英國 12
- Foucault, Michel 米歇·傅柯 76
- Fourier, Jean Baptiste 尚·巴普帝
斯·傅立葉 140, 142
- France 法國 10, 17, 26, 56
- freedom 自由
- emphasis in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
主義國家的強調 23-4
- and Thatcher revolution 與柴契爾革
命 11-2
- and US policies in Iraq 與美國在伊

拉克的政策 5-7

參見 human rights 人權

free market 自由市場

Reagan's policies for 雷根的政策 16

reforms in Chile 智利的改革 8

and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與不均地理發展 65-67

US policies in Iraq 美國在伊拉克的
政策 5-7

Freytag, Tim 提姆·弗瑞塔格 3

Friedman, Milton 米爾頓·佛利曼 8,
11

G

Gauss, Karl Friedrich 卡爾·佛列德瑞
克·高斯 118

General Motors 通用汽車 32-3

genetic resources, privatization process
遺傳資源，私有化過程 38

Geneva Convention 日內瓦公約 6

Genoa 熱那亞 145

geographers 地理學家

dangers of embracing relational
concepts 擁抱關係性概念的危險
119

standpoint regarding concept of space
有關空間概念的立場 116, 121-2,
126

geographical divisions of labour 地理
分工 93

geographical inequalities 地理不均等
96

geographical scale 地理尺度 70, 100

geometry, and relative notion of space
幾何學，與相對空間觀念 117-8,
127, 132

geopolitics, and capitalism 地緣政

- 治，與資本主義 89, 102-5
- Germany 德國 27, 101；參見 West Germany 西德
- global capitalism 全球資本主義
- and class power 與階級力量 85-6
- and neo-liberalism 與新自由主義 25-7, 30, 32, 66
-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 與再疆域化 100-1
- and September 11 events 與 9/11 事件 134
- global crises 全球危機 105
- global justice movement 全球正義運動 44
- global-local relations 全球在地關係 141
- God, and spatio-temporality 上帝，與空間—時間性 118-20
- "good sense" 「良好見地」 79-81
- governance 治理
- established by regional alliances 區域聯盟建立的 98
- in neo-liberal state 於新自由主義國家 23
- role of the state 國家的角色 102
- governments, suspicion of 對政府的懷疑 47-8
- Gowan, P. 戈溫 27
- Gramsci, Antonio 安東尼歐·葛蘭西 12, 78-81
- Greenspan, Alan 阿蘭·葛林斯潘 41
- Ground Zero 歸零地 122-3, 133, 135, 144
- spatio-temporal perspectives on redesigning 重新設計的時空觀點 133-4, 137
- "growth machine politics" 「成長機器政治」 98
- growth rates, aggregate and global 成長率，總體與全球 36
- H**
- Habermas, J. 哈伯瑪斯 73, 76
- Hague Convention 海牙公約 6
- Haiti 海地 33, 58
- Harvey, David 大衛·哈維 2
- Hayek, Friedrich August von 海耶克 11
- hegemony 霸權（領導權）
- center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資本積累的核心 89, 101
- and consent 與同意 12
- US preservation of 美國的維持 24
- Hettner, Alfred 阿佛列德·赫特納 1-3
- Hettner-Lecture,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赫特納講座，海德堡大學 1
- Hindu National Party 印度國族主義黨 56
- history, and events of 9/11 歷史與 9/11 事件 134
- Hofmann, Peter 彼得·霍夫曼 3
- Hofstadter, R. 霍夫施塔特 53
- Hong Kong 香港 31-2, 101
- housing 住宅；參見 social housing 公共住宅
- human rights 人權
- and moral values 與道德價值 54-6
- and neo-liberalism 與新自由主義 23, 45-46, 55
- UN Charter 美國憲章 52
- and universalism 與普遍主義 47-8
- Huntington, Samuel 薩謬爾·杭亭頓 57

Hussein, Saddam 薩達姆·胡笙 5
Husserl, Edmund 艾德蒙·胡塞爾 76

I

identity, spatio-temporal understandings
認同·時空理解 125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國際貨幣基金 10, 12, 19, 75, 89,
105

movements against 對抗運動 59-60,
76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結構
調整方案 28, 42, 89, 105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exploitative practices 剝削行徑 66,
68, 87

as necessary for capitalism 做為資本
主義的必要條件 101

neo-liber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新自由主義國際組織 48

as progressive movement 做為進步
的運動 68

struggles against 對抗鬥爭 58-60

US tradition 美國傳統 17

incarceration, US state strategy 監禁·
美國國家策略 44

India 印度

appropriation of assets 資產的占用
39, 85-89

class transformations and neo-
liberalism 階級轉變與新自由主義
34-5, 61

destruction of rural economy and
industries 農村經濟與工業的破壞
44

Hindu National Party 印度國族主義
黨 56

practices of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的行徑
38, 44

social movements for democracy 爭
取民主的社會運動 64

individualism 個人主義

and anarchy 與無政府狀態 53

emphasis in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
主義國家的強調 23

Thatcher's organization of democratic
consent 柴契爾對民主同意的組織
12

Indonesia 印尼 58, 74-5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 London
經濟事務研究所, 倫敦 11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智慧財產權
38, 94

inter-ethnic violence 族群間暴力 59

investment banks 投資銀行 17-9, 22

Iran 伊朗 18, 56, 64

Iraq 伊拉克

"freedom" conferred on by US 美國
所賦予的「自由」 9-11, 54, 56

human rights used to justify
intervention in 藉以正當化干預的
人權 48

rising call for self-determination 自決
的高漲呼聲 62

Islam 伊斯蘭教; 參見 radical Islam
激進伊斯蘭教

Israeli-Palestine conflict 以巴衝突 55

Italy 義大利 10, 35, 89, 101

J

Japan 日本 12, 66, 88

and neo-liberalism 與新自由主義
26-29

rise of nationalism and moral sense
國族主義與道德感的興起 54-5
success in global economy in 1980s
1980 年代全球經濟中的成功 26,
29, 30, 36
Java 爪哇 75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約翰霍普金
斯大學 2
Jöns, Heike 瓊斯 3
Joseph, Keith 凱斯·約瑟夫 11
judiciary, in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
義國家的司法 23-4
justice 正義
as a right 做爲一種權利 49
social movements for 爭取正義的社
會運動 64

K

Kaldor, Mary 瑪麗·卡多爾 55
Kant, Immanuel 伊曼紐爾·康德 121
Keynesianism 凱因斯主義 10, 13, 19,
25, 28, 33, 35
King, Rodney 羅尼·金恩 54
Kissinger, Henry 亨利·季辛吉 8
Klaus Tschira Foundation 克勞斯奇拉
基金會 3
Korea 韓國；參見 South Korea 南韓
Kosovo 科索沃 48
Kulaks 富農 68
Kuwait 科威特 16

L

labor 勞動
capitalist commodification 資本主義
商品化 110
and collapse of manufacturing in
China 與製造業在中國的倒閉 33-4

effect of Reagan's policies 雷根政策
的影響 16
geographical/territorial divisions 地
理 / 疆域區分 95, 99
movements 運動 58-9
neo-liberal policies 新自由主義政策
20, 25, 43
and social relations of value 與價值
的社會關係 138-9
spatio-temporalities 空間—時間性
135, 141, 145
US flexibility of markets 美國市場
的彈性 28
land 土地
and China's economic evolution 與中
國的經濟演變 34
and physical infrastructures 與實質
基礎設施 96
and relational space 與關係性空間
122-3, 126, 134-5
surplus values 剩餘價值 90
landed capital 土地資本 97-8
Langer, S. 藍格 127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8, 18, 41-2,
58 ; 參見 Brazil 巴西; Chile 智利
law 法律；參見 legal action 法律行動
Lefebvre, Henri 昂希·列斐伏爾 71,
80-1, 127-130, 138
the left, reaction to economic crisis of
1970s 左派對於 1970 年代經濟危
機的回應 11-2
legal action 法律行動 46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哥特佛萊
德·威爾罕·萊布尼茲 119-21,
128, 132
Lenin, Vladimir Ilich 佛拉狄米爾·伊
里奇·列寧 137, 142

- Lévy, D. 列維 9, 19, 27
 "the lifeworld" 「生活世界」 73, 76-7
The Limits to Capital 〈Harvey〉
 《資本的限制》(哈維) 2, 111-2
 London 倫敦
 City financiers' power 西堤區金融家的權力 20
 effect of privatization of social housing 公共住宅私有化的影響 43
 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 長期資本管理 22
 Los Angeles riots 洛杉磯暴動 54
 Lösch, August 奧古斯都·廖什 91
 Lukacs, Georg 喬治·盧卡奇 137
 Luxemburg, R. 盧森堡 86
- M**
 Mach, Ernst 恩斯特·馬赫 137
 Malaysian Federation 馬來西亞聯邦 56
 Malvinas 馬文納斯群島；參見 Falklands/Malvinas war 福克蘭群島 / 馬文納斯群島戰爭
 Manhattan 曼哈頓 97, 131, 133；參見 Ground Zero 歸零地
 manufacturing 製造業
 collapse of enterprises in China 中國企業的倒閉 33
 Pearl River Delta 珠江三角洲 108
 Mao Zedong 毛澤東 29
 market economy/forces 市場經濟 / 力量
 and anarchy 與無政府狀態 53
 in Braudel's conception of capitalism 布勞岱的資本主義概念 74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中國的經濟改革 31
 Polyani's view 博蘭尼的觀點 75, 109-10
 market exchange 市場交換 91
 Marxian thought 馬克思思想
 failure to address space-time problematics 未能處理時空的問題意識 138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經濟學 122
 Marxism 馬克思主義
 approach to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發展的取向 71
 author's studies 作者的研究 2, 111-2
 Lefebvre's project for 列斐伏爾的計畫 80-1
 theory of class conflict 階級衝突理論 108
 Marx, Karl 卡爾·馬克思 57, 61, 76-7, 80-3, 95, 132-43
 abstract and concrete in theory 理論中的抽象與具體 70-1, 77
 on capital accumulation 論資本積累 37, 70, 95
 on class struggles 論階級鬥爭 38-9, 111
 theory of values 價值理論 138-9
 material space 物質空間 127, 129, 132, 140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無國界醫師組織 47
 Mellon, Andrew 安德魯·美隆 42
 memory 記憶
 Benjamin's view 班雅明的觀點 134-5
 collective 集體的 121, 135
 Mercosur 拉丁美洲共同市場 101
 Mexico 墨西哥 13, 108, 141

expulsion of peasant populations 農業人口的驅離 37
financial crisis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金融危機與結構調整 19, 28, 41, 47, 74
privatization of ejidos 合作農場的私有化 43
參見 查巴達起義
Middle East conflict 中東衝突 107
militarism/ militarization 軍國主義 / 軍事化 53-5
military dictatorships 軍事獨裁 18
military humanism 軍事人道主義 48
military power 軍事力量 104
miners' strike, Britain (1984-5) 礦工罷工，英國 (1984-5) 25
Mitchell, Don 唐·米契爾 145
monetarism 貨幣主義
global diffusion 全球傳播 28
Japan and West Germany 日本與西德 26-7
Thatcher's policies in Britain 英國柴契爾的政策 11-3
monopoly, and competition 壟斷與競爭 21, 22, 24, 29, 61, 92, 94-5
Montesquieu,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孟德斯鳩 67
moral majority movement 道德多數運動 15-6, 55
moral values 道德價值
in neo-conservative agenda 新保守主義議程 61
and neo-liberalism 與新自由主義 54-6
Mozambique 莫三比克 74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多國公司 24, 33, 87, 95

Munch, Edvard 艾德瓦·孟克 129
music industry, pillaging of regional traditions 音樂產業，劫奪區域傳統 87

N

NAFT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75, 101
nationalism 國族主義 53, 55-6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s/struggles 國族解放運動 / 鬥爭 68, 105
nation states 國族國家 100-1
natural resources 自然資源 86, 93
nature 自然 66-69, 72, 80-3, 115
neo-colonialism 新殖民主義 68
neo-conservatism 新保守主義
alternatives 替代出路 57-9
response to neo-liberalism 對新自由主義的回應 52, 60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義
alternatives 替代出路 57-9
apparatus imposed on Iraq by US 美國強加於伊拉克的機制 6
and authoritarian control 與威權控制 39, 35, 53
Chilean experiment 智利的實驗 8
and China's economic evolution 與中國的經濟演變 30, 34
contradictions and oppositions 矛盾與對立 24-5, 45, 53-4, 56-7, 61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global capitalism 全球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 25, 57, 61
and restoration of class power 與階級力量的復辟 9, 14, 19, 24, 27, 34, 36, 45, 49

resurgence of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的復現 36-44

rise and consolidation of 興起與鞏固 11

state's mission and policies 國家的使命與政策 20-5

and Thatcher revolution 與柴契爾革命 11-2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不均地理發展 29, 36

US moves towards 美國的轉向 29

US policies affecting other countries 美國影響其他國家的政策 32-3

Netherlands 荷蘭 89, 101

New Deal 新政 13

Newton, Isaac 以薩克·牛頓 117, 120-1, 132-3, 137-8

New York City 紐約市

 economic crisis in 1970s 1970 年代的經濟危機 9

 investment banks 投資銀行 17-9, 22

New York Times 《紐約時報》 7

NGO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非政府組織 24, 46

Nicaragua 尼加拉瓜 17

niche markets 利基市場 97

Nixon, Richard 里查·尼克森 11

Nobel Prize for economics 諾貝爾經濟學獎 11

Northern Ireland 北愛爾蘭 99

O

oil 石油

OPEC price rise and embargo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的價格飆漲與禁運 10, 16

US interests in Middle East 美國於中東的利益 18

Oklahoma bombing 奧克拉荷馬州爆炸案 54

Olympic Games 奧林匹克運動會 33

OPEC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Exporting Countries)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10, 16

oppositional movements, to neo-liberalism 對抗性運動，新自由主義 44, 57-8

Ottoman Empire 奧圖曼帝國 101

P

Palestine 巴勒斯坦；參見 Israeli-Palestine conflict 以巴衝突

Paris, Basilica of Sacre Coeur 巴黎，聖心堂 122-3, 136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Harvey) 《巴黎，現代性之都》(哈維) 2, 111

Park, Robert 羅伯·帕克 84

PATCO strike, US 飛航交通管制員工會罷工，美國 14

patents 專利 38, 92, 94

Pearl River Delta 珠江三角洲 108

pension rights, neo-liberal attacks on 新自由主義對於退休金權利的攻擊 38-9

philosophy, and concept of space 哲學，與空間概念 116-7, 122

physical infrastructures 實質基礎設施 96

 China's projects 中國的工程計畫 32

Pinochet, Augusto 奧古斯都·皮諾契 8, 12

policing 警政 21-2, 44

-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 (PACs)
政治行動委員會 15
- political and social movements 政治與社會運動
and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與奪取式積累 106
- animation by collective memory 由集體記憶發動 135
- hostility towards 敵視 21, 55
- need for material presence 物質現身的必要 144
- struggles for justice and democracy
爭取正義與民主 54-5, 63-4, 68
- political and social struggles 政治與社會鬥爭 58-9, 67, 70, 105-6
- battle over Ground Zero 歸零地的戰役 135
- Marx's view 馬克思的觀點 49, 110
- Pollin, R. 波林 27-8
- Polyani, K. 博蘭尼 75, 109-10
- port facilities 港口設施 97-8
- Portugal 葡萄牙 10
- postmodernism 後現代主義 126, 144
- power 權力
hierarchy in neo-conservatism 新保守主義中的階層 53
and preservation of hegemony 與霸權的維繫 24
territorial and capitalistic logics of 疆域邏輯與資本主義邏輯 102-3
-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私有財產權 14, 46, 51
- privatization 私有化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中國的經濟改革 31, 34, 37
and NGOs 與非政府組織 46
policies of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義國家的政策 21-2, 39, 43
- state pension rights 國家退休金權利 38-9
- Thatcher's policies 柴契爾的政策 11-3, 25
- production 生產
local experiments with new forms 新式的地方實驗 60
and spatial competition 與空間競爭 92
suppression of indigenous forms 本土形式的壓制 37
- proletariat 無產階級 85, 90, 140
- property 財產
and absolute spaces 與絕對空間 122-3
and China's economic evolution 與中國的經濟演變 30, 35-6, 41
property rights 財產權 34, 37-9, 51, 94
-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公私合夥 21, 23, 34
governance in China 中國的治理 34
- public spaces 公共空間 129, 145
- public utilities, privatization 公用事業，私有化 38
- Q**
Quebec City 魁北克市 145
- R**
radical Islam 激進伊斯蘭教 54
- Reagan, Ronald 隆納德·雷根 8, 13-4, 16, 19, 25-6, 35, 55, 135
- redistributive politics 重分配政治 10, 37, 40-1, 43-4
- regionality 區域體 97, 99-101

- and geopolitics of capitalism 與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 102-5
- religion 宗教；參見 Christian right 基督教右派；Hindu National Party 印度國族主義黨；radical Islam 激進伊斯蘭教
- Republican Party (US) 共和黨（美國） 11, 15-6
- rights 權利；參見 human rights 人權；property rights 財產權
- riots 暴動
- against capitalist practices 反資本主義實踐 75
- following beating of Rodney King 金恩遭毆打之後 54
- Rousseau, Jean-Jacques 尚一亞克斯·盧梭 67
- Roy, Arundhati 阿倫海蒂·洛伊 39
- Russia 俄羅斯 35-6, 38, 52, 60-1
- S**
- Sachs, Jeffrey 傑弗利·薩克斯 67
- Sandino, Augusto César 奧古斯都·西撒·桑定諾 17
- Saudi Arabia 沙烏地阿拉伯 16, 135
- Scandinavia, left political power in 1970s 1970 年代斯堪地納維亞的左派政治勢力 10
- Seattle, anti-globalization revolt 西雅圖，反全球化暴動 42, 54, 140, 145
- September 11 2001 events 2001 年 9/11 事件 54；參見 歸零地
- Shanghai 上海 31, 33, 64
- Silicon Valley 矽谷 79
- Singapore 新加坡 27, 29, 56, 105-6, 101
- slavery/slave trade 奴隸貿易 37, 51
- Smith, Neil 尼爾·史密斯 72, 82
- social democratic state 社會民主主義國家
- common property rights 公共財產權 39
- differences with neo-liberal state 與新自由主義國家的差別 20-1, 27
- Europe 歐洲 10
- social groups, creation of public spaces 社會群體，公共空間的創造 145
- social housing, privatization 公共住宅，私有化 38
- social inequalities 社會不平等
- effect of Deng's economic reforms 鄧小平經濟改革的影響 29-30
- effect of Reagan's policies 雷根政策的影響 14
- increase due to neo-liberalism 因新自由主義而加劇 27, 36
- socialism, Lefebvre's view 社會主義，列斐伏爾的觀點 81
-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Harvey) 《社會正義與城市》(哈維) 2, 117, 127
- social movements 社會運動；參見 political and social movements 政治與社會運動
- social processes 社會過程
- and conception of rights 與權利概念 49, 51-2, 62
- material embedding of 物質鑲嵌 70, 72, 76, 84, 109
- social relations, labor and values 社會關係，勞動與價值 139, 141-2
- social solidarities 社會團結
- breakdown under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義下的崩潰 53, 56-7

hostility of neo-liberal state towards
新自由主義國家的敵視 21, 55
Thatcherite attacks on 柴契爾的抨擊
12-3
social struggles 社會鬥爭；參見
political and social struggles 政治與
社會鬥爭
Somoza, Anastasio 安納斯塔西歐·蘇
慕薩 17
South Africa 南非 35, 58, 64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參見
East/Southeast Asia 東亞／東南亞
Southern Africa 南非 61
South Korea 南韓 27, 29, 58, 75, 88
Soviet Union 蘇聯（蘇維埃） 68,
135, 143
space 空間
absolute concept 絕對概念 123, 126,
132, 140
aspects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壟斷式競爭的面向 94
author's understanding of 作者的理
解 117-121, 126, 128-131
meanings and contexts 意義與脈絡
115
and movements in market exchange
與市場交換中的運動 91-2
and regionality 與區域體 97
relational concept 關係的概念 117,
119-122
relative concept 相對概念 117-124
social,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ies
社會、文學與文化理論 126
in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不均地理發展理論
72-3
and urban processes under capitalism

與資本主義下的都市過程 117
參見 spatialities 空間性
space-time/spatio-temporality 時空 /
空間－時間性
author understanding of 作者的理解
121-2, 128-31
and concretization of political
movements 與政治運動的具體化
145
and critical/political possibilities 與
批判／政治可能性 136
ecological systems 生態系統 119
matrix for Marxian theory 馬克思理
論的矩陣 140-2
relationality 關係性 119-26, 144-5
and relativity 與相對性 117-24
and representation 與再現 127-31
and site of Ground Zero 與歸零地的
基地 133-4
understandings of identity 認同的理
解 125
Spain 西班牙 10-11
Spinoza, Baruch de 史賓諾莎 121
the state 國家
neo-liberal configuration 新自由主義
構造 101, 104
orchestration of financial crises 金融
危機的協調 47
and protection of rights 與權利的保
護 50
redistributive politics 重分配政治
10, 43-4
and surplus generation 與剩餘產生
85-6
territorial systems of administration
行政的疆域系統 100-2
Steinberg, Saul 索爾·史坦伯格 119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結構調整方案 28, 42, 89, 105
surpluses 剩餘 86-7, 141
 and devaluation 與貶值 85, 89
 natural resources 自然資源 86, 93
surveillance 監視 22, 44, 54

T

Taiwan 臺灣 27, 29, 64
Taliban 塔利班 135
technology transfers, aim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技術轉移，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 30
terrorism 恐怖主義 131；參見 "war on terror" 「反恐戰爭」
Thailand 泰國 74
Thatcher, Margaret 瑪格利特·柴契爾 8, 11-3, 21, 25, 43
theory 理論
 and case study work 與個案研究工作 73, 111
 conception of 概念 70, 73
Thompson, E. P. 湯普森 137
Three Gorges Dam project 三峽水壩計畫 32
Tiananmen Square 天安門廣場 31, 45, 122, 123
Tibet 西藏 33
tourism 觀光 39, 87
trade unions 工會 21, 26, 47, 52
transport 運輸 91, 94-6, 99, 101, 104
TRIPS agreement 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38
Tschira, Klaus 克勞斯·奇拉 3

U

UN Charter 聯合國憲章 52

unemployment 失業
 caused by financial crises 金融危機引起的 41; 47
 collapse of manufacturing in China 中國製造業的倒閉 33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不均地理發展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 85, 88-9
 approaches o thinking about 思考取向 66-7
 capital accumulation 資本積累 61, 70, 72-3, 75-6, 79, 81, 83-4, 89
 and capitalism 與資本主義 111
 and embedding of social processes 與社會過程的鑲嵌 72-84, 109-111
 investments in transport systems 運輸系統的投資 96
 market exchange 市場交換 91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與多國公司 95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義 30, 35-6
 and production of regionality 與區域體的生產 97-9
 and regional conflict 與區域衝突 107
 as result of class struggles within states 做為國家內部階級鬥爭的結果 102
 resulting from political/ social struggles 源於政治 / 社會鬥爭 67, 105-6
 structure of argument 論證結構 73
 and struggles around regionality 圍繞區域體的鬥爭 108
 unified theory 統一理論 70, 112
United Nations 聯合國；參見 UN

- Charter 聯合國憲章
- United States (US) 美國
- corporate welfare programs 企業福利方案 44
-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與反人道罪 50
- economic expansion during 1990s 1990 年代的經濟擴張 28
- "freedom" conferred on Iraq 賦予伊拉克的「自由」 7
- as hegemonic center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做為資本積累的霸權核心 89
- imperial tradition 帝國主義傳統 17
- interstate highway system 州際高速公路系統 33
- investment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sector 對中國製造業部門的投資 33
-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crises 金融危機的管理 41, 47
- model of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義模型 27
- neo-conservatism and the "moral majority" 新保守主義與「道德多數」 55
- neo-liberal policies 新自由主義政策 7-9, 19, 25
- politics and nationalism 政治與國族主義 53, 55-6
- possibility of working class politics 勞工階級政治的可能性 55, 58
- problems during neo-liberal turn 新自由主義轉向的問題 7, 30, 36
- restoration of class power 階級力量的復辟 9, 14, 19, 24, 27, 34, 36, 45, 49
- savings and loans crisis (1987-8) 儲蓄與貸款危機 (1987-8) 22
- and space of Ground Zero 與歸零地的空間 135
- state strategy of incarceration 監禁的國家策略 44
- "war on terror" 「反恐戰爭」 62
- 參見 California 加州; New York City 紐約市
- universalism 普遍主義
- and human rights 與人權 48-9
- NGOs' dedication to 非政府組織的投注 47-8
- US projection of American values 美國價值的投射 64
- University of Bristol 布里斯托大學 2
- University of Chicago 芝加哥大學 8, 11
-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海德堡大學; 參見 Hettner-Lecture 赫特納講座
- University of Oxford 牛津大學 2
- urbanization 都市化
-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群聚經濟 93
- China 中國 35-6, 43-4
- geographical investments 地理投資 96
- use values 使用價值 85-7
- V**
- values 價值
- Marx's concept 馬克思的概念 138-42
- representation through money 透過貨幣而呈現 143
- Veneroso, F. 凡納羅索 41
- violence 暴力; 參見 inter-ethnic

violence 族群間暴力; riots 暴動
Volcker, Paul, monetary policy in US
保羅·沃爾克，美國的貨幣政策
13-4, 41

W

Waco tragedy 瓦科慘劇 54
Wade, R. 威德 41
wage labor 薪資勞動 85, 92, 141
Wall Street 華爾街 28, 41-2, 133
Wang Hui 汪暉 31, 34, 52
"war on terror" 「反恐戰爭」 54, 62
"Washington Consensus" 「華盛頓共識」 28
Weber, Max 馬斯·韋伯 91
West Germany 西德 26-7, 36
Whitehead, A.N. 懷海德 72, 121, 132, 144
Williams, Raymond 雷蒙·威廉斯 137-8
Wittfogel, Karl 卡爾·魏復古 137
World Bank 世界銀行 28 45, 52, 59, 63
World Social Forum 世界社會論壇 60
World Trade Center, New York, terrorist attacks on 紐約世貿中心的恐怖主義攻擊 54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貿易組織 22, 35, 38, 51
aims and objectives 宗旨與目標 29, 45
China's accession to 中國的進入 30-1
TRIPS agreement 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協定 38

Z

Zapatista uprising (1994) 查巴達起義 42, 44, 58, 75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 迈向不均地理发展理

作者=

页数= 1 0 0 0

S S 号= 1 2 9 6 7 9 2 9

出版日期=

出版社=